

年平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D622.4
72

年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牟平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牟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八月

目 录

牟平采金史·····	张洪财 (1)
张颜山和“泰生东”染料·····	
·····	张绪谱 口述 曲言训整理 (12)
宁海“辛酉之变”·····	杨 墨 (29)
双林前惨案纪实·····	李文夫 (41)
头颅抛民主，热血洒和平——记辛冠吾烈士	
·····	都兴华 常毅传 (52)
革命音乐家安波·····	曲言训 曲兴澜 (61)
郑道济双林前反正·····	李振端 (82)
回忆父亲彭昭贤二三事·····	
·····	彭明桂 口述 曲言训整理 (90)
渔家生活拾趣·····	李祯林 姜文健 (96)
记孙塾事·····	孙葆真 (100)
孙塾诉状 掇引·····	于 健 (108)
抗战时期牟平境内的几个国民党军司令之	
兴衰始末·····	都兴华 (110)
甲午海战的两条沉船·····	
·····	李振玉 口述 王卓章 整理 (121)

牟平馆藏部分出土之古铜币	孙承渭(123)
(附铜币图)	
昆嵛山名胜纪略	曲言训(133)
旅美中医于碧川博士	于庆喜(141)
牟台小考	杨家齐(150)
牟平十大景	隋清欣(156)
老石烧肉和兔子洞包子	唐述贤(164)
墩子考	嵒 樵(169)
元代石墓 —— 鳌子坟	嵒 樵(171)
(附元代印尼石坟图与我县石坟图)	
(172)	
从十分屠戮赦三分到上浩浩山	治 平(173)
教育轶事——《老虎歌》	治 平(175)
牟平县人民政府历任县长(主任)名录	王本世(177)
侦察英雄杨子荣征文启事	
.....	
.....牟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78)

牟平采金史

张 洪 财

牟平黄金资源比较丰富，采金历史悠久。为了满足读者需要，笔者对牟平黄金生产的历史渊源、储量分布及勘探开采情况，作简要介绍，恳望读者斧正。

建国前的采金业

牟平县采金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远自隋朝开皇年间，牟州（今牟平观水镇半城附近）刺史辛公义（甘肃狄道人），即于垛山东南麓，采掘过黄银，现有“大金清”、“小金清”遗迹可证（遗迹在王格庄乡金城村。金清，即金坑。黄银，黄金的一种）。《隋书·循吏传》载：“辛公义为牟州刺史，山出黄银，获之以献。”又见《元和志》：“黄银坑在昌阳县东140里，开皇十八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此坑冶铸，得黄银，献之。大业末，贞观初更沙汰之。”随着黄金开采事业的发展和黄金价值的提高，统治阶级加强了采金管理。从隋唐开始，朝廷内编金户设官，每年缴纳金税。宋天圣年间（1023—1031）登莱采金每年得益数千两，当时的采金方式，多于古河床上，肩挑人抬挖金清；泊木流，用小金簸箕淘取黄金。公元1033年，宋仁宗（赵祯）接受了奖劝宰相王曾的建议：“采金者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认为人们开采黄金获利越大，抛弃农桑从事工商业的

就越多，不应提倡。“同年十月，禁止全民开采。登州的黄金开采，随之处于低潮。十二月开封以东发生饥荒，解除了禁令。

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太监陈曾于金牛山采金，金民在矿脉地表开采氧化矿，用石碾、石磨压磨粉碎，再用木制的小金簸箕淘金。现仍保留当时采金的平洞浅井遗迹。有的小平洞只有30公分宽，侧身才能进去。当时靠锤打、锹挖、镐刨，土药爆破，没有安全设施。岔河村吴姓数十名金民，由于下井塌方，全都葬身矿井之内。直到现在岔河村姓吴的人，还在清明、“月一”等节日，到金牛山挂纸上坟，以示悼念。同治七年（1868年），山东四府（济南、东昌、泰安、武定）道台李宗岱也于金牛山采金，办事处机器房设在罗家屯东北河滩内。1936年版《牟平县志》记载：

“金牛山矿名茅山，矿床生于花岗片麻岩中，石英脉每吨含金量约三钱五分，清光绪二十年开采颇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胶东，清政府与德国立约，准开登州五矿，本县茅山、桂山等矿均列约内。清德成立了“华德采矿公司”。立约后，德国人在金牛山铺设了轻便铁路，并在茅山后麓，筑西式楼房一所，备职员办公膳宿。德人先后在金牛山矿脉开了五处矿坑，一是在金牛山北麓向南开，坑巷宽大，内有横向五道，均向东开；二是在铜锡山东坡向西开，至矿脉转西南；三是在茅山北端洞口向南开，中有东西隧巷；四是在金翅岭南坡向东北开，至矿脉转向北，向上开通山顶；五是在轨道山西南坡向北开，又在西坡、东坡各开坑一道，转向南北分打。在此期间，美国矿师爱利司司莱克曾对金牛山矿脉进行了勘查，从金牛山矿脉检取矿样

多种，详加分析，得出结果，每吨矿石含金价值等于一点七八美金。爱利司司莱克还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该金矿含金成分太低，开采未必获利”。

当时德国人开采情况如何？获利多少？无从得知。

桂山位于解甲庄镇沟头店村西南，向以金矿著名。当地居民淘取黄金，历代都有记载，每日收入超过了金牛山。但多在桂山东麓沟头店一带河流中淘取砂金，对于桂山脉金并无侵动。清光绪季年，李宗岱于桂山曾开掘二井，但工作未久即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桂山与茅山虽然同列约内，但因先在茅山开办，未能同时并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合同期满，我国本应取回登州矿务，因德人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登州五矿权利仍然操在德人手中。1907年，清政府又与德人签订合同8条，同意延期2年收回登州矿权。新合同签订后，山东各界人民对德帝国主义继续霸占我国矿权的侵略行径，深为愤慨。纷纷成立了保矿会，提出“坚决收回茅山五矿”，表示“如不废约，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德人迫于各界反对，又发现各地矿苗不足，恐开矿亏损，提出要中国拿出白银80万两，方准赎矿。对于德商的讹诈，本应据理驳斥，但山东新任巡抚孙宝琦害怕引起外交纠葛，卑躬屈膝，与德人勾勾搭搭。1909年以34万两白银将五矿赎回。

中华民国期间，狭隘地接受了德人在金牛山开采黄金获利甚少的教训，又轻信于美国矿师爱利司司莱克对金牛山金矿的错误评价，牟平县的脉金生产处于低潮。民国7、8年间，菏泽人陈翰轩集资在桂山、辛安河一带淘金，费本万余元，只得黄金11两。据云：“该地水势颇大，须二分工采

矿，八分工治水”，终因水患停工。1927年，又有天津一解姓资本家来购置矿地，用经理，聘技师，营业两载，无甚盈亏，旋以地方不靖置工。此外，垛山南麓之大小金清，东麓之前松椒，沁水河上游东直格庄、徐家疃、东西桑杭埠一带，附近居民都在农闲季节，以旧式木簸箕淘汰沙土而取其金砂，虽法笨血亏，每人每天只有三、四角钱的收入，但在解放前，对于维持贫民的最低生活，起到一定作用。

1935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人员采金，在金牛山一带，划分了三个金矿区，金牛山称中华金矿，腊子港称为富民金矿，姜家洞称裕华金矿。同时派员对登州金脉进行了全面调查。国民党山东政府设立山东省营金矿委员会，下设采矿工程处、除辖沂水、招远两矿外，增采栖霞唐山砂金和牟平金牛山、平度旧店、文登狼虎山等处山金。据1938年记载：牟平金牛山由地表山坡开掘平洞直穿矿体，平巷约200米。在矿段两侧开掘矩形竖井，井深150米，经石门贯穿深部矿体。

抗日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牟平，“中华金矿中央金矿”、“富民金矿”、“裕华金矿”即以下马。除“富民金矿”收付相抵外，“中华金矿中央金矿”与“裕华金矿”都得不偿失。为了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党成立了东海采矿办事处，在金牛山腊子港开采矿石，生产黄金和硫磺，同时在曲家口成立兵工厂，用在金牛山开采的硫磺，制造军火，支援前线。采矿办事处下设四个股：总务股、经营股、工程股、行政股。当时因干部不足，将工程股和行政股合二为一。采矿办事处直辖金牛山矿场。管辖范围有栖霞盘石涧金矿及威海于家，文登侯家，乳山双山子、丁家河、河泮口，我县桂山沟头店、松椒的砂金生产。据1946年

2月，胶东行政公署实业处胶东国营金矿（东海区金牛山矿区）的调查报告记载：牟平金牛山拉子沟金矿，1945年11月人民政府组织打井开矿硐一处，资金50万元，每日产金5两5钱，每百斤砂子含金一分，脉长8华里，宽4尺。牟平金牛山矿硐，1944年7月，为我军后勤处开采，资金200万元，日产硫磺1800斤，硫酸1713斤。1946年因含金品位过低（每百斤含金8厘），停止生产。牟平桂山区沟头之砂金矿，月产赤金24两，月得利3万元。

黄金资源的储量分布和开采情况

一、砂金

我县砂金矿源大致分布在垛山东麓松椒河流域、桂山东西两侧的黄家疃、董家庄、安吉村、沟头店、李家沟头、繁荣庄及辛安河附近，金牛山两侧的黄垒河、水道河及沁水河一带。全县除养马岛镇、大窑乡未发现砂金外，其余都有砂金矿床。据勘测分析，全县有开采价值的砂金储量7吨左右。

（一）莱山砂金矿。位于夹河支流——陈家河中上游。1976年5月至1977年10月，山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队来此作地质普查工作。据勘察分析，矿区地质属以河流冲积物为主的开阔地，附近属丘陵剥蚀地形。区内金矿化点较多，集中分布在安吉村至蓬岚山一带，以此西向的含金石英脉为主，单个样品最高品位为13克/吨；也有少量含金蚀变岩，这些金矿脉规模虽然不大，但数量较多，它们是砂金矿的矿质来源。据地质普查报告，初步提交已探明C级金矿0.47吨（金

属量)。

(二) 解甲庄砂金矿点。此矿点位于解甲庄镇南繁荣庄、李家沟头、沟头店、辛安河一带。1961年,冶金局勘探队在此打过砂钻。1983至1985年,武警黄金十支队在辛安河一带做地质勘探,由于桂山地区金矿分布广泛,经长期削蚀堆积成矿。因此解甲庄辛安河的河漫滩相沉积,砂砾中赋存着砂金,面积较大,地质队1985年提交辛安河砂金矿金属储量6.26吨。

二、脉金

(一) 金牛山金矿区。金牛山矿区位于水道镇东山,地理座标为东经 $121^{\circ}36'$,北纬 $37^{\circ}11'$,距牟平县城30公里,该矿明清两代都进行过开采,地表老洞旧坑甚多。1950年春,赵家驤先生曾在本矿区(南至小肖家西山,北到哈狗山,全长9公里)进行过调查。绘制五千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幅,附有调查报告。赵先生对该矿区之矿床类型成因及含矿规律变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1953年,中央化工资源勘探大队,又进行了调查,绘有金牛山坑道平面图及纵剖面图。1961年3月,山东地质局胶一队也来做过普查,1965年至1966年山东省冶金勘探公司第三勘探队,南自小肖家北至小辛洞进行了详细的地表揭露和深部钻探,写出了普查评价报告。1958年3月,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牟平县金牛山金矿上马,年底人数达到805人,年生产能力万吨金矿石。1962年7月工业调整下马。1971年12月,原水道镇炸药厂由县接管改名为县磷肥厂,磷肥厂设采矿车间和黄金车间。1975年7月县磷肥厂分家,成立牟平县金牛山硫化

铁矿即“牟平县金牛山金矿”。隶属县化工黄金局。1984年3月，县化工黄金局分为化学工业公司、黄金工业公司。该矿因以生产硫化铁为主，仍归化工系统所管。1984年底有职工416名，年产黄金2500两。据测分析，金矿的矿物成份除金、银、硫外，还含有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等；矿石品位，金品位3—8 g/T，银品位3—12 g/T，硫品位10—15%。金牛山金矿矿区储量（C₂）矿石749586.16吨，金属量黄金3.539吨，银5.194吨，硫84.045吨。

（二）福祿地金矿。福祿地金矿位于牟平城南35公里的莒格庄乡福祿地村北面。1972年，山东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第三勘探队，在此进行了地质普查工作，并于同年12月份提出了《山东牟平福祿地普查报告》。1984年该队又对矿区进行了钻探，工程量2860米，已在250米见矿，矿体厚度在1.5米左右，品位较好。矿石成份有黄铁矿、菱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磁黄铁矿等，有益伴生元素有金、硫、铜、铝、银、锌等，金品位3.25—41.01 g/T，平均13.49 g/T，硫品位平均16.37%。提出地质储量：矿石207961.72吨，金属量2.5346吨，硫32226.15吨，银6.228吨。

根据上述地质资料，1973年8月16日，莒格庄乡开始兴建日采选25吨的小型乡办矿山，因为矿体较好，年产量一般在1600两至2000两左右。1984年又在日选25吨的基础上扩为日选50吨。1984年底，金矿有职工292名，固定资产144.5万元，年产黄金2000两。

（三）水道金矿。水道金矿位于牟平城南30公里。1982年4月22日水道镇兴办。现有职工350名，固定资产总值已达250万元。矿段主体是金牛山两侧付脉一、二、三、四号

脉和金牛山成矿带岔河矿段。1981年至1984年，山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队，来此普查，据测分析，地质储量475168吨，金属量6.569吨，远景储量在15吨左右，金平均品位12.84g/T；银品位一般在8—40g/T，最多200g/T；硫6—15%，最高达30%；矿体平均厚度1.04米。

岔河矿段1983年山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队开始对岔河矿段进行了勘探工作，初步提交报告，利用垂直断面法计算，地质储量189276吨，金属量1.227吨，硫22632吨，金品位6.46g/T，硫品位11.95%，矿体平均厚度1.5米。

（四）高陵金矿。高陵金矿位于牟平城南15公里高陵镇境内。1984年高陵镇开办。每日采选金矿25吨，现有职工5⁰人。本区域内矿脉较多，已发现大小63条走向长度不同的矿体，较好的有下乔金矿脉和下雨村柿子树矿脉，主要分布在下乔村南至岬上村东和下雨村一带。矿体厚度1.78米。金品位平均7.01g/T，硫品位12.5%。因地质队正在做勘探工作，预计金属储量3.9吨。

（五）东道口金矿。东道口金矿位于牟平县西南35公里。王格庄乡东道口村东一公里的山丘地段。1983年省第三勘探队对各探矿工程进行编录采样。1984年7月上钻，控制矿体走向长度600余米，深200米。1985年兴建一座25吨/日处理的黄金选矿厂，现有职工160多人。该矿取样金品位3.71—17.4g/T，平均8.92g/T，硫品位5.6%，水平厚度0.55—3.3米，平均2米，矿体延伸趋势较好。根据民井平巷及部分钻孔资料分析，利用垂直块段断面法计算储量为96677吨，金属量为501.9Kg，预计地质储量在14万吨左右，金属量在800Kg左右。

(六) 桂山金矿点。位于解甲庄镇梁家乔附近。东自沟头店，西到大王顶，南到李家沟头，北到安吉村、董家庄一带。1965年，山东省地质局807队3分队胶东普查组，在桂山周围10平方公里面积内发现数十条石英脉，其中含金者25条。并对桂山一、三号脉、大王顶二号脉作为试金分析。1966年10月分队普查组在本区普查找矿时，于安吉村西山发现含金磁铁矿脉，拣块化验高达20g/T。1967年3月15日至6月12日在本区对安吉村矿点、大王顶二号脉、桂山一号脉进行了槽、井探及清理老洞工作。矿脉含金品位变化较大。在35个样中大于0.5g/T的，仅占34.28%，主脉一号脉最高品位4g/T，矿体最宽处为1.4米，由于未进行详探，地质储量不明。

总之，我县黄金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发展前景喜人，现已初步探明全县黄金储量25吨，远景储量约50吨左右。1984年黄金产量突破“万两关”，跨入了全国14个万两县的行列。

共生金的回收

(一) 硫化铁矿中黄金的回收。我县黄金伴生的特点：与黄铁石英脉中伴生，硫的成份较高。从硫化铁矿中回收黄金的主要方法是用破碎机将矿石破碎后，通过皮带输送机送入球磨机，兑上黄药和二号药进行浮选，选出硫精矿，再将硫精矿进行二次球磨和二次浮选，进行金硫分离，选出金精矿粉，金精矿粉的品位100—200g/T，发沈阳冶炼厂冶炼出黄金。

(二) 硫酸渣中黄金的回收。我县黄金与黄铁矿石英脉伴生，多属高硫含金矿。金的回收率只能达到80%，硫精矿中还存有10—15%的黄金。县磷肥厂1974年在清理硫酸沸腾炉时，工人张普才同志发现硫精矿燃烧后，部分黄金沉落炉底，一次能回取黄金80两左右。从此磷肥厂就从排渣口下面，用水冲铺麻袋上土流的方法，回收部分黄金和低品位含金硫酸渣，用“造球氰化”堆浸法提金。1982年8月到1984年10月，山东省冶金研究所黄意真、沈启潜、郭乃忠等7同志和磷肥厂李振山、曲恒守、张开运等同志用水泥、石灰、烧碱、硫酸渣造球氰化钠堆浸，活性炭电解，进行堆浸法试验，达到预期效果。既控制了环境污染，又获得较好的技术指标，浸出率可达70%。

(三) 氰化法回收黄金。牟平黄金资源氧化矿较多，黄金品位较高，除了将矿石磨碎后上木流拉一部分外，主要利用氰化钠回收黄金。

黄金生产的基本建设和生产规模

我县金矿的大规模井下开采，始于清末德人在金牛山凿井开矿以后。1950年春天，山东省人民政府工矿部矿产管理局公利矿厂对金牛山北侧的平巷、竖井，茅山北面的平巷，进行了重建和修整。1962年金牛山金矿在榛子崖东北面山坡上建了一座50T/日选矿厂，因受“五风”影响，计划不周，未建成就下马了。1974年8月中央化工部、省化工局、地、县投资100万元，在腊子港28线下盘建了一座3.5米、井深150米、年产4万吨矿石的竖井。1975年8月王震副总理视察了

解甲庄镇李家沟头矿点,并作了重点指示。1976年金牛山金矿又建了一座100 T/日的选矿厂,相继玉林店金矿 25T/日选矿厂、莒格庄福禄地金矿 25T/日选矿厂建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各矿点竞相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黄金生产迅速发展。1981年6月福禄地金矿由山东冶金工程处承包,在东经 $121^{\circ}38'$,北纬 $37^{\circ}9'$ 一号矿体的中央下盘,进行了直径3.1米、井深120米的井建工程。1984年7月福禄地金矿进行50T/日选矿厂扩建,1985年4月投产,工程总造价85.02万元。1982年4月,水道金矿筹建了一座50T/日选矿厂。同年10月1日投产。1983年11月,水道金矿在岔河矿区35线北50米处的矿体下盘,山东省冶金工程处承包了一项直径3.5米、井深120米的井建工程,1984年9月建成投产。高陵金矿1984年7月筹建了一座25T/日选矿厂,1985年6月投产。县磷肥厂1984年8月筹建了一座50T/日选矿厂,1985年3月投产。1984年2月水道金矿二号脉井建工程上马。1985年7月王格庄东道口金矿25T/日选矿厂筹建。目前全县黄金工业固定产值734万元,年采矿能力达9万吨。选矿年处理量达85000吨,达到了采选配套,年产黄金达到了一万两。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黄金工业将出现可喜局面。

张颜山和“泰生东”染料

张绪谱 口述 曲言训整理

先父张宗桂，号燕山，原取“燕山五桂”之义。后因经营“泰生东”染料发迹，改号颜山。我家祖籍牟平县养马岛张家庄，先祖张继广，生三子，先父居长。因家境贫困，生计困难，先祖扶老携幼，举家迁到本县城郊邵家堽定居。

先父15岁（1876年）时，到烟台学生意，住福山“泰生东”杂货铺（东家是赖芳圃的父亲）。头几年名义上是学生意，实际上是干杂活，劈柴做饭、打水扫地、刷水烟袋、放铺盖倒便壶，什么活都干。因为手脚勤快，办事利便，5年后就由打杂、下街（看行情）当上了掌柜，吃了份子。

“泰生东”染料庄的发迹

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外国人在烟台办了不少洋行，如德国，除在烟台开办德士古石油公司外，还先后开设盎斯洋行（行址朝阳街，做花生米出口生意，老板叫斯密特），宝隆洋行（行址烟台山下），爱礼司洋行与德孚洋行（行址在北大街“鸿记茶庄”东）。德孚洋行以推销德国巴利沙厂生产的“狮马牌”染料为主，附带经营“狮马牌”肥田粉。大板（经理）叫维里哈姆。还有个青年管理人员

叫克劳克。克劳克的父亲是德国巴利沙厂董事之一。当时赖家“泰生东”杂货铺为德孚洋行销售一部分染料，先父与克劳克经常接触，交谊颇深。克劳克在回国服役之前（当时德国规定，在国外居住的青年，必须回国按期服兵役），向父亲分析了染织工业急需解决染料问题的形势，建议先父办一商号，专营德国巴利沙厂生产的“狮马牌”染料。当时洋行的一般规定，是先付款再提货，上海的染料大王周宗良（宁波人）、贝润生（苏州人）也必须先付50%的押金，才能从洋行提出染料。克劳克破例向先父保证：“可以先提货，待染料出手后再付款。”先父与赖芳圃（赖芳圃的父亲已去世）商议，赖认为先父手脚太大，德国人靠不住，一旦陷下去，东家要负无限责任，风险太大，不肯答应。这时“泰生东”杂货铺已为赖芳圃赚钱不少，赖家索性急流勇退，处理了存货，把杂货铺店房，酌价卖给了先父。1907年，先父自筹资金，雇用店员，添置设备，就“泰生东”杂货铺旧址（现北大街派出所处），兴建了两幢楼房，正式开设了“泰生东”染料庄。

19世纪前半期，我省特别是胶东一带，着色染布，基本上使用的是天然染料。农民自种蓝草（或称靛蓝）染布。蓝草叶如黄菸，采叶加少量石灰泡出蓝汁，上浮的泡沫和底下的沉淀物，就是中药的“青黛”，可治恶性疮疖。取中间的蓝汁染布，染出的布呈蓝色。除蓝色以外，也有用槐树（家槐）豆染姜黄，用谷草灰染灰色土布的。至于花布，当时只是用皮纸刷上清油，在纸上刻上图案花样，把刻好花样的皮纸铺在布上，刷上石灰浆，再入缸染色。出缸后，刷去石灰就是所谓蓝底白花的“印花布”，又名“花点布”，

用来给女人做衣服或做被面。用天然染料染布，上色不匀，经不住日晒雨淋，坚牢度很差。19世纪中叶，世界上纺织工业飞速发展，天然染料远远不能满足纺织工业的需要，亟需研制新的染料，才能解决染织之间的矛盾。当时，德、日、英、法等国，随着钢铁和煤炭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副产品煤焦油，煤焦油为制造合成染料提供了原料。1856年，英国首创了可以染丝的紫红色染料“苯胺紫”。此后各国的染料工业发展都很快。但在初期，合成染料必须加上媒染剂才能着色染布，而且所有的合成染料还不如天然染料靛蓝和茜素染色鲜艳、坚牢。直到1884年，保地格发现了“刚果红”以后，才能不用媒染剂，直接上染棉纤维，故名直接染料。用直接染料染布，不怕搓洗磨损，更耐日晒雨淋，其鲜艳度、牢固度，远非天然染料可比。先父所经营的染料，就是德国巴利沙厂生产的“狮马牌”直接染料。

虽然直接染料较天然染料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本地农民长期受闭关锁国的影响，因循守旧，不愿接受新的事物，尤其对舶来品不信任，象怀疑“肥田粉”（化肥）“烧庄稼”、“瘦地”一样，也怕直接染料“烧布”、“烂衣裳”，宁肯使用土法染布，也不敢用“狮马牌”染料。也有的想用而不懂染色方法。先父为慎重起见，开始只是给德孚洋行“寄售”（相当于代销）染料，德方根据销货数付“佣金”（佣金相当销货金额的20%）。染料由德方运送，销出前所有染料都是德方的存货，意外损耗与合理损耗均由德方负责。因多报损耗就可以多得利润，德方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设专职稽查员定期到“泰生东”查库了解存货。对稽查员，必须招待备至，请吃请喝，或进行金钱贿赂，求其多报

损耗。先父认为“泰生东”既已开张营业，给人代销，终非长远之计，要紧的是把牌子创出去。为了打开销路，赢得信誉，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跑透了多少鞋底。不管炎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先父与同行几人，推着小车，走南闯北，推销染料。西至蓬、黄、掖，南至青岛、胶县，东至牟、文、荣，从城市到农村，都有先父的足迹。边试验，边推销。当时推销的染料主要是“阴丹士林”（还原蓝RSN），又名耐晒靛。原来用土法下缸染布，工序繁杂，用直接染料染布，简便易行。先父为农民做试验，染不好不走，染好了再要钱。染法是把水烧沸（水量以能浸过染物为准），再把洋靛下在锅里，半两靛（一小包），一般能染一件衣服（7尺左右），下靛的同时下盐，盐量为靛量的一半，搅匀后浸入染物，水温保持摄氏80到90度，翻动40分钟出锅，取出后晒干就行了。现成的衣服上午染色，下午就能穿。多次试验比较，消除了用户的顾虑。当时毓璜顶北坡有个染坊街（后更名宴芳街），住户多数开染坊，多属掖县人。常年用天然染料染布，各个染坊都要在地下埋上十几口大缸，染布时要换缸7次，10天时间才能染成衣料。经过试验比较，以后都改用“泰生东”的直接染料，既缩短了工序，又提高了质量，工效提高了十几倍，这在着色染布上，不能说不是一次较大的改革。

创出牌子以后，“泰生东”不再给德孚洋行“寄售”染料了，取得了德孚洋行染料在山东的专卖权。先父成了德方在山东经销染料的总代理。1907年在烟台设立染料庄（实际上是“泰生东”总号）。1910年前后，又在济南、青岛、上海、哈尔滨等地建立了分号。济南德孚洋行的大板叫屋本

利，“泰生东”染料庄设于二大马路纬四路（现百货公司处）。经理张善圃（威海人），二掌柜的叫邹策青（福山人），三掌柜何浚川（蓬莱人），杜聘卿管帐，杜去世后，宋欣斋接任会计。青岛德孚洋行的大板叫外斯，二老板叫大福特迈，三老板叫老亥斯。“泰生东”染料庄设于北京路。经理周立山（牟平人），二老板王鼎珊（福山人），三老板王世珍（牟平人），帐桌有宋欣斋（宋欣斋先在青岛管帐，以后到济南接替杜聘卿任会计），写信的有王致远、王友来等。在上海也开设了“泰生东”分号（原址金陵东路吉祥街怡顺昌内二楼），经理阮仲芳（牟平人），写信的叫赵会山。上海“泰生东”的主要任务是搞染料信息。除上述各地外，还于江苏徐州、海州，山东济宁、德州、莱阳、牟平及胶济路沿线潍县、张店、周村等地，设代销处。当时莱阳的称福盛东商号，为主要销售点之一。牟平的称“巨生东”，名义上做买卖，实际上设帐房。

德孚洋行的染料，有百斤装的（鼓状铁桶）、5斤装的、2斤装的，2斤装的居多，长方体铁盒，盒上印“狮马牌”商标。20世纪初染料主要是蓝靛膏子，染大蓝布，以后改成粉状染料。颜色也逐渐增多。有“长途牌”蓝，“大刁牌”蓝，“双鸡牌”桃红，还有淡红、水红、雪青、雪灰等十几个品种。

“泰生东”在上海还开了个义生钱庄。通过义生钱庄为德方汇款。烟、青、济、哈等地的货款，都汇到上海，再由上海汇到德国巴利沙染料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烟台、青岛、济南等地德孚洋行所存的染料，全部移交“泰生东”销售，议定战后德

方回华时，付还本息。大战期间，染料来源断绝，价格猛烈上涨。洋靛每桶（百斤装）原银40两，上涨800到1000两，猛增20多倍。小桶染料上涨更大，海昌蓝、红色、紫色、绿色等染料，每公斤盒装的值银百两（相当于一个金铤）。

“泰生东”所存染料，约3至5千吨，在染料价格急剧上涨而其它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获得很大利润，当时收入不下于300至500万元。

“泰生东”的经营管理

在“泰生东”的经营管理方面，先父对以下几点，是特别重视的。

1. 用人十分严格。“泰生东”用人，从掌柜的到伙计，都必须在烟台总号启用，必须经过先父的严格审查，入柜后量才使用提拔。既重才干，又重德行。规定所有经营人员不准带家眷，不准抽大烟，不准娶小老婆，不准逛妓院，不准留分头。青岛有个姓崔的老板，因为抽大烟误了交易，坚决开除不用。福山人赖汉章也是因为抽大烟被开除了。先父做事急躁、果断。青岛、济南、上海、哈尔滨，不论哪处人员，勤者立奖，懒者立罚。每年八月十五和春节前对雇用人员都过两次“筛子”，好的留下，不合要求的打发走。制度严格，漏洞少。如各处从德孚洋行进的染料，都有2%到4%的长头，管货的、管帐的都把长货、长款交柜，私吞作弊的现象极少。

2. 信誉第一。先父做买卖讲信用，当时是出名的。常说“讲信用能把死买卖做活，不讲信用，能把活买卖做死，信

用是买卖人的第一生命。”与德方交易，无论代销或独资经营，合同一经议定，执行起来一丝不苟。何时取货，何时汇款，不误时日，毫厘不爽。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起时，德孚洋行代理人维里哈姆、外斯等人仓惶回国，存货也未来得及细点，先父安排人逐桶逐箱一一查清。德人回来时，按合同如数付了款。德方对先父的重德行、讲信用十分赞赏。在先父60岁生日时，赠送“本茨牌”汽车一辆，此车从德国船运至青岛，又从青岛海运至烟台，既示感激，又志祝贺。先父对同行交易，对各类购货者，不论批发零售，都是货真价实，足斤足两。1926年，济南西关发现“泰生东”“山鸡红”牌染料掺假，济南“泰生东”经理报告到烟台总号。先父得知后，千里迢迢，赶赴济南。查了半个多月，先查用户从何人、何处买货，再查卖货点，顺藤摸瓜，终于弄清了真相。是西关一代销店自行搞鬼。马上责令该店包赔买方损失，同时取消了这家代销店的购货权。如果发现小贩作弊，也是从方到点，细心调查，一经查实，小贩就不用想再从“泰生东”批买染料了。

3.灵活经营。先父常说，做买卖要胆子大，心眼活。

“泰生东”染料创牌子时，好多人不敢用“洋靛”，先父主张送货上门，教人染布，染好了再付钱。“泰生东”染料庄既批发，又零售。有些乡间小贩，生活穷困，手里只有个货郎鼓，身上背着个空钱褡子。这样的小贩，只要找两个保人，就可以先提出几桶染料，下乡卖完了以后，再来付款。染料的品种也因地区差异和季节更换而不断改变。山东农村喜深蓝布，徐州、海州喜浅蓝，城市喜杂色。烟台、青岛比较繁华，喜欢外来花色布，主要工作放在染坊和染织厂上。

烟、济、青德孚洋行都设化学屋，配备专家，根据市场信息，向厂方调运染料（个别染料也能就地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免受日寇欺凌，“泰生东”改名为“德孚洋行”。1941年，德国法西斯失利后，“泰生东”又根据形势改变了名称。烟台的更名为“鸿昌号”，青岛的更名为“鸿盛号”，济南的更名为“鸿昶号”。20世纪初期，英国也在烟台开设了一个“卜内门”洋行，经营染料，因为管理混乱，买卖十分清淡。

4. “泰生东”的工资形式有三种：一是基本工资，小伙计第一年年工资一般为20元，第二年改为30至40元。时间久了，就可以根据入店年限和干得好坏吃份子（纯利提成）。二是发“花红”，生意兴隆收入多，按工资比数发“花红”（奖励）。“花红”有时按月发，有时半年一发或年终一次发。一般年份“泰生东”所发的“花红”数，都能超过工资数。三是发“报酬”，所谓“报酬”，就是“年终奖励”。年底结帐，得出全年盈利数以后，先提出盈利数的三成到四成做机动资金，再按东七西三（东家七成，西家三成）的比例进行分配。西家再分掌柜的、经理、会计、下街的、大伙计、小伙计等几个档次进行分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染料价格大涨，利润几十倍的增加，店员年年发“报酬”，“报酬”数50至200元不等。“泰生东”每月都把库存数、流动资金数、银行存款数等表报烟台总号，月月结帐，以查盈亏。1910年前，烟台的染料销路不佳，不用说“报酬”，有时连“花红”也发不上。先父与德孚洋行商议降低价格出售，维里哈姆说什么也不肯，并亲自到“泰生东”查库看货，先父就提前组织人用一批空木箱

垫底，上面再用大、小桶染料垒盖起来，德孚相信真的积货太多，卖不下去了，才同意降低了一成价格。

5. 店员福利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泰生东”对店员的福利还是比较重视的。先父常说“人心最值钱”。烟台、青岛、济南“泰生东”柜上都有20多人（包括大掌柜、二掌柜、经理、上街的、仓库保管、帐房、写信的、站柜台的、厨房人员和小伙计等），都是一个锅里出饭，同桌就餐。不过，小伙计只能站着吃饭，负责给别人盛饭。每年允许店员看一次家，看家来回发“川资”（路费），有特殊事，平时也可以请假，但不发“川资”。干得好的店员夏天发一身苏络，冬天发一身棉袍。一般的冬天都发一个围脖、一顶帽子。吃饭不花钱，有病吃药不花钱，剪头、洗澡不花钱，来好戏看戏也由柜上打票。星期天改善生活加菜，腊月二十三日开始换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烟台、青岛、济南的德孚洋行和烟台、青岛两市的德国领事馆，德人都交先父管理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交先父管理过。欧战结束后，德孚洋行和德国领事馆，由国民党中央经济部统一接管。

扩大经营范围

先父经营染料发迹以后，放开手脚，扩大经营范围。1920年前后，在烟台与赖芳圃合办了一个“玉生东”棉布庄（原址在现《烟台日报》社东），独资创办了一个“聚生东”绸缎庄（原址在现《烟台日报》社），经理由表兄吴玉阶（牟平东关人）担任，“聚生东”绸缎庄因订日货过多，“九·一八”事变后，我国抵制日货，该庄倒闭。与奇山所

刘润福（四哥张绪谟的岳父）合办了一个“巨丰银号”，经理是张骏丰。“七·七”事变前，在丹东建纡丝坊（现通江街六号）一处，“永和染料庄”一处，两处投资五万元。同时，在烟台瑞丰面粉公司投资一万元，在烟台电灯公司认购股票一万元，在义中出口公司投资一万元。在济南华庆面粉公司投资一万元。

我们弟兄八人，老大张绪诚，老二张绪浩，老三张绪谦（三兄俱系前母所生，现已辞世），生前随先父在烟、青、济、沪等地经商，我的生母属二房，生五子。四哥张绪谟，五哥张绪诒，六哥张绪让，现俱在台湾经商。八弟张绪潞，在美国经商。我们弟兄八人“长大成家”之后，也各自办了一些企业。大哥张绪诚原在上海“泰生东”当小东家，经理是孙柏之。经营了十几年以后，挣银28000两，老大与孙柏之商议，用盈得的28000两银子，自办一个企业。先父得知后，大为恼火。认为大哥翅膀未硬就想自己说了算，合家的事怎么能办好？把大哥和孙柏之一起开除了。开除时，给了大哥两万两银子，也和孙柏之算了帐，叫他们自谋出路。当时牟平东门里有个资本家姓王，外号“梅花大相公”，在东北发迹，广有资财，对先父的事业抱嫉妒心理，他支持老大单干，并主动借给大哥10万两银子，大哥的亲家（解甲庄李家）拿出5万两，牟平戚家借付2万两，大哥凑集了20万两（加上自己历年储蓄1万两左右）银子，在青岛开办了一个“裕孚银号”（现青岛保定路十四号），解甲庄李家推荐了一名主会计叫李文卿。先父给大哥两万两银子，恐其他子女不满，又分给我们弟兄七人和两个姐姐（大姐嫁于烟台奇山所刘家，二姐嫁于牟平常家）每人两万两银子。以这笔钱为基础，老二张绪浩在烟台

办了一个“龙海造纸厂”，我在青岛办了一个“建业火柴厂”。次年，又建一“中东化工厂”，资金不足，爱人拿出体己钱三万两，始建成营业。我的爱人李丽华，电影明星，30年代因唱《千里送京娘》名闻海内外，我俩1943年结婚，她于1948年到香港，60年代到台湾经营“红宝石饭店”，70年代迁往美国长岛，加入美国籍。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乳名小宝，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现在意大利。我与爱人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迫于种种原因离婚的。1980年春天，邓颖超同志亲往美国去信，邀请李丽华回国，李丽华于5月2号回国与邓颖超同志见了面。5月8、9号由香港回美国。我们弟兄五人（四哥、五哥、六哥、八弟和我），还于“七·七”事变前，在上海合办了一个“南丰保险公司”和一个“泰丰百货公司”，这两个公司1948年结束营业。

先父与毕庶澄的关系

文登毕庶澄，在1915年前后，认先父为干爹，尔后与先父也有过交往。一年伏天下大雨，沁水河发大水，有个青年人回家过不去河，到我老家邵家堽避雨投宿。那时先父住烟台，先母在家，把这个青年留下了，给他换了淋湿的衣服，管饭留宿，这个青年人就是毕庶澄。临走时，先母给了毕庶澄一些路费，毕庶澄感激涕零，非认先母作干妈不可，先母推却不得，毕庶澄行了跪拜之礼，并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毕某在东北军校读书，将来如有出头之日，必报干妈的大恩大德。”以后毕又亲到烟台，找到先父认了干爹。毕贫困潦倒时，曾向先父借了几次钱（实际上是有借无

还)。1926年大革命时期，毕当上了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尔后又任过渤海舰队司令，这期间和先父也有过几次来往。毕一生热心军政，先父则刻意经商，话不投机，先父与毕，只不过是礼节性的交往罢了。

“泰生东”之衰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先父在上海投资50万元，办一“义生钱庄”。为办这一钱庄吃了大亏。当时烟台总号用了个写信的，叫田天放，是绍兴人，为了与外国人搞信息联络方便，先父供他到北京大学学了两年外语，结业后在“泰生东”干翻译。田天放又把他父亲田子馨介绍到上海“义生钱庄”当上了经理。实际上田氏父子都很虚浮、固执，田子馨往往背着先父独断专行。办义生钱庄时，先父一再申明，不能用房产做抵押，子馨不听，还背着先父循私舞弊。“一二·八”事变时，义生钱庄焚于战火，田子馨早已携款逃匿，田天放也不知去向了。先父全部承担赔偿责任，为处理债务，先父变卖了一部分房产，白白贴上了70多万元，这是生意败落之始，也是先父用人不当之处。“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主使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欺凌中国人民，人心惶惶，朝不虑夕。烟、青、济、沪“泰生东”都改称德孚洋行，想借德国人的势力威慑日军，但仍然摆脱不了日本侵略者的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营业日见萧条，再加上海海关被日本卡住，染料货源断绝，这时的“泰生东”不过是推销点旧货底支撑门面苟延残喘罢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人搬到天津，在英租界内购房居住。1939年，天津闹水灾，我家在天津的住房都泡在水里。同年秋天，举家搬到上海，住虞洽卿路（现西藏路）一品香旅馆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时局更为紧张，先父把银行储蓄提出来，买了几万件棉布，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仓库里。有的人放风，“先父囤集居奇，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如不采取措施，后患不堪设想”云云，实际上这是上海一些奸商的阴谋，先父只好把棉布卖掉，又买了几千条金条，这些金条，几大银行都不敢存储，最后存在“安裕钱庄”（经理是蓬莱人王鞠如），战争吃紧，“安裕钱庄”也不敢冒风险存金条了。先父只好把金条卖掉。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虽然用这笔钱又买了一些物资，却免不了翻手复手，大伤元气。

先父原是农民出身，虽然终生经商，但一直不忘土地这个根本。欧战前，在家乡买地1000亩左右，买山岚1000多亩，在邵家港老家盖房210多间，又在县城东门里路南、路北盖房100多间。家中雇长工20几人，城外土地靠佃户耕种。解放前，老人仓、杏林堡、高金埠、留德庄等村，都有我家的佃户。先父成为当时名列前茅的大户。

“泰生东”染料庄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储存大批染料，战时货源断绝，染料价格猛涨而发迹，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寇惨败货源断绝而败落。这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先父与公益事业

先父之所以名闻遐迩，不在他是一代腰缠万贯的巨商，

而在于他凭借自己的胆识，认准了一个目标，克服一切困难沐风浴雨去完成自己的事业，还在于他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炎黄子孙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气节。老人平时生活极为俭朴，在烟台、青岛时，常年穿着布袜、布鞋，抽旱烟，对吸鸦片、赌博、宿娼等恶习深恶痛绝。在上海住“一品香”旅馆时，按当时的财力，买几所花园式楼房让全家在上海定居下来，是轻而易举的。但先父认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是万恶的渊藪，对培养子孙后代极为不利，主张权且在上海避难，决意不在上海久居。平素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从六七岁开始，就责令我们读书。启蒙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稍长即读《四书》、《五经》。每日书声琅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先父强调，先圣的教诲，就是做人的信条。西学兴起后，先父以切身经历，教育子女不能保守，要取西方之长，补祖国之短。支持后代搞经济学外语。对家中佣人，先父主张不以奴仆相待，年老者以父辈称呼，同令者的以兄弟姊妹称呼。

对家庭费用、子女求学的花销严加限制，提倡生活自理，目的是改变后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习惯。先父对自家经济要求很严，但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教育事业却非常重视，经常解囊捐赠，毫不吝啬。在烟发迹后，发现烟台东口子（金沟寨上壠）一段公路，雨后十分泥泞，畜力大车行走更感困难，毅然捐款15000元，修筑石条公路，历时三个多月，铺好了这段路面，便利了交通，给行人造了福。1917年春天，在老家（邵家壠）村西建旅店四幢（16间）为过

往行人食宿提供方便，贫困行人非但吃饭、住宿分文不取，临走还有馈赠。1919年秋旱严重，村里人十之八九断炊。管事人张绪成到烟台找先父设法救济，先父慨然应允。全村600多人，每人先发救济粮30斤，又在村西扩建客店16间，每日上下午做稀饭两餐，填补南庄北疃和过往贫困行人的辘辘饥肠。就我所知，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封锁时期，先父指令管事人，除最大限度的减少或免收租税外，每年春天，都发一定的度荒粮。这期间在烟台、青岛、济南、上海、牟平等地捐助红“卅”字会收容孤儿、兴办慈善事业的款项，不下十数万元。

先父在经商当中，受过外国和国内奸商的骗，吃过没有文化的亏，所以他不但重视对子女的知识培养，也很重视社会教育。1928年，在本村办义学一所，建校20多间（现邵家港小学），吸收本村儿童入学，包下学生的学费、饭费、书籍费、校服和童子军服、教师的工资及一切办公费用。30年代初期，刘珍年割据昌邑以东18个县市，自成系统，独行其是，根本就没把山东政府主席韩复榘放在眼里。1931年，刘珍年限定时间，勒令每县必须办一处象样的中学，逾期不办者，唯县长是问。并派监学二人，专司办学。1930年，在牟平东关，虽然办起一处县立中学，实际上既无教室，又无教师，更谈不上其它教学设备了，有名无实，根本就无法上课。县长田育璋（刘珍年委任的），淫虐至极，农民寅吃卯粮，根本无法筹措建校资金，不建校，刘珍年怪罪下来，又恐担当不起。正当田育璋进退维谷，束手无策之际，有人通报田育璋，先父先母从上海探亲回来了，并建议请先父代为设法。田育璋大喜过望，当即宴请先父，酒席间提出，“刘师

长限期办学，实属义举，但本县款绌，力不从心。逾期不能开学，田某获罪事小，贻误后代事大”云云。先父说，这次返乡，没带余款，拙妻（指先母）带没带零花钱，等回家看看再说。回家后与先母提及捐资办学事，说服先母把所带的14000元体己钱全部拿出来，交与田育璋，田县长立即筹备建校，在东关弥勒寺附近原师范旧址，破土兴工，扩建校舍154间。计教室20间，教员室20间，学生宿舍50间，学生自治会办公室4间，礼堂5间，办公室3间，图书室3间，理化仪器室3间，游艺室3间，储藏室3间，成绩室1间，饭厅8间，传达室2间，连体育场共占地32亩。是年秋开学后，两名监学来牟，本想严惩田育璋，结果中学办起来了，学校开学了，教学井井有序，教育设备齐全，大吃一惊。最后查知是先父捐款所建，他们亲自到烟台找到了先父，对先父捐资办学大加赞赏，并说要赠一“育泽千秋”的匾额，一住四五天不走。先父察觉他们是借赞许办学之名，行敲竹杠之实，每人给了他100元钱，才把两位监学先生打发走了。

1897年，德国人占领了青岛，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杀死一个中国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1929年夏天，德国来了一个马戏团在第三公园演出（现上海路工人文化宫一带），票价昂贵，一般市民买不起票，有些青年人就从篷布外扒个缝往里看，也有个别人用刀子把篷布割个缝偷看。有个青年人因用小刀割篷布，被德国看守发现，当场用佩刀捅死了。杀死了人，德国人若无其事，照常演出，观众义愤填膺，想与德人相拚，被保安警察压下去了。青岛市政府也迫于德人的威势，想不了了之。先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但在当时既没有资格与外国人理会，也没有办法到市政府解

决问题。最后只好采取了个“下策”，把青岛市所有的戏院、电影院按满座票数、全部包下，然后打出广告，免费看电影、看戏。用这个办法撤了德国马戏团的台。一星期后，马戏团卖不出票，日子过不下去了。马戏团查知原委后，团长和六名看护，登门向先父赔礼道歉，先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意思是杀人犯罪要受到报应，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德方认错以后，拿出了500元的抚恤金，让先父转交给死者家属。先父也给了马戏团一些路费，不准他们再踏青岛的地皮，立即滚出中国！

先父为人刚直，有时也争强好胜，做了一些看起来很不必要的事。1932年冬，济南商会请客，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行长都在座，先父也应邀参加。因为先父粗衣布履，吸旱烟，谈吐憨直，也不讲客套，交通银行××行长，认为是“乡巴佬”，颇露鄙夷之色，语言中也不无傲慢之处，先父气极。散席后，就着手从各银行提款，提出的钱，陆陆续续不露声色地全部存在××所办的交通银行里，两三个月后，存款达到千万之数，先父突然亲到交通银行提出全部存款。交通银行罄其所有无力支付，××行长被狠狠地将了一军，束手无策。最后，托人说合，赔礼道歉，并大摆宴席，待先父以上宾，谦词请求分期付款。先父认为，这为“教训那些眼中无人的人，出了一口气”！

抗战期间，先父常住“一品香”旅馆，几次想回到烟台，重整家园，终因病危，未能如愿。

1941年3月，先父病逝，享年79岁。

宁海“辛酉之变”

杨 墨

清咸丰十一年（公历1861年），岁次辛酉，自山东济宁东进的捻军，路过宁海（今牟平），攻城三日不下，解围而去。在本县历史上称此事为“辛酉之变”。

有关捻军的历史资料，在各大图书馆中非常丰富，但涉及本县的却很缺乏。在本县范围内，除《州志》、《旧县志》中的简单记载外，再有，也只是王腾甲（王腾甲，字坛甫，号蛟峰，大窑乡北杏林堡村人，光绪间岁贡生。）所著《捻匪志实》一文（见1936年编《牟平县志》卷九，下同）。而上述各书的作者，都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捻军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这样的资料，当然是不能称为“信史”的。本文旨在从一些“反面材料”中，指明其破绽之处，为捻军的“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不掳掠”提出依据，一洗长期以来流传在牟平一带对捻军的诬蔑不实之辞。本文按日历体记事，编前简述了捻军发起、壮大的经过；编后又补述了捻军离开本县直至彻底失败的过程。使读者对捻军过境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清文宗咸丰三年十一月

（公历1853年12月）

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湖北各地农民，组织捻军，起义抗清。

“捻”，就是“捏”的意思。各地的贫苦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剥削下，濒临死亡的边缘。他们忍无可忍，组织起来，“捏聚”成队，对清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人称他们为“捻子”。江苏的淮安、徐州、海州，安徽颍州、亳州、寿阳，河南的安阳、汝南、光山，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湖北的襄阳、枣阳、钟祥、随州，各股义军，一时并起，每一股即称“一捻子”。小捻子数人，大捻子多至一、二万人。

本年二月（公历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九月（公历10月），北上的一支太平军进攻天津，占领静海县。各地捻军乘机于十一月（公历12月）在安徽省涡阳县雒河集发动了一次最大的起义。虽为时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但捻军的势力却如燎原大火，已燃烧到更为广大的地区了。

咸丰五年

（公历1855年）

各股捻军共同推举张乐行（清政府官方文书中叫“张落刑”，故意用谐音改字，对捻军首领进行诅咒诬蔑）为盟主，称大汉永王。

同年8月（公历9月），张乐行率众复据雒河集，分其众为五旗，向江苏徐州、安徽宿州、山东曹州、河南归德进军。清兵竭力堵截，捻军来势迅猛，不可抵挡。

咸丰六年九月

（公历1856年10月）

清兵进攻雒河集，捻军遂并合各路人马，放弃雒河集向河南的陈州挺进。

咸丰七年

(公历1857年)

张乐行接受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升为北征主将，又封为沃王。此后，捻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南阳，攻下固始、舞阳、叶县、嵩阳（以上各县都属河南）。江苏的邳县，山东的鄆城，安徽的寿州、霍邱、巢县，陕西的商南，也在捻军的控制之下。捻军的游骑一直探到直隶（今河北省）大名府（今邯郸市）城下，北京遂下令戒严。

咸丰十年七月

(公历1860年8月)

英法联军攻陷天津，随即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同年八月（公历9月），捻军攻入济宁、菏泽。山东大震。9月（公历10月）清政府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简称僧王，蒙古人）督师，前来山东“剿捻”。

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

(公历1861年9月)

东进的捻军由李成、张平（清政府官方文书中作“张閔刑”）率领，进至招远、黄县等地。本县开始建立地主武装，做好迎击捻军的准备。据《捻匪志实》载，本县“倡为

团练，百十为群”，“每团设团长一人以率领之。”曲纬，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一个“东关团长”。姜格庄镇北山村的曲泽长、郝家疃的郝书升，也都受过统治阶级的欺骗，在御捻中立过“战功”。民团“因山垒石墙为卫”，储积石块，准备在捻军到来之时，“自山巅投巨石为炮”，以击捻军。事实证明，捻军势如排山倒海，所向披靡，决非几道石墙能以阻挡得了。大批捻军，选了几处薄弱环节，翻过墙去，绕至乡团背后，乡团腹背受敌，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乡团都是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不是捻军的对手。正如王腾甲《捻匪志实》中所说：“不量力而与之斗……，被害尤惨。”孟浪口之战，乡团贺方茂、贺二少（二人均系姜格庄镇姜格庄村人），都是参战的骁者，前者颈中一枪，喉管露出一寸多长，逃回后当夜丧命，后者被捻军捉住，投入火中烧死。捻军所杀的都是地主豪绅的爪牙、帮凶，是贫苦农民的对头。对于普通的善良乡民，捻军是不肯滥加杀害的。

本县境内的一些较为陡峭的山脊，至今还留有乡团防御捻军的石墙遗址。地方父老多以为是隋唐两代征伐高丽时的遗物，或以为是明代防倭时所筑，这两种传说都是错误的。隋唐两代舟师都在莱州海口和城山出海（城山即今之成山，属荣成），与本县无关。况当时中国主动渡海远征高丽，胶东地方充其量是后方供应枢纽，决不会在此建筑工事，取防守之势。至于明代防倭，虽有卫、寨、所等建筑，但都建于海滨便于瞭望的高地，内地绝对没有。卫、寨、所多为方城或圆城式，为正规军队所筑，工程较为牢固。今石墙遗址竟遍布于县境各地山上，越岭跨谷，蜿蜒相属，而又时有间断，工程极为敷衍草率，可知为本地乡民仓卒筑成，与隋唐

远征高丽及明代防倭毫不相干。

同年九月初一日至初二日（公历10月4日至5日），捻军包围福山县城，分兵北向烟台，占领通伸冈，杀死前去游说的美国人豪尔迈斯与哈尔开尔。英法两国舰队前来镇压，开炮轰击，捻军稍退。九月初三日至初四日（公历10月6日至7日），捻军自福山向东挺进，宁海（今牟平）的风声越来越紧，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人们时刻登高远望。晚上，西方的天色红而兼紫，捻军与清军鏖战的火光已经可以望见了。乡下的富绅纷纷携带家眷逃入城内。一路惊恐万状，有的遭到趁火打劫的乡团恶棍的抢掠，有的半路丧命。城内骤添大量人口，柴米油盐和住房都很困难，他们经不起这种种折磨，得病死于城内的很多。如午台南港村（原属牟平，现划入芝罘区）退職知县杨逢篁一家，逃入城中仅三、五日，就死去了两个小少爷。因不敢回家安葬，将其草草埋在南关外的一块地里。

九月初六日（公历10月9日），捻军进入宁海州西境（莱山镇与现划入芝罘区的初家镇）。

九月初七日（公历10月10日），捻军直逼宁海州城下，清军将四门紧闭。从乡下到城里避难的人，因为晚来一步，都被关在城外，仰望城上号哭。城上开炮射击，城下受惊的乡民与捻军混杂，互相践踏，伤亡很大。乡民想进城不行，只好四散逃亡，有的被捻军捉住。捻军如何对待乡民呢？王腾甲在《捻匪志实》中有一段描述：

“其奔于山者，盗追至喝曰：‘释兵’，则诺。曰：‘牵驴’，则诺。违者死。”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乡民只要肯放下武器，表示归

顺，并给他们牵驴，捻军是决不轻易杀人的。

九月初八日（公历10月11日）。

捻军纵火焚烧关厢，击败东关团长曲纬，乡团死伤多人，捻军大获胜利。但由于城内守备严密，各乡地主豪绅多集中逃匿于此，由知州王赞思、宁海营都司孔广苞、学正（相当于现教育局长）王厚阶等率领登城固守，捻军攻城终不能克。

九月初九日（公历10月12日）。

捻军继续攻城，踏木梯向城上攀登。清千总王万春在城上燃放二千斤大炮，捻军骑兵数名中炮牺牲。（按，本文中所记日期，全据《捻匪志实》。王腾甲是本地人，不会记错。但戴燮元《东牟守城记略》中的日期却都晚记一日。这是因为，戴当时在登州府城之中，当他接到宁海军报之时，就必然会晚一天了。）

九月初十日（公历10月13日）

捻军攻城三日不下，遂解围西去。东进文登之捻军，在本县昆嵛山与清军激战，不能取胜，也改道西上。自初六日进入州境至此，前后一共六日。

九月十一日（公历10月14日）

捻军西去已远，逃避在外的人陆续返回家园。

在短短的6天当中，牟平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灾难。死人上万，损失财产无算。但这场灾难不能划在捻军的帐上。而是封建官吏、地主、豪绅及其乡团一手造成的。今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杀人问题。据《州志》、《旧县志》记载，此数日中，“各乡被害甚惨……计男女死者7000余名。”而《捻匪志实》中则谓：“事平，邑侯（县官）察访殉难人数

以闻，死亡凡万余口，采访所不及者尚多。”不管是七千也好，一万也好，总起来说当时死的人确实不少。但都不是捻军杀戮所致。主要原因离不开以下种种：

（一）在捻军来此以前，官绅、地主就散布谣言，把“长毛贼”的形象说得凶恶狰狞，极为可怕。乡民信以为真，扶老携幼，逃往深山穷谷。在逃亡途中，官兵与乡团，趁火打劫，使这些逃难的人“悲叹者、饮泣者、对诉家人离散者、错杂盈耳”。他们所见到的是：“天地异色，空无飞翔之鸟”，“昼则烟雾弥漫，夜则火光四照。”处处是无路求生的景象。有些人怕捻军来时身首分离，为了保留一个囫囵尸首，不得不“赴池井、投岩壑”以死（以上所引，都是《捻匪志实》中语）。这些人根本没见到捻军，就被清政府的虚伪宣传骗上了死路。

（二）逃难的乡民有些直接死于乡团之手。王腾甲就曾写道：有了石墙，“盗不能度”。“当其时避难过此者，往往指为奸细，横被杀戮。”这几句话，就是乡团杀人的铁证。

（三）乡民接触了捻军之后，逐渐认识了他们纪律严明态度和蔼，知道了他们也是在地主官绅的压迫下，不得已走上革命造反的道路的。捻军也对乡民做说服动员工作。《捻匪志实》中载：“捻匪之来，语人曰：‘吾等皆良民……急而为此；今吾为若患，若行亦匪矣。’”意思是：“我们都是好好老百姓，被逼急了才走这条路。现在你们也活不下去，何不跟我们一起造反呢？”当时就有不少农民加入了捻军。官方对这种“发动参军”，称之为“裹胁”，也叫“掳夥”。据《旧县志》记载，被“掳”的达八千二百余人。实际上，其人数远过于此。因为还有三、四千人（按死亡人数之一半

估计)是被记到死人帐上的(参军者的家属怕受牵累,故以已死上报).把跟随捻军起义的人当成死亡的人,这是当时所谓死人很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 捻军不是绝对没杀过人,有时杀得还很“惨”(痛快)。土豪、劣绅和一些顽固对抗捻军的团长、团副及其鹰犬爪牙们,捻军是格杀勿论的。有些人轻信地主阶级的虚伪宣传,编入乡团为统治者效忠卖命,如姜格庄村的贺先道、贺方茂、贺二少,星石泊村的梁双喜、曲兴等,都是捻军来时顽固抵抗给清军做了牺牲品的。

(五) 捻军走后,有的人极力宣传“长毛贼”杀人之惨,甚至编出荒诞的神话。如《捻匪志实》所言:“邑南乌爪、鹰嘴石二山,死者甚众,每天阴辄闻鬼哭云。”乌爪山(又名五罩山,在玉林店乡东南)、鹰嘴石(位于玉林店乡西北,山顶有一块高耸岩石,状如鹰嘴,故名)一带,多枭鸟(猫头鹰)、角鸱(老角,角读jiǎ)鸺鹠(哭灵鸡),每逢天阴月黑,常发出凄厉的鸣声。他们就将其说成是“鬼哭”,造谣至此,亦属可笑。

第二,关于奸污妇女的问题。捻军过境时,是否奸污杀害过妇女呢?回答是否定的。捻军走后,地方官府对殉难人数作过调查。当时社会上对烈女、烈妇极为尊敬,如有拒奸被杀的妇女,必将其姓名事迹申报上司,请求旌表而载入地方史志。官吏与绅士是不会漏掉一个烈女、烈妇的名字的。但从《州志》、《旧县志》中,竟一个在辛酉之变时拒奸被杀的妇女也找不出来。这就是一个铁证,它说明捻军纪律严明,奸污与杀害妇女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捻军过境时,妇女听到捻军东进的警报,畏惧自杀的却大有人在。《旧县

志》记载的就有四例：

1.崖子镇（现属乳山）孙承孟妻于氏，“咸丰辛酉捻匪之乱，闻警自缢。”

2.倪秋水妻张氏，“辛酉秋捻匪寇牟平……寻姑与夫，不见，“自缢于林间。”

3.上潘格庄曲毓丽妻赵氏，“咸丰辛酉秋，南捻扰境……逃难山中……投缢松树上。”

4.“刘希珍妻曲氏，守节四十余年，辛酉之难，五日不食而歿。”

以上四位妇女（实际上，未登《县志》的为数甚多）虽然都死于辛酉之难，但连捻军的影子也没见到，就畏惧“自裁”了。这与《捻匪志实》所言，“妇女之贞洁者，皆自裁，林木丛杂间，一树辄缢数人”，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官吏、豪绅大造谣言，给妇女们造成严重恐怖，逼她们走上死路，却又血口喷人，嫁祸于捻军，其居心是极为恶毒的。

第三，关于抢劫财物问题。捻军本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善良农民，他们参加捻军的目的主要是“求生”，并不是“发财”。他们随军转战，离家很远，今天活着，不知明天死在何处。捻军踪迹飘忽，行军不赍粮草，不带輜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所至之处，利在速战，一战不胜，即改道他往。这样一支队伍，不要说它有严明的纪律，即使纪律松弛，也不会抢一些累赘之物拖住自己的后腿的。要说抢劫，那只能是乡团中的土豪恶棍所为。他们是本地人，抢了东西可以送回家去，返身再抢。更可以利用其“保卫地方”的职权，冒充捻军，巧取豪夺，混水摸鱼，搜刮财物。说捻军抢掠财物，实际上是“贼喊捉贼”罢了。

清穆宗同治二年二月

(公历1863年3月)

僧格林沁大破捻军于雒河集，张乐行在蒙城牺牲，其侄张宗禹（清政府官方文书作“张总愚”）代领其众。

同治三年

(公历1864年)

捻军首领张宗禹与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会师。

同治四年四月

(公历1865年5月)

捻军设伏于曹州之西，诱使僧格林沁进入埋伏圈，将他击杀于麦田中。

僧格林沁是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他的死，大快人心，捻军声威因之大震。清廷对僧格林沁的死厚加恤典，下令各省、府、州、县，都要为僧王立庙。宁海州的僧王庙建于城内曹家巷内。因侵犯了遗爱祠的基址（遗爱祠所祀，系龚大良、周道浚、李湖、胡道垠四人，是牟平人最爱戴的地方官），牟平父老愤愤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光绪末年初办邮政，人们趁机将僧王庙中的神主与画像毁掉，就其地改为邮政局（邮政局所在的曹家巷，后来改称孙家巷。民国年间邮政局迁至大街，人们仍习惯地称孙家巷为僧王庙或老邮局。1952年后，牟平一中曾用为女生宿舍）。

同治六年五月

(公历1867年6月)

捻军首领任柱、赖文光、张宗禹各率众10余万，自济宁冲过运河继续东进。警报传至本县，乡间的地主豪绅又纷纷逃入城内，家在沿海的则投奔养马岛中（因捻军上次过境时未进此岛，这次到岛上避难的特多）。至于贫苦农民，经过上次变乱，亲见捻军不抢不杀，再说，家贫如洗，也没有什么东西怕抢，所以，这次跟土豪劣绅逃跑的就很少了。

此次闻警，也无人牵头办团练、修石墙了。地主豪绅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敢再出来“螳臂挡车”；贫困农民更不愿意再给他们卖命。所以捻军如入无人之境，本月攻下登州（蓬莱）。

六月初（公历7月初）

捻军进攻烟台，兵备道潘蔚邀同英、法驻军，共同守御，捻军不能取胜，改向东进。

六月十五日（公历7月16日）

捻军游骑探至宁海城下，疑城中有备，不攻而去。分兵南下海阳，东进文登、荣城。

此次捻军过境，因人民对捻军已有所了解，不再轻信谣言而惊慌失措，盲目轻生自尽的也没有了。“长毛青面獠牙杀人如麻”的谣传，已不攻而自破。

本县民户中，有的至今还保存着捻军的刀、剑等物。他们听祖父说，有的捻军，把刀、剑交给小孩，逗他们玩耍，逗着逗着，听到紧急号令要整队出发，就匆忙入队而把刀剑

丢下。可见捻军与农民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

十月（公历11月）

捻军叛徒潘贵升，杀首领任柱降清。

十二月（公历1868年1月）

太平军遵王赖文光，屡败于潍县、寿光，率众南下，牺牲于扬州。

同治七年六月

（公历1868年7月）

捻军首领张宗禹，败走茌平，至徒骇河，投水牺牲。捻军至此，全部失败。。

双林前惨案纪实

李文夫

1940年古历7月6日，昆嵛县第1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双林前村，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双林前惨案。

一、双林前惨案的背景

1940年前后，共产党领导的东海抗日武装昆嵛县文西县大队2区队经济小组，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展隐蔽斗争，扩大经济来源，加强抗日前线武器装备。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敌占区。当时，胶东地方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豪劣绅固然清楚，对地主、富农以至富裕中农却没有政策性的界限。敌占区内的人民群众，由于受日伪反动宣传的欺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政策，既不了解更不信任，潜入敌占区活动的经济小组，牢记党组织的一条重要指示：“不准动贫苦百姓的一草一木，不准拿贫苦百姓的一针一线。”责令大户交枪、交钱、交物、交粮，参加抗日救亡。地主恶霸对经济小组恨之入骨，与日伪保安机构联合起来，图谋报复。

双林前村地处烟威交通要道，是日伪控制的紧要地带，村东3华里，是日伪的酒馆据点，村西8华里是日寇金山寨据点，村南3华里有日伪的南山炮楼，国民党杂派军商立端部，盘距在离双林前西20余华里的序班庄村，也控制着双林

前一带，时常派兵扫荡清乡，对经济小组的斗争造成了很大威胁。

二、经济小组情况

经济小组于1940年春在昆嵛县（现文登县）的板桥村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昆嵛县文西县大队负责人王良，19区负责人张吉英等。刚成立时10人，多数是县大队和区队的骨干。组长谭庆丰，乳名金厢，昆嵛县1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南松山村人，身材高大，性格刚烈，20岁左右参加革命，是年27岁，文西县大队骨干。其父谭廷贵，人称谭老两，是昆嵛县19区（现文登县初村镇时家一带）地下交通员。指导员夏仁钦，读过几年书，精明、老练，是昆嵛县（现文登县）兰木沟村人，文西县大队骨干。成员有：胡忠亭、又称老胡，30多岁；贺吉胜，又名贺吉昌；王志礼，均系昆嵛县（现文登县）院下村人。刘福初，昆嵛县（现文登县）阎家泊子村人，元文海，昆嵛县（现文登县）长乔店子村人。王宝山，昆嵛县（现文登县）卫家泊子村人，此人小矮个，脸上有麻子，在双林前惨案中贪生怕死，叛变投敌。王德生，昆嵛县1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南松山村人。后来，经济小组在活动中又发展了一些成员，留在当地做地下工作，侦察敌情，提供情报。如：贺先恒、都兴福，昆嵛县第1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北松村人。双林前惨案前夕，经济小组共有十三、四人。

经济小组受昆嵛、文西县大队（两县一个大队）2区队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铲除为日寇效劳的汉奸走狗；到伪

乡、区公所或匪兵、团丁、土豪劣绅大户家去搞金银钱财，武器弹药，支援大部队抗日。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经济小组的武器装备很差。组长谭庆丰有两颗单打一匣子枪，指导员夏仁钦有一颗撸子手枪，其余的人有两支长枪，两支短枪，多数成员只有两颗手榴弹。10多人的经济小组，总共不到10支枪。

经济小组内部还专设了一名物资保管，由王志礼任保管员，对小组缴获的枪支弹药、金银钱财负责登记、收藏和上缴。

三、潜入双林前

经济小组初期活动在昆嵛县（现文登县）的长乔、泊子一带。1940年5、6月潜入敌占区双林前村一带。双林前的联络点设在组员贺先恒的姐夫都本善家中。都本善的家在村南“孤梢”上，南面靠山，有利于撤走，4间旧草房，独门独院，屋内有个地窖子便于隐蔽。都本善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对共产党忠诚，靠得住。经济小组凡是到双林前一带活动，差不多都住在这里。

7月初5日傍晚（双林前惨案的头一天），经济小组接到情报：昆嵛县19区（现文登县初村镇）时家村孙喜宾家中有4支枪。当时，有人说孙喜宾在国民党游击队当兵，有人说孙喜宾在鬼子（日寇）炮楼当伪军，诸说不一。但他确实是个当兵的，有人看见他曾背着枪回家过。谭庆丰和夏仁钦得到情报后，立即带领胡忠亭、贺吉胜、王德生、刘福初、元文海、王宝山等人奔赴时家村，将孙喜宾堵在家中，逼其交

枪。孙喜宾咬定没带枪回家，经济小组只好做罢。

从孙喜宾家撤出之后，谭庆丰率小组成员来到昆嵛县19区队长张吉英家中（张吉英家住时家村），吃了晚饭，天稍微有点月亮，谭庆丰不甘心就此空手返回根据地，决定到敌占区去活动一次，搞点战利品再回去。

从张吉英家出走时，天上已经没有月亮了。他们摸着黑向敌占区出发。当时日伪统治区内封锁得比较严，大道上有巡逻队，要害地方有岗哨。他们不敢走大路，只好转弯抹角走山道。行至昆嵛县1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南松村南，王德生提出顺便回家看看。他与谭庆丰商定第二天早晨在双林前都本善家相会。自此分手，王德生操近路回家，其余人员在谭庆丰的带领下继续往双林前走，下半夜时分摸进了双林前村，敲开了都本善家的门，荫蔽在都本善家的地窖子里。

四、走漏风声

经济小组到双林前的前几天，有伙身份不明的人曾在这里闹腾了一场。他们先到开绣花厂的曲文亭家去劫钱。曲不在家，只有一个小伙计（曲文亭的外甥）在柜上。他们硬逼小伙计拿钱，小伙计不从，拉扯中枪走了火，把小伙计打死了。他们又到开杂货铺的都本申家去要钱，也没有要出钱来，而后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伙匪徒的来龙去脉至今没有查清，有说是老商的便衣，有说是一股土匪，还有的把这笔糊涂帐硬赖在经济小组身上。从此，都本申晚上不敢在家中睡觉，东躲西藏，一宿换一个地方。

7月5日晚上，都本申躲在本村都元里看葡萄园的铺子里睡觉。这块葡萄园座落在都本善的房后。下半夜都本申起来小便，发现经济小组的人进了都本善的家。都本申以为经济小组是土匪，急急忙忙跑到伪村长曲作恕家去报告。曲作恕立刻带着都本申找到曾干过伪区长的曲华臣。三人经过密谋，连夜到伪秦村乡公所驻地（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南么山村）去报告。当晚，伪乡长曲学绍（南么山村人，地主出身）外出办事去了。号称国民党游击队司令的商立端，带着一个连的兵力下乡清乡，宿在南么山伪乡公所。曲华臣等人便将经济小组的情况报告了商立端。

五、双林前被困

1940年7月初6日凌晨，商立端紧急集合队伍，在曲华臣三人的带领下，向双林前进发。

商立端个子不高，一双小眼睛常常眯缝着，人称商瞎子。他曾在威海当过道士，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好枪法、好骑术。他为人心狠手辣，只要他睁开双眼就要杀人。他号称司令，其实手下总共不到400人。总部设在序班庄。兵员成份大部分是胶东一带的地痞、流氓、无赖、兵棍，有一部分是捉来的穷苦子弟。武器装备除了长枪、短枪以外，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

曲华臣、曲作恕、都本申三人在前头跑步引路，商立端骑马率队紧跟，从南么山到双林前约6、7里路，天蒙蒙亮时赶到了。他们怕经济小组的人跑掉，采取拉网包围的阵势把双林前村围住，逐步缩小包围圈，向经济小组荫蔽地点都本

善家集中。这时候，都本善担着水桶到西井挑水，刚走到井边，发现一股大兵围过来。都本善吓得放下水桶就往家跑，到家后，把发现的情况报告了谭庆丰，催促经济小组快逃。都本善本人怕呆在家里吃亏，就先出家逃走了。

谭庆丰没想到会走漏风声，更没想到老商来得这么快，一时不知虚实，便召集小组成员们研究对策。还没等他们拿定主意，商立端的兵已经把都本善家团团围住了。商立端先命人将歪把机枪架在都本善门口对面，并占领了其它有利地形。接着向屋里喊话，叫屋里的人出来，然后又向空中鸣枪警告。直闹腾到7、8点钟，都本善的妻子贺氏抱着不满周岁的小闺女出来探望了一下，经济小组的人一个也没露面。商立端火了，命人在房子周围堆上柴禾，都本申从自家的小店铺里提来一桶煤油，浇在柴禾上。商兵在四周点燃，霎时大火熊熊，整个房子成了一个火球。

在这危急关头，谭庆丰第一个冲出来，亮出双枪向敌人射击，两枪打伤了两个敌人。他目已被对面的歪把子机枪射中胸部，当场牺牲。其他经济小组成员全被俘捉。

商立端得胜后，将谭庆丰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双林前村头的树上枭首示众，其余的经济小组成员都被绑起来，都本善的妻子也以“通匪”的罪名，一起绑架到南么山村伪乡公所。

六、英勇就义

夏仁钦、胡忠亭、贺吉胜、刘福初、元文海、王宝山等经济小组成员，被捆吊在南么山村曲氏祠堂梁上。商立端亲

自刑讯。他先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经济小组的人理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抗日的，锄奸的！”商立端又问：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枪在哪里？”经济小组成员严守秘密，不予回答。商立端命人用皮带挨个抽打。经济小组成员守口如瓶，不肯吐露半点机密。商立端气急败坏，剥光了经济小组成员的衣服，命人点着整箍的香，用火红的香头往经济小组成员身上乱触。小组成员们一个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从上午9、10点钟，到下午2、3点钟，不管商立端用什么残忍的手段刑讯逼供，都没有达到他的罪恶目的。最后，他下令在村中找了5、6个人，到南么山东山猪岚芥下脚的一个草坪上挖坑，要活埋经济小组成员。

下午5点钟左右，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夏仁钦、胡忠亭、贺吉胜、刘福初、元文海、王宝山等人，在商部的重兵弹压下，互相搀扶着走出了曲家祠堂，其中有一个被折磨得抬不起头，迈不开步，被两个商兵架着，连拖带拉往东山走去。

经济小组成员被押到东山已挖好的坑前。杀人坑深2尺，宽约3尺，长约6尺。商立端嫌坑太浅太小，逼着经济小组成员自己挖。经济小组成员宁死不屈，坚决不挖。商立端又命群众挖。几个挖坑的群众吓得直打哆嗦。商立端改变了活埋的主意，命人将经济小组成员架到坑前跪着，命一刽子手用大刀片一刀一个将人头砍下，然后将尸体搬进坑内。有一个经济小组成员，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直挺挺地站着，坚决不跪，两个商兵按都按不倒，被商部的一个头头用手枪打死，倒在坑内。南么山村有一农民目睹这惨无人道的情景，当场吓得昏了过去。这时，经济小组成员王宝山，在生死关头，屈膝变节，向商立端供出了经济小组成员名单。商立端没有

杀他，命人将坑埋好。在埋坑时，南么山村有一大户，因经济小组强令他交钱抗日，怀恨在心，抱起一块大石头，砸在倒在坑里的经济小组成员的尸体上。

商立端为了尽快抓到其他经济小组成员并找到武器，没有返回南么山村伪乡公所，留下双林前都本善的妻子交伪乡公所处置，由叛徒王宝山引路，直接从南么山东山向东而去。他们走后，双林前村的族长用钱和烟土把都本善的妻子保了出来。

都本善脱险以后，跑到沙子村亲戚家躲藏起来，直到家中平稳后才回家。

王宝山带领商部兵马直扑昆嵛县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北松村，于当天晚上（1940年古历7月6日）抓住了刚发展为经济小组成员留在北松村做地下工作的都兴福。商立端经过威逼利诱，妄图使都兴福投靠他们。但都兴福不肯变节，当即被商立端枪杀于北松村头。叛徒王宝山又带领商部到昆嵛县（现文登县）晒字村，捉住了在那里开展工作的贺先恒。商立端逼迫贺先恒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并威逼他写信给在“抗大”读书的弟弟贺进路归顺国民党反动派。贺先恒义正辞严决不投敌。商立端恼羞成怒，将贺先恒残杀于晒字村。接着，王宝山又引商部的全部人马直扑昆嵛县西院下村。由于王宝山的出卖，当时中共院下党总支领导成员：王阳、又名王言清，贺吉昌、又名贺继兴相继被捕，在西院下村当众枪杀。后来，王宝山一直死心塌地跟随商立端，为镇压抗日武装和共产党人的商立端效忠卖命。

商立端残杀了谭庆丰、夏仁钦、胡忠亭、贺吉胜、刘福初、元文海、都兴福、贺先恒、王阳、贺吉昌等经济小组成员，

共产党员以后，对革命烈士的亲属也不放过。商曾多次派兵到谭庆丰、贺先恒等家中抄家。谭庆丰的妻子为了躲避敌人的谋害，保住谭家的后代，带着6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到养马岛逃生。谭庆丰的父亲谭廷贵，在昆嵛县19区（现文登县时家一带）跑交通，不敢归家，1940年11月份被日寇捉去，杀害后尸首不见。贺先恒的妻子在贺先恒牺牲以后，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加之商立端时常抄家，生活极度困难，不久也在贫困交加中死去。

七、惩处元凶

商立端的罪恶行径，激起了胶东抗日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极大愤慨。昆嵛、文西县大队领导人王良等起草了消灭商部、惩处叛徒，为死难烈士报仇的报告。并把惩处叛徒王宝山的任务交给了2区队（又称锄奸队）。1940年古历7月底（双林前惨案后20天左右），2区队终于找到王宝山的行踪，在烂木沟附近的一个山坳里叛徒王宝山被2区队的一个锄奸小组逮住，在押往县大队的途中，王宝山妄图逃跑，被锄奸小组当场击毙。

1941年正月14日，胶东抗日武装五支13团高建纯团长率部，威海独立营营长白希斌率部，昆嵛县、文西县大队领导人王良率部配合，将双林前惨案的制造者，暗中与日寇勾结，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的商立端部，团团包围在序班庄。商部大部分士兵望风丧胆，不战而降。商立端与几个死党拚命抵抗，企图突围。商立端从房上向下跳时，被他的一个勤务兵从背后击毙。商军残部见大势已去，有的缴械，有

的逃跑投靠了日寇。

1944年古历7月初9日，昆嵛县第11区获得解放。在双林前惨案中遇难的烈士亲属，向人民政府司法部门控告与惨案有直接关系的曲华臣、曲作恕、都本申三人。1946年春，昆嵛县法院将曲华臣、曲作恕二人逮捕归案，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49年刑满释放。都本申因双林前惨案后，不敢久留家乡，携老带少跑到沈阳投亲去了，此次判决没有捉拿到案。

1951年正月，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遇难烈士家属又向人民政府控告。曲华臣、曲作恕重新被昆嵛县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春，昆嵛县人民政府、县法院在11区（现牟平县姜格庄镇）西念村的东河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曲华臣、曲作恕死刑，立即在大沙河中执行枪决。第二年春天都本申在沈阳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押回原籍，在姜格庄西北塔判处了极刑。

八、祭慰英魂

双林前惨案发生后，由于商立端及伪乡公所的反动宣传，把遇难的烈士说成土匪。有许多群众不明真相，信以为真，革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为了悼念革命烈士，为死难英雄正名，1946年早春，昆嵛县人民政府决定为双林前遇难烈士重新安葬，并召开追悼大会。

追悼会会场设在南么山的东山下（烈士殉难地），出席会议的有昆嵛县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烈士的家属和11区的干部群众约2000人。县长陈英序亲自主持追悼会，向人民群

众宣讲了烈士为抗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追悼会结束后，举行了烈士尸骨安葬仪式。政府制作了新的大红棺木，雇了10多个喇叭匠奏乐安葬。参与制造双林前惨案的（当时还没有被处决）曲华臣、曲作恕（都本申在沈阳）被押到死难烈士的坟前，扒坟、拣尸骨、包裹入棺、抓土掩埋。从此，烈士的英名昭然于众。每年清明佳节，双林前一带的群众，都到烈士的墓前凭悼和缅怀先烈的英灵。

头颅抛民主 热血洒和平

——记辛冠吾烈士

都兴华 常毅传



1946年9月10日，胶东军民万余人在莱阳隆重集会，沉痛悼念辛冠吾烈士。会场上悬挂着许世友司令员感情真挚的亲笔题词：“冠吾同志，你为了和平而死，你博得了广大人民的敬爱。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命令残害你的赵保原已被人民斩首示众。冠吾同志，你安息吧！”

现在反动派又在大规模地进攻解放区。我们准备一切力量，给予敢于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来保卫人民，来纪念你！”

头颅抛民主，热血洒和平。辛冠吾同志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胶东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

立志革命 投笔从戎

辛冠吾同志，名可汉，字冠吾，1908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莱山镇金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从小学习刻苦，好

学上进。1931年考入牟平师范讲习所。在读书期间，他目睹了官府的腐败无能和社会的愚昧落后，立志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刻苦研读进步书籍，努力寻求救国之道。毕业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踏上了教育岗位。

冠吾同志任教于牟平县立一小。一小是牟平县人才萃集的地方，冠吾同志以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在教育界崭露头角。1932年，他任系山小学校长，力主改进教学方法，废除体罚，深受师生爱戴，并得到教育局长于镇西的赏识，1933年被任命为教育局视导员。

“9·18”事变后，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辛冠吾同志怀着极大的热情，借查学工作之便，四处奔走，抨击社会的黑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参加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但在当时情况下，他的努力犹如一块碎石投入汪洋大海，只能激起一朵几乎难以觉察的浪花。中国的前途究竟何在？冠吾同志开始对教育救国的信念产生动摇，他在进行着新的探索。

1934年春，经王甫同志介绍，冠吾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牟福边党委成立后，王甫同志任书记，冠吾同志担任了宣传委员。

1935年，冠吾同志受组织委派，以教学为掩护到福山珠玑村开辟工作。他创办了《新路》刊物，宣传革命主张；他在教员中发展党员，成立支部，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936年，因组织暴露，冠吾同志被迫离开珠玑村，到牟平上庄小学任教，负责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并继续办《新路》。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略中国。1938年，日寇在烟台登陆。冠吾同志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冠吾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于1938年秋，冲破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挠，到达蓬、黄、掖抗日根据地。从此，在他的革命征途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丝不苟 克己奉公

辛冠吾同志到蓬、黄、掖后，初任职于北海专署，1939年转至蓬、黄战区指挥部。历任班长、中队指导员、北海独立营教导员、特务大队政委、团宣传科长、支队敌工科长等职。1943年调东海军分区任敌工股长。

敌工工作政策性、保密性很强，加之东海军分区敌工部门刚刚建立，既缺少干部，又没有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困难极大。为了打开敌工工作的局面，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作风严谨扎实，办事一丝不苟。对于本区一些敌伪骨干分子的姓名、籍贯、性格、爱好、主要罪行以至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他都弄得清清楚楚，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各县来的敌工人员，互相不能会面，他就一一单独接见，分别进行指导。同志们都反映，遇到问题只要辛股长一指导，心里就亮堂了。在辛冠吾同志的领导下，东海敌工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

冠吾同志帮助同志一贯态度诚恳，循循善诱。他既不允许任何人对工作有丝毫马虎，又注意讲清道理，讲究工作方法。有个青年同志，一次抄写信件字迹潦草，考虑到这是个

新同志，冠吾同志没有对他进行批评，而是自己工工整整地把信件重抄了一遍，然后坐下来和这个青年促膝谈心。他说：“写信的目的在于达意，字写得好坏还在其次，首先要写得端正清楚，才能使人不浪费时间，不产生误解，这才是对革命负责。如果一味图快，写得潦潦草草，就会贻误工作，给革命造成损失，可万万不能把抄抄写写当成小事啊！”一席话说得青年同志心悦诚服。后来，这位青年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这是我踏上革命岗位后上的第一课，它使我懂得了怎样对待工作。冠吾同志的教诲，使我终生获益。”

冠吾同志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克己奉公，一尘不染。早在他担任“互济会”领导成员时，就节衣缩食，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用做组织活动经费。到东海后，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而敌工部门由于工作的需要，经费比较充裕。但冠吾同志严以律己，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工作上，从来不沾一点便宜。他常说：“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研究我们。做敌工工作特别要注意把住生活小事这一关，如果稍有疏忽，就不仅不能争取、瓦解敌人，甚至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按规定冠吾同志应吃中灶，但他很少单独开饭，警卫员每次把饭打回来，他总是抢着吃粗饭，最后把馒头掰开，和同志们分着吃。有个青年干部要到敌后去，冠吾同志担心他在敌后穿着太寒酸，不易隐蔽活动，就把自己的毛衣送给他。在冠吾同志惨遭杀害以后，匪徒们想从他身上发点财，但搜遍了他的全身，除了公文包里的几本书和证件外，只有一只牙缸和一双翻毛牛皮鞋。一个共产党的中校代表，竟然如此清贫，就连敌人也不得不十分赞佩。

深入虎穴 屡建奇功

辛冠吾同志胆识过人，智勇兼备。战时他总是亲临前线，除了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外，还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对敌劝降，屡建奇功。

1944年秋，我军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8月24日，在攻克牟平重镇水道据点的战斗中，辛冠吾同志通过喊话，使驻水道西山据点中伪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

8月26日，我军乘胜包围了牟、水之间的玉林店据点。为了瓦解敌军，减少伤亡，冠吾同志再一次亲临前沿阵地喊话。当时辛冠吾的名字已经广为传开，东海伪军差不多都知道有个很厉害的辛股长。玉林店的伪军听到喊话后，在碉堡里答话：“要我们投降得请辛股长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战斗的胜利和同志们安全，冠吾同志决心只身入虎穴，迫降敌人。他当即挺身而出：“我就是辛冠吾！你们既然看得起我，请打开门让我进去，我们共同商量。”他进入碉堡后，伪军中队长石一民点头哈腰：“请辛股长指教。”冠吾同志先向他们介绍了我军秋季攻势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接着对他们说：“玉林店据点比水道怎样？石队长怕是心里也有数，不到一天功夫，水道日军就全部被歼，西山伪军也弃暗投明，你们怎么办？水道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冠吾同志在指出牟平日军不过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之后说：“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担保按‘反正’待遇。要是迟疑不决，等战斗打响之后再缴枪，那可就是俘虏了。”辛冠吾同志逼视着石一

民：“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走错一步，何去何从，石队长表个态吧！”石一民见辛冠吾同志说得句句在理，事实上也别无出路，只得带着一个中队的伪军乖乖地放下武器投降了。

1944年11月6日，东海军分区接到报告，威海刘公岛伪军600余人，在教官郑道济率领下反正，在双岛港登陆时，被我地方武装阻挡于双林前村，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形势紧张。辛冠吾同志奉命兼程赶到双林前村，立即同郑道济举行会谈。见到郑道济的代表连城后，辛冠吾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在刘公岛杀死日军、汉奸，我们深为钦佩，请问今后有何打算？”连城回答：“我们出来是为了抗日，欲向贵军借道。”辛冠吾同志微微一笑：“抗日这是件大好事。现在，胶东也和全国一样，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共产党领导下，胶东抗日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而所谓国民党领导的正统军队，有的早已溃不成军，有的已和敌伪同流合污。在这种情况下，“道”我军可以借，只怕你们无处可走。如果真正要抗日，只有参加八路军这一条路。冠吾同志态度诚恳，分析透辟，使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连城，深为折服。经过磋商，双方达成协议：这支部队保留原编制，开赴根据地整训。不久被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就这样，冠吾同志依靠党的崇高声望和正确政策，引导这支举棋不定的队伍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1944年底，辛冠吾同志调胶东军区敌工部任副部长。不久接受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打入平度城伪军绥靖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平度城为胶东西部的门户，是青岛、潍县、烟台的连结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除了伪军外，还驻有日军一中队，是日军“蚕食”、“扫荡”大泽山

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据点。冠吾同志打入王铁相部的任务，一是摸清平度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伺机争取王铁相部投诚。深入敌人心脏策反、索取情报，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辛冠吾同志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冠吾同志取得了王铁相的信任，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在日寇投降后，在王铁相感到大势已去，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冠吾同志趁机做他的工作，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王铁相也有投降我军的意向。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派人给王铁相送来一信，任命他为第九军中将军长；要他坚守平度，迎接“盟军”和“国军”在青岛登陆。王铁相象捞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召开会议，宣布改变番号，并准备暗害辛冠吾同志。

冠吾同志见劝降已无可能，机智地返回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见到辛冠吾同志，非常高兴，他根据辛冠吾同志提供的情报，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武力解决平度城。1945年9月8日，我军向平度城发起总攻，全歼守敌六千多人。王铁相被俘后见到辛冠吾同志，他喃喃地说：“悔不听你的良言相劝，才弄得今天头破血流。”冠吾同志不无嘲笑地回答：“这就叫自作自受！”

奔走和平 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了内战。1945年8月，毛主席亲自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会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7日，双方同时发布了

停战令，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指挥部，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成立“三人小组”。“军调部”21小组高密小组，负责调处胶东国共两党的矛盾。三方代表是：国民党的黄靖（正）、李先良（副），共产党的武可久上校（正）辛冠吾中校（副），美方的逖克（正）、摩尔（副）。从此辛冠吾同志为国内和平事业，朝夕奔波在胶济线上。唇枪舌剑，与美蒋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5月10日，三方首席代表飞往北平汇报，军调处事宜由三方副代表负责。在冠吾同志参加的第一轮会谈中，就遇到了美蒋方面代表的严重挑衅。会谈开始时，照例由美方代表从中介绍。摩尔介绍说：“这位是国民党代表李先良将军”，“这位是共产党代表辛冠吾中校。”当辛冠吾同志与李先良礼节性地握了手后。摩尔又介绍说：“这位是国民党代表赵保原师长。”赵保原戎装笔挺，抢先一步，向辛冠吾同志伸出了手，但他得到的却是辛冠吾同志的冷遇。

赵保原是什么人？他是胶东最大的汉奸，欠下了胶东人民累累血债。1945年他的老巢被我军一举捣毁，狼狈逃窜，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暂编十二师的师长。美蒋两方竟然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塞到谈判桌上，真是荒唐至极。

辛冠吾同志不露声色，他对赵保原不屑一顾，转而严肃而又不失礼仪地质问摩尔：“请问今天是谁跟谁谈判？”“当然是国共两党举行谈判”。“谈判的主题是什么？”“双方共谋和平”。“既然如此，这个大汉奸赵保原有什么资格参加？把这样的民族败类作为代表，国民党将自己置于何地？”冠吾同志穷追不舍，咄咄逼人。“这……这……”

摩尔理屈词穷，无言可答。冠吾同志庄严声明：“如果美蒋双方节外生枝，就是破坏谈判，我马上告辞，一切后果由贵方负责。”斩钉截铁，寸步不让。摩尔无可奈何，只好把赵保原“请”了出去。

摩尔本以为辛冠吾只不过是一个书生，不会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岂知第一个回合就吃了败仗。在以后的谈判中，冠吾同志又以坚定的立场，锐利的谈锋，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美蒋的阴谋，维护了我党的严正立场。但是，那个被驱逐出谈判会场的赵保原则对辛冠吾恨之入骨，图穷匕首见，阴谋对辛冠吾下毒手。

1946年5月20日，天色阴晦，辛冠吾同志由高密乘火车返部述职，路经蔡家庄赵保原驻地时被卑鄙地绑架了。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英勇不屈，就义在敌人的屠刀下。

冠吾同志在返部述职时曾对仲曦东同志讲：“在‘三人小组’工作，最大的苦闷就是看不到战友和同志。”仲曦东勉励辛冠吾同志：“处境危险，多加小心，沉着冷静，善自珍重！”冠吾同志表示：“我会谨慎大胆，坚持这项工作的。为了和平事业，我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他以宝贵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庄严誓言。

革命音乐家安波

曲言训 曲兴澜



安波同志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音乐艺术家，又是一位坚强而成熟的革命音乐事业的

的组织者、领导者。他离开我们已经23个年头了，但他宽宏坦荡、公而忘私的胸怀，他联系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极深的怀念之情。他改编和创作的大量歌曲，不仅在战争年代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即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回响在延河两岸、大江南北和白山黑水之间，使人如感时代的脉搏、如闻战斗的号角，起到鼓舞斗志激人奋进的作用。

安波原名刘清禄，1915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庙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名刘玉涛，母亲孔氏，终身务农。安波兄弟5人，本人行五，还有一个妹妹。20年代后期，安波家道衰微，安波的父亲供四、五个学生读书，深感困难，要求减免一个学生的学费，校长又坚决不允，只好节衣缩食，硬着头皮让4个学生读完了高小。尽管家境困难，可安波求学心切，哭闹着非要报考初中不可。1931年竟以第一名的

成绩考取牟平中学。在校期间，安波每学期都得到校长（宫建斋）亲书的“品学皆优”的鼓励。安波除学习课本以外，对文学、历史、音乐、美术以至民间工艺等都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课余时间常到图书馆读书。图书管理员有事，索性就把钥匙交给安波管理。有时借到几本好书，读诵吟哦，采剥华实，咀嚼膏味，爱不释手。怕误了还书日期，只好晚上一个人在厢房点着油灯抄录。鲁迅的一些杂文，冰心的《繁星》，他都精心原文抄录过。父亲怕他熬坏了身体，又怕浪费灯油，常去命他熄灯休息。他只好把灯捻拨下，待全家人睡好后拨灯再抄。安波的零花钱也全用在买书上。买书没有钱，就向母亲要（安波的母亲属书香门第，读书知礼），母亲就让他把学过的唐诗或宋词给家人讲一遍，讲对了，才给钱。安波就一字一句绘声绘色地为全家人讲述，往往讲得全家人入迷。家中实在拿不出钱来，安波就让母亲借钱买毛线，再根据自己所学的民间工艺，编结各式各样的毛线花篮，到牟平大集卖钱以备买书之用。在小学期间，安波经历了1929年春天的刘珍年、张宗昌的牟平之战，“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军阀之间，仍然混战不已。少年时代的安波对此很为不满，写出了好多诗歌，大意是“中国人应该一条心，共同对付侵略军”。可惜这些诗歌没有保存下来。

初中毕业后，牟平教育局想留下安波做视导员，安波的父亲也因为前4个儿子都经商，想让他在教育界任职，当个小学教师也好。但安波执意要到济南求学，哭了一宿，第二天起了一身疙瘩，父亲无奈，只得应允。但只给安波一半川资，幸得三哥（刘清钧）的支持，才凑足了路费，考上了曲

阜师范。1934年转学济南师范。在济南师范由于党组织及许多进步教师、学生的教育带动，安波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曾任济南学联秘书长。1935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担任济南师范党支部书记。1937年党组织派安波同志到鲁南费县，以师范讲习所教员的职业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党内任省委特派员。去费县之前，安波曾写了一封家信，大意是“为了国家的兴亡，为了民族的尊严，儿决意南下。儿奔走他乡之口，犹如承欢膝下之时……”。此后，直至解放前夕，家中再也没得到安波的消息，只是风闻安波在济南被捕，也有人传说安波在南下时为国捐躯了。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安波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成了延安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生。翌年又入延安鲁迅音乐学院学习，结业后在鲁艺工作了七八年之久，先后担任过鲁艺教务处教务科长、政治课研究室主任、鲁艺音乐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延安民众剧团教员等职。1945年12月至1949年春，安波同志先后担任过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总团长，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冀察热辽联大鲁迅艺术学院院长。1950年春至1964年2月，先后任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兼辽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1964年2月，调至北京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5年6月18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是艺术家

安波同志是为了响应党的抗日救亡的召唤走向延安的。

在去延安以前，几乎和音乐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从事音乐活动的志向。陕北公学毕业后，本想返回故乡，做党的地下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种种原因，组织上决定要他留在延安，派他到鲁艺学习。这个决定完全出乎他的预料。进鲁艺后，曾想到文学系学习，将来从事文学创作，但当时文学系还未建立起来，最后还是决定到音乐系学习，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只要党需要，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从安波进鲁艺到新中国成立这十几年时间里，安波始终是以一个抗日战士、解放战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想到自己是一个什么音乐家，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具有什么永恒的艺术价值。那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就是战士，创作就是战斗，作品就是武器，写歌谱曲演剧扭秧歌，都是为抗日救亡、解放全国人民服务的。救亡图存、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就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主题。

1945年冬天，安波领导的胜利剧社在承德（热河省的省会）诞生了。冀察热辽地区，受伪满洲国的长期统治，有的青少年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认为是伪满洲国的臣民。在农村，日本帝国主义把方圆几十里的屯子聚集到一个据点，筑成“人圈”。农民缺吃少穿，过着非人的生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发展东北革命根据地，准备将来转入反攻。形势又要求革命文艺工作快速开展。面临一片荒芜之地，一些同志，自然地产生了畏难情绪，如何发动群众参战呢？如何迅速开展革命文艺呢？安波同志根据大家的看法和建议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也处于

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以自己特殊的武器去发动人民，并把这种特殊的武器交还给人民，又与人民在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殊死战。不仅把革命文艺送到群众中去，而且要从群众中产生出革命文艺来。”（安波《论文艺上的发动群众与改造民间艺人》）实际上，安波自到鲁艺，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一直是把音乐做为完成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遵革命先驱者之命，以革命斗争的需要而驰骋南北、组织筹划创作演出的。安波深知，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音乐工作者，还肩负着组织领导文艺事业的重任。要组织好、领导好文艺事业，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音乐艺术家，光有先进的思想不行，还必须掌握好革命文艺这个武器，必须熟练地运用艺术的手段，才能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读者，感染读者，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为了探求音乐艺术的真谛，掌握艺术的规律，安波的时间表上，简直就没有休息的地位。他是最能“开夜车”的，8小时工作制对他毫无意义。大脑超负荷地运转，神经过度兴奋，睡觉时也唱歌。在热南山区坚持斗争时，和安波同屋睡觉的一个同志很调皮，听到安波睡不安枕时随意哼的曲调，他想，准是又在创作，于是速记下曲谱。第二天，出示安波，安波视唱，觉得还有点韵味，惹得同志们哄堂大笑。为了扩大艺术视野，打开中外艺术交流的窗口，他每天坚持学习一小时的外语，日积月累，从不间断。安波是音乐家，在音乐方面是内行。可他长期领导的工作，却不是纯音乐性质，而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说唱等综合的艺术。这样他面对的局面是由内行变成外行，但安波认为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解决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就得一点一

滴，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学习，如他对戏剧的学习就下了很大的苦功。亲自带领同志深入生活，创作剧本，为了提高剧本质量，他又精心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安波学习的信条是“于书无所不读，万物皆有可观”。他曾用很大的功夫钻研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天道酬勤，重劳必有重获，虽然安波的作品大多是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急就章，但绝不是超越生活的政治口号的图解，而是革命洪流中人们真情实感的提纯与升华。安波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造诣很深的音乐艺术家，完全是精心探索、锲而不舍，为完成党的事业献身拚搏的结果。

安波同志在生活上，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1947年初，热河地区胜利剧社，改建为“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安波由剧社社长改任团长，同年秋天，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建立了，安波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由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兼任），实际主持全院工作，直到1948年底。南下前夕，学院分为6个艺术团体，4个南下，两个留在东北。安波同志是留下的。同志们仍然习惯地称他为“社长”，老同志则常常直呼他为安波，对这一点他非常满意。“社长”、“院长”、“团长”三参其职的安波半点架子也没有。冬天他头戴旧狗皮遮耳帽，军服满身油渍，身背大三弦，一双用带子捆帮在脚上的旧布鞋……。在行军途中，老乡们常常称他是“八路伙夫”。安波同志很能吸烟，特别搞创作的时候，吸得更厉害，一支接一支。打游击战时，不但买不到纸烟，有时连烟叶也买不到，他就弄些向日葵叶子或棉花叶子来代替。他就是抽着这样的“香烟”，酝酿谱写《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的。1963年，安波任辽宁省文化工作部部长时，在兴隆修改他撰写的长诗《雷锋颂》。去看望他的老首长、老部下很不少，烟抽了一包又一包。当客人走后，他还是蹲在地上拣满地烟头，准备扒出烟丝抽他的小烟斗。1949年，安波同志到东北文工团任团长。当时一些领导同志都住在“神社”大院里，安波把稍好的住房让给其他同志，自己住在较差的房子里。三辆自行车，把两辆较好的分给两位副团长，留下一辆很破的车子自己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安波同志浮肿得很厉害，他把好的饭菜偷偷地拨些给别人，自己勉强支撑着。为了节省汽油，他尽量不用汽车，皮包别在自行车上，跑到省直，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安排生活。1964年安波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时，以后到任的程云、莎莱同志发现他的书桌里，还用旧报纸包着干硬的饼干，两个剩馒头，一块咸大头菜……。安波说：“这是开夜车的晚餐，饿了，啃几口还很能解决问题的。”程云同志看着他黑瘦的面孔（其实那时他已患了癌症），劝他保重身体。他说：“这辈子我大概不会料理自己了，好在惯了，本钱花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划不来的。走，我请你们去四川饭店打牙祭，也给自己加点油，行了吧？”安波同志的稿费自己用得很少，不是交了党费，就是给了工会，再不就是接济了生活困难的同志。

安波同志做事非常认真，外出开会或调查，都有详细记录，他的字写得很流畅，但难辨认。对别人的要求也很严格。会议《简报》，他不但认真看大样，而且改之又改。他布置的任务，总要有个回音，尤其是对下面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从不拖沓敷衍。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也不随声附和。

1960年海默同志因为写了电影《洞箫横吹》和几篇文章受了批判，并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婆也离了婚。安波同志因事上北京，听说后，一夜没睡觉，一个劲地吸烟，怎么也想不通。第二天就同洛汀同志商量，如何帮助安慰海默同志。第二年秋天，安波同志见到了习仲勋和陈毅同志，言简意赅地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情况，直言“海默这个人不是反党的，写《洞箫横吹》的全过程我是清楚的。”之后，陈毅同志调看了电影《洞箫横吹》，并为《洞箫横吹》说了好话。安波同志对同志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温暖，但却从来不拉私人关系，在他人生的“辞典”里，查不出什么叫特权。安波有个外甥女叫孙淑静，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1961年，捎信给在沈阳当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的安波同志，想依附舅舅，在沈阳找个工作。安波同志立即回信，说明“三千六百行，行行出状元，知识青年在农村同样可以升学读书，同样有前途。不通过正当途径，到沈阳也是无法落脚的。”

安波同志处于领导地位的胜利剧社和东北、辽宁艺术剧院，不仅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有不少有名气的音乐家、导演、剧作家、诗人以及名演员，这就更给领导工作增添了难度，因为安波同志能坚持党性原则，礼贤下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发扬民主，有很强的团结同志共同工作的凝聚力，大家信赖他，支持他，爱戴他，因此，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非常出色的。

重视人才，培养人才

安波同志在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上既有宏观的战略思考

又有微观的战术措施，他在文艺事业上的建树，象他在创作上的贡献一样，使人难以忘怀。一些文艺机构的建立，一批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一些领导者的成熟，大都融汇着安波同志的心血。在安波同志27年的音乐生涯中，尤其突出的是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和爱护人才。

1951年夏天，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过去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工团，要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剧场艺术。同年秋天，刘志明同志（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到鲁艺（东北鲁艺，院址沈阳）来检查工作。在一次汇报会上，安波提出将东北鲁艺的音工团、实验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合并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剧院的设想。刘志明同志当场表态说：“这个想法好，就由你安波来操办。”安波同志又亲自起草了定名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建院方案，提出具体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1952年10月2日东北人艺正式建立。东北人艺对推动当时东北地区的文艺工作，繁荣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东北人艺还开办了许多学习班，有各个专门业务门类的，也有文化知识方面的。还请了好多位外籍教员给大家讲课。为了扩大充实文艺队伍，安波同志还亲自到音乐学院同劫夫同志一起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提前毕业，到辽宁歌剧院工作。后来大都成了辽宁省有影响的歌唱家。东北大区撤消以后，中央从东北调走了一大批文艺骨干。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一批同志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批判。那时安波在越南当文化专家回国不久，没有赶上反右派斗争。回国后，对此迷惑不解，说“有些是延安培养出来的红小鬼，怎么会反党？”常常连声叹息。在北京

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到东北演出的节目少而差，说了东北文化比较落后的话。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火青同志，下决心要把辽宁的文艺搞上去，专门成立了省委文化部，安波当了部长。当时正逢三年困难和“左”的发展时期，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之后，又有反对文艺修正主义斗争等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打开辽宁文艺复兴的新局面是相当困难的。当然，首先还要解决人才问题。安波往返奔波，亲自跑了四五次北京，同洛汀、王丕一同志一起去商调干部。一次一次地找周扬、林默涵同志，找陈克寒同志，找徐克霄、王敏同志，请调干部，还请田汉、阳翰笙同志帮助呼吁。这一次调来60多人。不少都是专家和领导干部。如戈阳、海默、刘炽、牧虹、胥树人，王一达、牛犇、白大方、卢肃、张敦等同志。这些同志都是相当有才能的。但有的受过批判，有的已戴上帽子，有的甚至是所谓的“极右派”。要顶住当时舆论的非难，敢冒这个风险，没有很大勇气是做不到的。这实际是思想上和行动上对“左”的抵制。这件事，在“文革”中被称为“招降纳叛”的重点事件，进行揭、批、查，当时安波同志已经逝世，在九泉之下是否安宁，不得而知。

安波还十分关心和重视少年儿童的艺术事业。早在承德热河军区胜利剧社时，他就积极主张在剧社中办一个少年儿童艺术班，他说：“革命文艺必须培养后来人，应当开创少年儿童艺术事业，培养青少年艺术人才，这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并安排陈星同志在赤峰中学招收了一批青少年，组建了一个“少艺班”，“少艺班”随军演出非常活跃。1948年10月，安波同志任冀察热辽鲁艺院长时，他又组织人在锦州招收一批青少年充实少艺班。同年冬天，国民党海军

“重庆号”军舰起义，安波同志要“少艺班”去葫芦岛为起义官兵演出。小演员情绪极高，演出了《秋收歌舞》。观后，起义的官兵赞不绝口，说：“真想不到你们小小年纪，处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有这样好的训练，演得这么好！”

当时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设在离内蒙天义几十里处一个叫那拉比流的蒙古村里。1948年秋，敖德斯尔（现为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蒙古青年到鲁艺学习。蒙族同志大多不懂汉文，对文艺更是生疏，感到不适应文艺工作，心里很苦恼。安波同志就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讲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革命者对困难应取的态度。当时严正同志为他们上戏剧课，汪洗同志教器乐，石化玉和许直同志教识谱和声乐。那拉比流有一座美丽的教堂，高大宽敞而又干净，鲁艺就利用这座异国建筑做为教室、礼堂和食堂。进入排练阶段以后，没有蒙文歌曲、剧本和演唱材料，安波同志就鼓励敖德斯尔和其他蒙族学员自己动手写蒙族人民和骑兵部队的斗争生活。当时不少的蒙族青年，大胆地拿起笔来，写出了蒙文歌词和剧本。安波同志看了非常高兴，说现在我就给你们谱曲，将来你们自己也要学着谱，蒙古民族的新文艺，就靠你们这些同志去创造和发挥！”

1960年左右，有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在反文化领域的“修正主义”运动中，说杜甫反对统治者开边黩武的古诗《兵车行》是“和平主义”，有的教授因讲授了《兵车行》挨了批判。安波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让林岩同志去该校中文系了解情况。他还亲自找了这个系的总支负责人谈话，进行严肃批评。认为在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发生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什么批判，而是一种愚昧无知！批判《兵

车行》是“和平主义”，一时传为笑柄。

1961年下半年，随着古巴革命的成功，木青同志作了一首《我生在哈瓦那》的歌词，以一个古巴孩子的身份唱古巴的现在与过去。送交李劫夫同志审阅。劫夫同志谱了曲，但认为歌词有点轻飘，和木青同志一起请安波同志修改一下。安波同志头疼得很厉害，还是带病为木青同志修改了歌词，并把歌名定为《哈瓦那的孩子》，曲子也作了修改。《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歌曲》等报刊，相继发表了这首歌曲。古巴指挥家来华访问时，也特意指挥演唱了这首歌。

1962年木青同志又应安波同志之约写出了另一首国际儿童题材的作品《黑孩子保罗》。不想“文艺整风”时，木青同志被当作典型，批倒批臭，决定把木青同志的名字从《哈瓦那的孩子》中除掉。这时安波同志亲自出面为木青同志说话：

“我是看着木青长大的，他的本质是好的，如果说有什么责任也不全在木青同志。”为木青同志顶住了一场意外风波。关心他人，理解他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替别人说话是安波同志坚持始终的作人准则。他不愧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学艺为人的楷模。

系民族之精魂，发时代之强音

安波的音乐创作活动，是从1938年进鲁艺音乐系起步的，在此后的20余年中，他写了300余首歌曲。他的歌曲，反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的使命、人民的呼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他的创作契机及作品节奏与历史的脉搏是

同步跳动的。安波歌曲作品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题材和主题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1937年，鲁艺成立，一个以采集、记录民歌为中心的学习民间艺术的活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安波就是采集、记录、演唱、整理民歌的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仅1938年他一人就收集民歌200余首。并因此获得“小调大王”的亲切称号。在以后的20几年中，安波除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外，一面进行音乐创作，一面进行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开拓着一条艰难的民族音乐的创新之路。

安波的音乐创作起步于填词歌曲，填词就是当时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他所改编或填词的许多歌曲，如《怎么办》、《夜摸营》、《参军曲》、《迎接新阶段》、《腊月里开议会》、《移民与船夫对唱曲》等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秧歌运动”中填词的《公祭刘志丹》、《拥护八路军》等歌曲，至今仍伴随着时代的生活节奏鸣响不已。《拥护八路军》是以陕北民歌《打黄羊》的曲调填词的，采用“打花鼓”的形式演唱。安波填写的五段歌词，与原民歌曲调结合得水乳交融，并根据歌词的语言、情绪，部分改变了曲调，例如：

1 = F 2/4

5	↓	7		5	↓	7 7		5 3	5 6		1	—	
猪		啊		羊		啊你		送到	哪里		去?		
6	1	2 . 2		3 2	1 6	5 3	5 6	5	—				
送		给那		英		勇的		八呀	路		军。		

全曲以热烈欢快的情绪，表现了边区群众拥军活动的动人场面。不久它就成为一首新民歌，广泛传唱于边区军民之中，解放初期又传遍了全国。《公祭刘志丹同志》所选用的陕北民间音调，后来成为哀乐的主题，一直沿用至今。

继填词改编之后，安波创作了大量节奏鲜明强烈、曲调质朴生动、通俗易唱、亲切感人、富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音乐作品。影响较大的有《七月里在边区》、《兄妹开荒》、《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因为有了共产党》、《运动战·歼灭战》、《人民一定能战胜》、《三绣金匾》、《就义歌》等。《七月里在边区》是1942年6月，安波与马可、张鲁、刘炽、关鹤童5人，为了庆祝抗战5周年，

歌颂陕甘宁边区火热斗争生活合作的民歌联唱。安波同志除了作词以外，还为其中的第三段《开会来》谱了曲。《开会来》是一段幽默的男声对唱，它通过两对“亲家”的对话，歌颂了边区人民的民主生活，洋溢着清新活泼的生活气息：

1 = C 2/4

5 5 6 3 2 1 | 1̣ 6# 4 5 | 5 ——— | 5 6 5 2 5

甲，亲家你打从哪达儿来？ (乙)乡政 府

2 5 2 6 7 | 1 2 1 2 3 | 1̣ 3 3 3 | 1 2 3 6 5 |

开会来。(甲)开会商议的什么的事？(乙)三言两语

2 3 1 6 5 |

讲不 明 白。

安波在这里吸取了陕北说书音乐灵活自如、流畅如话的音调特征，人们从绘声绘色地对唱中可以看到诙谐纯朴的音乐形象。《七月里在边区》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它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民主生活的几个侧面，音乐语言非常亲切动人，群众风格、民族风格十分鲜明。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有了简单的生活情节，还对个别人物作了浮雕式的刻画。比《黄河大合唱》、《河边对口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是《黄河大合唱》到《兄妹开荒》秧歌剧之间的一座桥梁。

如果说《拥护八路军》和《移民与船夫对唱曲》表现了安波对民歌音调的发掘与独特继承，《兄妹开荒》则反映了他在创作民歌旋律方面的卓越才能。1942年，为了配合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羊路由同志根据陕甘宁边区劳模马丕恩开荒的事迹，编写了秧歌剧《王小二开荒》，以后根据群众统称的《兄妹开荒》定名。安波同志在谱曲的过程中，对原剧本几次进行了增删润色。他以群众熟悉的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运用作曲技巧，以自己掌握的大量的陕北民间音乐为素材，推陈出新，进行了新的创作。1943年春，安波同志完成了《兄妹开荒》的谱曲工作。在排演过程中，演员王大化、李波二同志对剧本又出了不少点子，进行了反复修改。当年春节由王大化、李波在延安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延安《解放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剧本和音乐，并于1944年4月24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兄妹开荒》，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兄妹开荒》全曲共446小节，其中前奏31小节；第一曲59小节；中间打击乐8小节；第二曲58小节；第三曲166小节；第四曲112小节；尾声打击乐12小

节。音乐民族风格浓郁，旋律优美，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其音乐主题的呈示是：

1 = F 2/4

1̣. 6 5 | 2̣. 6 5 | 1̣ 6 5 4 2 | 5 — |
 雄 鸡 雄 鸡 高 呀 么 高 声 叫，
 5 6 5 4 2 | 5 6 5 4 2 | 2 5 2 1 7̣ | 1 — |
 叫 得 太 阳 红 又 红。

音乐给人以清新明亮的印象。高亢明快，生动贴切地展现了“雄鸡高声叫，边区好地方”的崭新面貌。而后的××××××|××××××|××××××|××××××|××××××|××××××|旋律线的节拍脉动使曲调蒙上了载歌载舞的流动感和喜气洋洋的气氛。整个音乐，气势跌宕，风格统一，词曲合璧，丝丝入扣。

《兄妹开荒》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绽开的一朵芳香四溢的奇花。它是新秧歌剧的开拓者，是安波的代表作。《兄妹开荒》新就新在以新的内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音乐语言，奠定了秧歌剧内容形式上的基本格调，奠定了秧歌剧音乐的基本风格，对后来的秧歌剧创作以至整个音乐创作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安波的音乐创作，还涉及其它一些音乐体裁。50年代，安波创作了大型歌剧《纪念碑》（安波、严正、海默编剧，安波作曲）和《草原烽火》（安波编剧，安波、张颂、刘守义作曲）。在《草原烽火》中，安波试图突破“话剧加唱”的歌剧样式和歌谣体的音乐结构，在音乐戏剧化和民族化的道路上，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在戏曲和说唱音乐的改革方

面，安波也做了很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他在建国初期参加了评剧《小女婿》、山东琴书《大闹与小兰》的音乐改革和唱腔设计工作，获得了重要成绩。其中《小女婿》中的《小河流水》一曲，尤其新颖明快，脍炙人口。

如何继承借鉴我国的民族文化，怎样创建既有中华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新文艺，这是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内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安波同志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道路，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安波曾说：“我不反对‘旧瓶装新酒，’我也填过不少词。但是如果需要我们造‘新瓶，’为什么不呢？否则，学了作曲，又有什么用呢？”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作家在艺术上提倡“推陈出新”的可贵主张。安波认为，举凡真正的优秀之作，都是在独特的继承中，融入了独特的创造。继承中就含蕴着创造，创造的实际是对继承的纯化、优化和深化，没有创造的继承，是盲目模袭和机械承转，没有继承的创造，是舍本求末和无源之水。安波的许多优秀作品，不象许多作者那样，顺手牵羊，延序而下，而是在深入发掘古老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宏观控制和微观审视的基础上，发其本真，弃其疣弊，采百花而酿蜜。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别具风貌的艺术成果。唯因如此，安波的许多优秀作品，才能够永远回响在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

余音绕千古，硕果坠满枝

在文艺领域里，安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在民间音乐的搜集研究方面，在歌剧音乐的创作实践方面，在民

族戏曲的音乐改革方面，在音乐理论的评论方面，都作出了使人不能遗忘的贡献。

安波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悉心研究，集中反映在他亲自收集编撰的《秦腔音乐》、《东蒙民歌》和《越南民歌选》等三部著述中。

1945年2月，上级组织派安波同志到绥德“民众剧团”去整理秦腔音乐。安波克服了方言障碍，拜团内最有经验的一位老艺人为师，从一字一腔学起，由浅入深地学习了秦腔音乐的历史沿革、分布情况、声腔板式特征、文武场曲牌音乐、行当划分等问题。经过七个月的学习、研究、整理，编成《秦腔音乐》一书。《秦腔音乐》是我国第一本由音乐工作者系统整理而成的地方戏曲音乐的专门著作。1947年，安波任冀察热辽“鲁艺”院长、“胜利剧社”社长期间，在工作中接触到内蒙古东部的蒙族民歌。那些富有草原气息的民歌，使安波大开视野，耳目一新。《嘎达梅林》、《牧歌》使安波如痴如醉，于是他又开始记录、整理，译词配歌，写成了《东蒙民歌》一书。这本歌集分“歌词三部”（约100首）和“歌曲三部”（约80首）。《东蒙民歌》较全面地反映了东蒙地区民歌的基本面貌。为后人进行同类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56年至1957年，安波出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专家时，利用工作之余，与林荫同志一起，直接收集、整理越南民歌，写出了我国第一本由本国音乐工作者编选的外国民歌集——《越南民歌选》。《越南民歌选》的出版，在音乐界研究亚非拉民族音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三部民族音乐著述之外，安波还以惊人的毅力，写了30

多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几乎涉及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笔多采，为社会主义的音乐理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在戏剧创作方面，解放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首推五幕八场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剧本写于1953年，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全国兴起。《春风吹到诺敏河》在有限的篇幅内，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他维护和宣传了社会主义理想和合作化道路，批评了一部分单干农户的自私心理和保守思想。另一方面，也着力描写了农村干部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而其主旨则是批评了那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等“左”的偏差。剧中主要人物之一的高振林（党支部书记），以身作则地带领大家走合作化道路，同时又十分强调走合作化道路时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对于一些暂时不想入社的农户，主张说服和等待。有些农户（如合作社副主任崔成）私心太重，要拉马退社，高振林从实际出发，表示同意他们先退出去，相信合作社搞好了以后，他们会回来的。最后，剧中故事以县委把陈同志（一位不出场的人物，县里“左”的偏差和错误的代表）撤职和崔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而结束。当崔成问县委为什么撤了陈同志的职时，高振林的回答是：

县委说：“他太主观，不懂得咱农民！他把自己的糊涂思想当成政策，还要强迫别人去做，他光知道贪功劳，报成绩，可是实际情况一点也不去研究！”

这是单刀直入地对“左”的做法的批评。高振林还说：

去年秋后他来宣传了20来天，毛病就挺大。他说，明年咱们七区大部分互助组都要变成合作社，有个三五年都得

变成集体农庄，不变也得变，这不是太急躁了吗？……你说，我提的这些是不是实情呢？

今天，在结束了那种“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并从中引出了必要的教训以后，重谈《春风吹到诺敏河》怎能不为作者坚持理想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又怎能不引发出对他的深深怀念？《春风吹到诺敏河》，并非一出干巴巴的说教戏，相反，它充满了东北农村的生活气息。热情洋溢地表现了东北农民对新生活的喜爱，语言生动形象，妙趣横生，极富表现力。唯因如此，它才能引起强烈的反响，很快就传遍全国，并拍成电影，在各地放映。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头，《春风吹到诺敏河》及其作者，无可幸免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复辟倒退”、“为小脚妇女招魂”、“为××翻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各式各样的帽子一摞一摞地扣了下来。当时离世不久的安波同志，如果有知，也会感到啼笑皆非的。历史总是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假、恶、丑的东西最终会成为社会的渣滓，被真理的长河冲洗净尽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将作为一面镜子，永远发挥着它的借鉴作用。

1963年，《辽宁日报》发表了雷锋同志的事迹以后，身为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安波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组织文艺界同志开展学习、宣传雷锋的活动，并身体力行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雷锋颂》，很快见诸报刊。作者十分崇敬雷锋这个“人人能做，人人难做，平凡而伟大”的光辉形象。他称赞雷锋是“不锈的螺丝钉”，他歌颂雷锋是“高岩上之松”。其实，安波同志自己，早就做了雷锋后来所做的许多好事。他在《雷锋颂》后记中是这样讲的：

“雷锋同志既能以自己短促的一生为一切别的革命者做出了榜样，那么做为别的革命者的责任呢？我想除了应老老实实地向雷锋同志的精神、品质学习之外，还应大力宣扬这种精神，扩大这种精神，使其永垂不朽。”这段话既表现了安波同志的谦虚，也表现了他的自我要求。安波同志把毕生的精力，把他所有的黑夜和白天都用在工作上，用在完成党的斗争事业上。他很少想到自己，经常对家人讲，自己很健康，没有病，实际他的身体机器，因超负荷运转，主要部件都磨损得不可救药了。直到1965年进院检查时，才知道安波同志患的还是不治之症。1965年6月18日下午1时20分，安波同志与世长辞。

向安波同志遗体告别时，因为来的人很多，比原定计划延长了一个多小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曾授予他两枚勋章，希望在安波同志离开人世时给他戴上。追悼会由周扬同志主持，首都文艺界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与会者泣不成声，缅怀他鞠躬尽瘁的一生，痛惜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也为他的模范事迹和卓越贡献而自豪。死者长已矣，安波同志的精神，将永远鞭策着、鼓舞着我们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奋斗不息！

郑道济双林前反正

李 振 端

1944年11月6日晨，有大小4只舰艇在原文西县双岛港西沿靠岸。船一拢港，船上的军队、家属便匆忙登陆，并卸下船上的武器、辎重。这时，卸了一点多钟，空中有4架日本飞机，从西南方向盘旋追击。登陆部队和家属不得不躲避飞机的扫射和轰炸，并瞄准空隙往近海边的村庄移动。又因家属辎重所累，行进速度很慢，从海边到村庄虽有十五、六里路，直至下午，这支大约600余人的队伍才到达夏家疃、东场（原属文西十区，现属牟平县姜格庄镇）两个相连的不足300户的渔村。夏家疃和东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区。当时已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上级报告，区政府、县政府和东海地委均接到情报。从情报来看，这支队伍一没有日寇，二无烧杀抢掠行为，且带有很多辎重家属。东海军分区党委分析，很可能是威海伪军的一支起义部队。当即决定，调东海独立团一个营，文西独立营、牟平独立营以及附近的区中队和民兵，连夜向这支部队逼进，形成包围之势，待机行动。

果然不出东海军分区党委所料，这是威海刘公岛上的—支伪军起义的部队，他们属于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练兵营。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深感大势已

去，日暮途穷，先后从平津地区募集了一批青年学生和失业青年，以弥补兵员之不足。这批青年多数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或年幼无知上当受骗来到这被称为“水牢”的刘公岛，接受紧张的训练和从事繁重的劳役。他们长期受日寇的奴役与鞭笞，逐步体察到为日寇作鹰犬当炮灰，只能是死路一条。日寇的欺凌与奴役，激起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燃起了复仇之火。经过4个多月的酝酿发动和组织准备，终于在刘公岛上爆发了一次600多人（包括家属100余人）的武装起义。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郑道济。郑道济，原名郑钦业，山东省烟台市人。青年时曾在张作霖东北军葫芦岛航警军校兵科、士官科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海军第三航队的教导队任中尉队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海军弃舰南逃，郑未南下，在胶东参加国民党独立旅姜立川部任副团长、教导大队大队长、旅参谋处主任等职，后因看不惯姜的领导作风，由老上级王敬之介绍，于1942年秋加入伪汪海军，曾任伪练兵营区队少尉区队长，暴动时系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

其次是连城和毕昆山。连城，荣成县朱家圈村人，青年时代曾在大连学过徒，目睹日寇对我国人民的残害和侮辱，一气之下，返回烟台，在一家小商店写帐，不久商店倒闭，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骗干了伪海军。毕昆山，烟台人，与连城一起被骗加入汪伪军，起义时均任上士教练班长。截至1944年9月间，又发展了6名起义骨干（李仁德，教练班长。刘国璋，教练班长。王文翰，东海交通艇中士副艇长。崔大伟，练兵营卫兵队二等兵。于书，“同春”运输舰信号兵。于云青，练兵营军人小卖部卖货员，一等兵）。

经过4个月的秘密发动、严密组织和充分准备，终于在1944年11月5日下午1时30分举行了起义。起义弟兄们，同仇敌忾，在5个小时左右，就解决了岛上所有的敌伪机构，拔掉了伪汪海军势力最强的华北要港司令部，解放了海员，继之又歼灭了威海返岛的敌伪军，打死日寇17名，伪军官上校1名，中校2名，少校2名，尉官和个别反动老兵10余名，起义弟兄无一伤亡。起义胜利后，他们又砸开了武器库，抢出了武器弹药装到船上。到午夜12时他们才分乘1艘大船（“同春”号运输舰）3艘小舰艇（交通艇“日生利”、交通艇“东海”、23号内火舰）离开刘公岛，准备到牟平一带竖起抗日的大旗。但天亮时船才行至双岛港以北的海面上。为避免敌人的追击，被迫在双岛港西岸登陆，到了夏家疃、东场村。

进驻夏家疃东场之后，郑道济召集村民讲了话，大意是：我们原是刘公岛的伪军，杀了鬼子汉奸出来抗日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不骚扰老百姓的，请你们安心！你们供给我们饭菜，我们没有“北海币”（根据地流通的货币）给你们，海边的船上有很多粮食，你们尽管去拿……。之后，船上500袋大米和1000袋面粉，他们全给了老百姓，群众的疑惧稍解。

11月6日傍晚，部队在夏家疃村外集合，把所有的枪支弹药分发给每个人携带。为摆脱敌机的追踪轰炸，准备夜行军。经过一昼夜战斗的郑道济，仍然精神饱满，他站在一个不高的土岗上说：“弟兄们，我们的暴动成功了，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那个洋罪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我们要组织一支抗日的队伍，杀

鬼子灭汉奸，为国家出力，为无辜被杀的同胞报仇！”听了郑道济的慷慨陈词，战士们热血沸腾，情绪高昂。稍事休息之后，天已黄昏，部队便向牟平方向进发。由于人地生疏，虽然找了向导，也得边侦察边行进，速度很慢，半夜才到达了酒馆村，7日拂晓，到达了依山近海的村庄——双林前。双林前村，为烟威公路的必经之处，一条狭窄的汽车道直从村中穿过，日寇的汽车时有出现。为了不让敌人再次发现，部队迅速疏散荫蔽在村外的树林里。郑道济和几个起义领导人在一个偏僻的农户家中住了下来。村口要道都布置了岗哨。郑道济命令就地休息，待黄昏后再向西进军。

天大亮了。初冬的早晨格外清新，双林前周围的山林景色一目了然。这时，郑道济他们才发现，双林前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村南的刁儿山上，村东的小山包上，村西的小城子山上，到处有人影晃动。郑道济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登岸后，我八路军东海独立团一个营、文西独立营、牟平独立营以及周围各区的区中队、民兵，连夜兼程往这里赶来。郑道济感到局势突变，心情紧张。刘公岛暴动成功后，本想在牟平找个地盘，竖起抗日的旗帜，既不跟国民党走，也不跟共产党八路军走，要成立一支独立的抗日队伍。他们哪知身处孤岛，日寇封锁很严，闭目塞听，对胶东抗日形势一无所知。现在受到八路军的围困，何去何从，实在不好处理。要打，胜负难测姑且不谈，家眷、行李、辎重肯定要受损失。不打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出的队伍，再投靠八路军，实在不是心甘情愿的。郑道济本想借条路到牟平，现在遇到了意外的难题，心急火燎，矛盾重重。正当郑道济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之际，上午10时许，双林前的民兵副

团长曲作会连续转来八路军送来的两封信。信的大意是：对你们弃暗投明英勇杀敌的行为，我们深表敬佩，欢迎你们参加八路军共同抗日。此处不宜久留，望速派人上山谈判。

连城听说山上八路军有信送来，就急忙到郑道济处看信。之后，对郑道济说：“既然八路军欢迎咱们反正，共同抗日，我看咱们就投靠八路军吧！”郑道济表示不同意。连城说：“咱们从刘公岛暴动出来，不就是为了抗日吗？八路军打鬼子是坚决的，我们参加八路军有什么不好？”连城态度明朗，是有思想基础的，他的家乡山东荣成县朱家圈村，那里早就是抗日根据地了，连城很多亲友也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八路军真诚抗日的行动早有所闻。但郑道济执意借路开往牟平。连城无奈，只好去找毕昆山商量。一出门遇见王敬之和孙吾我二人，对他们说了八路军来信之事，并希望他们劝说郑道济。毕昆山这时正在双林前村西头放哨警戒，连城来后和他谈了八路军来信之事，并说暴动是为了打鬼子，参加八路军也是打鬼子，目标是一致的，还是参加八路军为好。毕昆山同意连城的意见，二人便同往郑道济处相劝。这时王敬之和孙吾我二人已在郑道济的房中，经多人反复磋商，郑道济终于同意了众人的意见，便商定谁去和谈和谈判条件。最后决定先派崔大伟接头联系，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愿意参加八路军，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不是缴枪投降；二、队伍不拆散不改编，干部不受训；三、家属要给予妥善安排。

崔大伟带着三条意见，出了村南同八路军谈判去了。双林前村南是一溜高坡地，直达刁儿山山麓。他走了约1里多路，文西独立营于教导员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二人会晤寒暄

之后，简要地谈了刘公岛暴动的情况，于教导员鼓励说：

“八路军非常钦佩你们在刘公岛杀鬼子的义举，并且欢迎你们参加八路军，共同抗日。”崔表示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態度，于教导员接着说，等一会军分区有人来同你们谈判，希望你们派一位能主事的代表上山来。崔大伟下山向郑道济汇报了接头情况和八路军的诚意，郑道济考虑确实到了关键时刻，遂决定派连城为谈判的全权代表。

连城在崔大伟带领下，上山见了于教导员，于教导员说：军分区派的人马上就到了。说话间，只见西面远处有五、六人骑马飞奔而来，顷刻间即到眼前。走在前面的是一位个儿不很高的中年人，后面跟着警卫员和通信员。这位中年人便是东海军分区敌工股股长辛冠吾同志。辛冠吾，牟平莱山人，他原来做过小学教师，抗日战争前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人民子弟兵八路军。他讲话精辟而有说服力，同连城一见面就直接了当地说：“你们在刘公岛杀掉鬼子和汉奸，出来抗日，干得好，干得好啊！我们非常敬佩你们的这一英勇的行动！”他顿了一下问道：“你们今后有何打算？”连城说：“我们把队伍拉出来就是为了抗日。”辛冠吾同志接着说：“你们要抗日这是件大好事，现在大敌当前，全国抗日烽火风起云涌，八路军挺进敌后英勇打击日寇，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损失很大，甚感兵力不足，他们龟缩在几个城市据点之内。他们在南太平洋战场上也遭惨败。小日本完蛋的日子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迷途知返，是有远见卓识的。但是，你们要知道，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你们若是真想抗日，那就

应该参加八路军。我这次来是代表胶东军分区首长和东海军分区首长欢迎你们参加八路军的，你们的意见怎样？”连城听了辛冠吾的切中要害的陈词，非常感动，遂谈了与郑道济商定的三条意见。辛冠吾听了很高兴地说：“你们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代表胶东军分区首长、东海军分区首长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接着又解释说：“你们参加八路军是光荣起义，当然不是缴枪投降，队伍肯定不拆散不改编，你们放心好了。至于干部受训问题，你们可能是听了敌人的反动宣传，把受训误解了。八路军训练干部是为了培养提高，恐怕到时候你们会要求受训的。家属的安排会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好。”这时辛冠吾同志用征询的眼光看着连城说：“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你们还有什么顾虑？”连城很兴奋地表示没有了。冠吾同志说：“那好，双林前这个地方离大海近，是个边缘区，为了你们的安全，应该迅速转移。你们回去准备一下，今晚7点向根据地出发。”

谈判成功了。当连城回来向郑道济汇报了谈判情况和结果后，郑道济也很高兴，表示同意。觉得十几年的戎马生涯，总算有了真正的归宿。这是共产党、八路军政策的胜利，也是郑道济决心抗日的结果，这完全符合暴动的全体官兵的心愿。当这一大好消息传开后，暴动的官兵欢呼起来了，山上的八路军欢呼起来了，山上山下一片欢腾。傍晚，抗日军民夹道欢送，郑道济带领全体官兵，在一片彩霞的照耀下，向根据地的腹心奔去，投进了党的怀抱，投进了祖国的怀抱。

11月中旬，山东军区授予这支部队以“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的番号，并于11月22日晚在文西县铺集召开了命名

大会，东海军分区首长宣读了命令，并致祝词，连城代表暴动部队致答词。郑道济被任命为支队长并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党庄严宣誓。从此，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转战南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为建国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忆父亲彭昭贤二三事

彭明桂口述 曲言训整理

屈指算来，父亲离家出走台湾已经40年了。听说他于十年前辞去人世。40余年，海峡两岸，咫尺天涯，父女不能相会，举家难以团圆，思念之情，难以言表。父亲对子女的倦倦之心，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处世态度，至今萦迴脑际，永世不能忘怀。

先父彭昭贤，字君颐。生前任国民党中央内政部长。我家祖居牟平县王格庄乡彭家村。父亲7岁时在本村私塾读书。所学《三字经》、《千字文》等，背诵滔滔不绝，常得塾师赞许。1911年，栖霞县铁口乡毛杨村拔贡林振声先生，办私塾课读。林先生为当地宿儒，慕名求学的人很多，祖父（彭文朴）就把父亲送到林先生门下就教。当时，兵荒马乱，家道艰难，祖父每年都变卖地里的青苗，为父亲缴纳学费，父亲读书异常刻苦，再加上吃不饱饭，时常吐血。祖父就炒一些豆子捎给父亲，饿了吃一把，补养身体，坚持学习。1913年，父亲考上了牟平师范讲习所，毕业后，被聘到本乡马格庄学校教书。有一次讲课，在黑板上把“算‘术’”的“术”字写错了，漏了个点。不巧被校董发现了。校董就找校长，说：“这个教师不能教学，连个‘术’字都不会写”。父亲得知后很生气，说什么也不教学了。和祖父要了几个路费钱，一气之下，闯了关东。

父亲在大连下船，一直流落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浪迹街

头，衣食无着，只得在一家邮局门前摆了个小摊，为人家写信糊口。

哈尔滨道台叫李家鳌，要挑个文书。亲朋好友举荐的，不是嫌“仪表太俗”，就是嫌“文笔不佳”，左右不如意。李道台有个买菜的回来说：“邮局门口有个摆摊写信的青年，只要说出大意，就能把信顺顺利利写下来，字写得也很漂亮。”道台让买菜的把父亲叫去，亲自进行测试，结果很满意，就把父亲留下了。道台是江苏人，无儿无女，看父亲为人严谨，办事勤奋，就把父亲当成亲生儿女看待。翌年，把父亲送到北大上学，毕业后在北大俄文专修班教俄语。1917年底，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胜利，国内战争创伤严重，生活困难，孙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我国派了18个代表，带着救济粮到苏联救济难民。父亲是18个代表之一。去苏以后，经李家鳌介绍，留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求学。1924年毕业回国，在南京谒见了蒋介石，留在南京工作，任国民党内政部统计司司长。1930年，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父亲随张治中调新疆省任民政厅厅长。1932年，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又以同学关系把父亲调到陕西省任民政厅厅长。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父亲调到重庆，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是张励生。张励生下台后，父亲任内政部长。1949年，南京解放，父亲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从此，骨肉分离，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父亲平素生活俭朴，对于女要求很严格。我的生身母亲叫张继星，和父亲是姑表兄妹，从小订了娃娃亲，夫妻不和。1924年父亲留苏回国后，和母亲离了婚，并在当时的

《胶东日报》上登了离婚声明。1926年，父亲在南京和袁晓琴女士结了婚。袁女士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和父亲结婚后，生下三个子女，大弟弟叫彭世真，二弟弟叫彭世诚，妹妹叫彭世美。父亲调任新疆民政厅长时，祖父、弟妹都留在南京，住在杨将军巷里，和邵力子比邻。继母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得产后热病，离开人世。我的生身母亲一直住在老家，直到老死，没有重嫁。我在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1942年，父亲调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我和表弟张保庸，表妹张为学，一行三人到西安看望父亲。当时他住在西安革命公园的一幢普普通通房子里。继母去世后，父亲一直没有续娶。我们去到以后，父亲还不认识我，经祖父介绍，才想起有我这么个女儿。当天晚上，父亲问及家中情况。我说：“母亲身体欠佳。”父亲说：“你母亲身体好了可以嫁人。”我向着母亲，和父亲争吵了几句。最后，父亲说：“你们青年人要多学点技术，你最好当个会计。如果能退回20年，我也一定要学工，不在政界干！”父亲还出了一些题考我们。“中国有几条大河？”“富春江在哪个省？”还出了一些时事题，现在我忘了，我们答得张冠李戴，很不完整，父亲批评了我们一顿。告诉我们，明天，每人要写一篇文章，题目自定。第二天我按时交卷了。我写的题目是《环境与人生》。为了论述环境和人生的关系，我举了一些古往今来的例子。大意是一些人处境困难，但胸怀大志，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砺意志，奋发图强，终成大业；一些人条件虽然优越，养尊处优，不求进取，必将一事无成。含沙射影地埋怨父亲对继母和继母生下的弟妹有偏心，对我和我的生

身母亲照顾不好。父亲看后，叹了一口气，对文章的立意、措辞，没加褒贬。只是说，我的语文程度还可以。接着又谈起，

“我在这里，生活还好。我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也无其它嗜好。你那三个弟妹，我怕把他们娇惯坏了，都送到你舅舅那里抚养着。”舅舅叫袁敦礼，留美学生，时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父亲还说：“村里有个叫彭明武的，家中很困难，来南京投靠我，我想培养他，供他在南京读书。你母亲（指继母）对他也不错，我的旧衣服都给他穿了。他在军官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师长。地位变了，人也荒唐了，吸上了鸦片烟，别的怪毛病也不少，身体也搞垮了。”之后，父亲把我和表妹张为学送到洛阳西宫战区学生进修班学习，把表弟张保庸介绍到西安军官学校上学。临走前，反复叮咛：“你们上学以后，要做个计划，万万不要枉花钱。需要多少钱，捎信给你们陈伯伯（父亲的秘书）要。钱，该用则用，不该用的不能用。对政治上的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要多知少说！”

1945年，我高中毕业了，到重庆找父亲，设法上大学。父亲说：“先找个工作干干，抽空复习复习功课。晚上不要上街。要考国立大学，不要考私立大学，私立大学费用大，念不起。”父亲当时住重庆市重庆村楼下，楼上是财政部长于鸿钧住的。我第二次去，于鸿钧夫人叫我到楼上住，以便和她女儿做伴。父亲不同意，叫我住在旅馆里。在旅馆住了两天，父亲给了我一张名片，叫我去找民政科傅启楷伯伯，傅伯伯把我安置在民政科干事员。从此，我白天在民政科工作，晚上复习功课。一直苦熬了三年，才考上了四川西昌技术专科学校（原唐山大学迁去的）。按当时情况，父亲满可以把我送到重庆大学、成都大学或者四川大学读书，最低也是

个旁听生。旁听一个学期，成绩及格，就可以转为正式大学生。可父亲执意让我考试，考上了就念书，考不上就工作。为这事，我对父亲很不满意，一连几个月，没和父亲通气。

父亲为人耿直、倔强、不循私情。1942年，在陕西任民政厅长时，省府上下官员及其眷属，吸鸦片烟成风。国民党政府下了禁烟令，规定省级官员及其眷属，五年为期，必须戒烟，逾期不戒者处极刑。西安法院院长与父亲是老相识，院长的老婆鸦片瘾很大，靠男人的权势，逾期照吸不误。有人把这事告到父亲那里。法院院长得知后多次找父亲从轻处理，院长的老婆也哭哭啼啼找父亲通融解决。父亲考虑再三，认为身为院长眷属，知法犯法，不严惩不能服众，毅然同意秉公执法，汇报省府，经最高法院批准，到底把法院院长的老婆正法了。

我家世居彭家村。“彭”姓是坐地户，占全村户数的一半。其余半数周王两姓。三姓合在一个“会”（会是解放前村民的共同组织，负责操办共同的福利事业）。彭家村北有一个北山，原属彭姓所有，后来归入“老会”。彭姓有个叫彭昭春的，作风不正，结王姓的门子，叫姓王的打了一顿。彭昭春的父亲当村长，又组织人把姓王的打了一顿。王姓是外迁户，又到老祖居清泉埠“搬兵”100多人，把彭姓一部分人打了一顿。两姓关系恶化，王姓从“老会”中分了出去，同时主张分去北山山岚的三分之一。彭姓不准，打起了官司。王姓县里有靠山，彭姓官司打输了。县里判定“北山”一分为三，三姓各占其一，还把我们的二祖父彭文佐押入监狱。事隔数年，我有个远房哥哥彭守香不服，跋山涉水，赶到南京，找父亲出面解决。出乎大家的意料，父亲竟出了

个调和折衷的主意。叫“彭”姓出钱，把山岚赎回，还教育彭守香，打官司要认理不认人。最后写了封信给牟平县长，让他相机处理。建议调停三姓，和睦相处，不可陷身诉讼。

“一辈官司十辈仇”，后患不堪设想。

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床头案上，常年摆着一部《史记》，每晚办公之余，必读一段两段，方肯就寝。早晨起床后，打一会“八段锦”，常年不辍。平素不苟言谈，不善交际。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夕，我要求随父亲一起到台湾。父亲捎信给我说：“你们姊妹，我一个也不能带，我以身许国，只得如此。用钱读书，去找你马保山伯伯就行了。”以后，我就按月找马伯伯取钱读书，直到大专毕业分配工作。

父亲到台以后，直到离开人世，30余载，杳无音信，故土难以重归，亲人不能团聚，实属极大憾事。但愿海峡两岸同胞早日团圆，祖国早日统一，十亿炎黄子孙，携手并肩，共振中华大业，深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渔家生活拾趣

李祯林 姜文健

牟平北临黄海，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75.18公里。近海为鱼虾索饵回游的必经海域，水产品种类繁多，鱼场广阔，沿海近四十个渔村的2000多渔民，世世代代从事捕捞生涯。辽阔的大海孕育着渔民豪放粗犷的性格，也形成了渔民们的独特而饶有风趣的生活习惯。

旧时渔民家家都供奉海神娘娘的塑像。据传，渔民海上遇险，全凭海神娘娘保佑。因此，渔民把海神娘娘奉若神明，毕恭毕敬。出海前的头一件事，便是把海神娘娘请上船，焚香叩拜，以保一帆风顺、鱼满人欢地平安归来；收船后，同样先把海神娘娘请下船，供奉家中；行船中，若遇险风恶浪，便燃纸焚香，磕头跪拜。据说，只要桅杆顶端出现一盏幽幽绿灯，就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其实，桅杆上出现绿灯只不过是渔民的幻觉罢了。

海上渔民生活方式极其独特，要求十分严格。渔家风船的桅杆上，大多写有这样的对联：上联是“大将军八面威风”，下联是，“二将军引路先行。”船尾写有“海不生波”的字样，意在震慑海邪，鼓舞斗志，求得出海风平浪静。清代渔民出海上船时，盘结在头上的辫子一旦散乱，不准梳理，上船后方可梳理。不然，即为不祥之兆。劈波斩浪行船时，船上的人不准吹口哨，渔民认为吹口哨会招惹恶浪。渔家人

用膳时，筷子绝对不许搁在碗上，也不准把碗倒扣过来，认为那样会导致渔船触礁搁浅甚至扣翻。渔民最忌讳一个“翻”字。谁若在言谈中带有一个“翻”字，就是亲朋好友，他们也会暴跳如雷，怒目相向，做出不友好的举动。渔民称“翻”为“划”。比如渔民到店铺买瓷碗，当他看完正面要看那一面时，对方要说个“翻过来看看”，可就不得了啦，他会摔下碗，愤然而去。初到沿海经商者，往往会被弄得莫名其妙。渔民还忌人坐在船帮上，将双脚伸入水中，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用脚踩海神，是对海神的不尊，会激怒海神。实际上是因为脚伸在水中，脚心发出亮光，会招惹鲨鱼造成翻船。再者，脚伸水中，遇风两船相撞，会把腿骨挤断。在渔船上，不许人们坐在船头玩耍。否则就叫“压船头”不吉利。渔民称船归为“收后”。船收后，不许妇女登船或跨渔网，尤其是怀孕的妇女，是绝对不许登船或跨渔网的。女人登船或跨渔网会带来“臊气”。如发现女人上船或跨渔网，凡踏过的地方，都要燃起谷秸（又名杆草）熏烤，以便将“臊气”赶走。四、五十年代，渔民中盛行用木头雕刻一个大元宝，用红布系在网上，祝愿下网拉个金山银山，发财进宝。

渔船扬帆捕鱼，乘坐桅杆顶端的“鱼眼”（观鱼手），是最有权威的。当他发现鱼群，发出下网的指令后，作业的渔民动作稍有怠慢，他便会大发雷霆，骂至祖宗三代，狗血喷头，哪怕是父辈和亲弟兄也不例外。这如同庄稼人下种要赶节气一样，渔民把渔汛期的来临，视作自己招财进宝的关键时刻。下网捕鱼，如有人放走鱼群，船上的人谁都不会原谅的。轻者受骂，重者遭打。然而，当他们收网成功满载而归时，波峰浪谷间又会撒下他们嘹亮粗犷的欢闹声。渔民之

间是从来不知什么叫“记仇”的。

号子，是渔民们集中使用力量，协调劳动节奏的号令，也是渔民用来震慑海邪和显示自己威力的一种武器。渔民的号子是非常有讲究的。不同格调的号子，作用和作业方式也各有不同。号子的威力对渔民来说是非常大的。每当遇到危难，渔民就会用号子鼓舞斗志激发群体力量，战胜险恶。尤其是拉网时的号子，初到船上的人，会使你如痴如醉。夜晚停泊抛锚时，下锚人便会大喊抛锚号子“抛锚牢（喽）！——”其声音是极其古怪的。渔民说，喊抛锚号子是告诉海下的大动物走开，以防打在老鳖身上滑锚。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作用。

终年的风吹浪打，渔民们形成了一种粗犷、豪放、热情、憨厚的性格。他们人人喜酒，酒量又都大得惊人，但并不是不分场合地乱喝一通。他们有着自己的训令：在预测有风浪袭击时，发现鱼群整装待命时，航道偏窄遇有险情时，求拜海神娘娘时等，如有偷喝酒者，定会遭到船老大的斥责。而每当渔满船舱、风平浪静归港时，他们则人人抱着酒葫芦敞怀痛饮。即使天再冷，也要裸露胸膛拍拍打打，尽情发泄喷泄欲出的激情，向大海炫耀自己的神威。船老大喝酒则另有习惯。每逢端起酒碗时，总要用手指蘸些酒向海上弹几下，一是出海时求大海保佑，二是归来时向大海表示谢意。旧时，渔民出海丰收归来后，总要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引来村中男女老幼，同庆同贺。他们用铁青瓷碗盛满酒肉分散给上船祝贺的客人，大人喝酒，孩童吃肉。有的还花钱请来戏班子连唱几天大戏，以示庆贺。

解放前，渔民生活极端贫穷，沿海一带曾流传这样一首

歌谣：“有女不嫁打渔郎，赶潮出海守空房。夫君长随龙王去，孤儿寡妇愁断肠。”这是旧时渔民的真实生活写照。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渔民们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渔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单一的捕捞为业逐步转向捕捞、加工、海产养殖等机械化的综合经营生产方式。昔日带有封建色彩的传统习俗，随着渔民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有的已消声匿迹，成为历史的笑柄了。

记孙塾事

孙葆真

孙塾是牟平县林北村人。他生活的时代正当清朝的“乾嘉盛世”，幼年时就头角峥嵘。赴童子试时，学官见其身材矮小，问道：“你如此幼小，也来赴考？”他却朗朗地反问：“大人说什么岁数可以应试？”学官被问，一时语塞，只得回说：“如你年岁，即可应考。”因此一事，在侪辈中声名大噪，不久就以学问文章闻名于乡里，以生员得食廩。在明清时代，凡学子经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名生员，即习惯上之所谓秀才，文章上则常称为诸生。生员中得享官府发给食粮者，谓之食廩，称为廩生。当时的林北村，已连续出了两个有功名的人，一个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的举人孙万备，即孙塾的堂伯（初放直隶省知县，官于深泽、束鹿、蠡县等处，后调湖北麻城县。以御苗民之乱，积劳成疾，卒赠朝议大夫，赐谕葬）。另一个是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的举人，孙塾的族祖孙宪（举人大挑一等，发放江苏以知县用，官于崇明、常熟、昆山代管新阳，卒于任，例赠文林郎）。附近的乡人，对此常是啧啧称道。孙塾的蜚声乡里，不禁使人们预测道：林北又要出一个举人。人们的预料，不是毫无根据，孙塾写的文章，知识含量丰富，说理中肯，逻辑严密，文笔犀利，比起当时的滔滔者流，确有其秀出之处。但是当时的科举考试所要的文章，却

与此不同。它们要求的就是人们所说的时文八股，形式有固定的套子，内容要“代圣贤立言”，正如康熙时大学士鄂尔泰所说的：“非八股无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的是牢笼和驱策志士、英才，伏首帖耳地为其所用。孙塾所写的文章，当然不符合这等要求，因此他在乡试时名落孙山。从此孙塾无意于功名利禄，因为他对作为干禄敲门砖的制义是鄙视的，不愿屈己降意以相从；他所追求的是真正的学问，有用的学问。他宁愿作一个农民，优游于垌亩之中，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周围的乡亲们做些事情，决不屈意奉迎，“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中多次地运用自己的特具才干，为农民排忧解难而无所取，赢得了远近人们的称誉，在农民的口头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奇式的故事，有不少是不虞之誉。他的名字，远播于牟平、文登两县的群众之中，简直是不胫而走，人们都尊敬地称他“孙塾先生”。

孙塾的家境并不宽裕，他又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不会钻营渔利，家中生活是困难的。正如他在所作《桑田窝记》中所说的：“桑田居士，拙于谋生，冬暖而几号寒，年丰而妻啼饥。”林北地处九佛山东麓，东距金山港内汉不过里许，当年沿海一带皆斥卤之地，白茫茫的一片，只生有稀稀落落的碱柳、刺蓬，不适于耕种，因之土地逼窄，农民多无地少地。孙塾的先世也有一片海滨的斥卤地，多年来一直弃置不能耕种。他在中年以后，想起利用这片土地来解决生活困难。他写道：“先世有郭外之田数千亩，居士顾之，慨然兴垦殖之心。”于是他把掺夹在自己地间的别人土地，用自己原有的几亩好地换取来，使之连成整片，然后开渠泄水，压沙退碱，经之营之，几易寒暑，开垦出一些可以耕种的土

地来。又在其中盖起几间茅屋，全家搬了进去。他取“沧海变桑田”的典故，命名他的茅屋为“桑田窝”自号曰“桑田居士”，并写了一篇《桑田窝记》的文章来记载这事。从此他就隐居在这里，耕种，读书，只有在集市的日子，才顺便到村子里走一趟。作为旧社会的一个读书人，能用自己的劳动，开辟自己的生活，并且成为村子里开垦改造斥卤荒地的先驱，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孙塾事迹的流传，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他像宋士杰一样，一张状纸告倒三个官员的事。其实并不涉及三个官员，而是一名县官，两名秀才。这里有一件事必须辨明。人们往往对孙塾写状一事，说他是一个“刀笔”。在旧社会，“刀笔”乃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这种人其笔如刀，能杀伤人。如果对赖以伸张正义的诉讼状的秉笔人也加以“刀笔”之名，就未免是非不分了。下面我把这件事的始末，大体叙述一下。因为年代已久，资料不详，其间有传闻差异之处，也事先加以说明。例如石岛本属荣成，在该县东南角，与文登接壤。对其案当事人，旧说多谓是文登，而记载此事的文记，则未交代究属哪一县。再如文记中说孙塾投状于济南府，按济南府只能处理属于济南府境以内的案件，对登州府发生的案件，无权过问，对全省民事刑事案件乃两司所管。根据状内所云：“兹闻仁宪下车，首以斯文为重。接人追吐哺之劝，名高渤海；取士涣观风之号，纸贵洛阳。方将续尼山之讲学，入文化及三千；岂肯传管子之治齐，女闾增其三百。”似乎孙塾是投状于学政。学政即提督学政之官，又称督学使者，是清时自中叶以后，派往各省掌管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的学官。

均由侍郎、京堂、翰林、科道及部属等官由进士出身者简派，三年一任。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在任学政期间，与总督、巡抚平行。在督学当中，对不法之童生、生员，可以自行处置；对地方官之贪脏枉法行为，亦可向上反映题参。孙塾所告，正在其权限之内，所以我在本文中肯定他是投状于新任学政。

清嘉庆十六年，牟平县境遭受了一场严重灾害。据1936年编《牟平县志》所载：“嘉庆十六年，夏、旱，秋、大水，饥馑。知州胡道垠赈之。申请平糶仓谷，复捐廉劝捐，运粮辽东，煮粥赈饥，自十月设厂，至十七年五月讫。”又《职官志·胡道垠传》云：“十六年辛未，荐饥，多方筹赈，属请于上台，发仓平糶，复劝捐以助之。乡社各设厂。”虽然遇到这么一个比较贤明的州官，捐俸劝捐，开常平仓平价卖粮，又到东北用船运粮，于各乡各社开粥厂救济，但是赈救毕竟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四乡多数贫苦农民仍然无以为食，衣服器物卖光了，就只好卖儿鬻女，或者逃难外乡。所以孙塾在诉呈内说：“十七年间，市上米珠薪桂；二三月内，民间星散瓜分。”牟平的群众，至今提起“十七年”来，还是余痛未息，记忆犹新。就在这场灾难当中，发生了孙嫚儿被卖为娼的惨剧。据孙塾在诉呈中说，孙嫚儿的父亲在灾荒年死去，母亲为了生存，只好另嫁，孙嫚儿则被舅父所收养。一个年幼身孤无知的女孩子，竟被匪徒诱至俚岛（在石岛附近），卖与娼妓徐三子、徐四子。徐为姊妹二人，同开一妓院，倚仗文登秀才杨才敏、杨世礼父子二人的势力，肆无忌惮，买良为娼。孙嫚儿的舅父杨某，寻觅到了俚岛，要甥女回家，被杨才敏唆使恶徒，一顿暴打，只好回来。孙嫚儿的叔父孙良到处控告，可是徐娼妓“以色通役”，

每次提审，都被谎词骗过。秀才杨氏父子，“仗财抗官”，几次票传，都以狡供获免。文登知县王某，与杨氏父子相善，任其播弄。所以孙塾说：“王县主形同木偶，罔闻案下魑魅；杨恶衿势恃钱神，遂为海滨豺狼。”所以兴讼三年，案下竟无一人。恶绅与官府勾结，狼狈为奸，蹂躏小民，于此可见一斑。孙良万般无奈，求助于孙塾。孙塾激于义愤，慨然允诺。自念与杨氏父子乃学山同道，于是亲赴石岛，欲与杨某恳说。谁知杨某闻孙塾前来，知其欲下说词，又素知孙塾之名，竟先发制人，暗中唆使妓院老板与部分恶徒，将孙塾困在店中，在外喧嚷，势将用武，并扬言逼索甘结，今后不得再来。这是孙塾意料所不及的。他本想和平解决问题，而现在的情势是露面都不可能了，一个人坐在店内为难起来。还是由于他平日的声望，意外地获得了解救。石岛有一位势力人物，平日很钦慕孙塾的为人，早想结识他。他听说孙塾来到了石岛，住在某店内，就特地前来拜访。当他来到店前，看到许多妓院老板和恶徒将对孙塾不利，就把他们呵斥散了，总算为孙塾解了围。孙塾也从他口里得知个中就里。在封建社会里，像妓院中人和恶棍无赖之徒与有功名的读书人寻衅闹事，那是侮辱斯文，是不允许的。因此孙塾回来之后，趁山东学政新来之机，投了一张诉呈。孙塾不仅熟知《大清律例》，而且很善于斗争，知道如何利用统治者所标榜的手段作自己立论的根据。他知道官场素重族望，所以开头就提出“世以诗书为业，族以敦睦成风。伯父壬午举人，莅官深泽、束鹿；叔祖丁酉孝廉，摄篆常熟、崇明。所惜者族大丁多，怀惭于平仲之恩推三族；又加之官清囊罄，空羨夫紫阳之仓设一乡。”接着叙述了因灾荒带来的家破人

亡，孙嫚儿遭逢的悲剧，被卖于妓院。旧社会虽然妓院是无法消除的社会罪恶现实，但是统治者仍然标榜“买良为娼”是非法的。孙塾利用这一点，控诉了知县王某和秀才杨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和石岛妓院的违法罪恶。又揭发了杨氏父子勾结棍徒，侮辱斯文的阴谋。然后用“方将续尼山之讲学，人文化及三千；岂肯传管子之治齐，女闾增其三百”二语给了学政一顶高帽，并使其不得不循此而处理案件。理由和事实都是冠冕堂皇，合乎封建理法的。诉呈递上之后，果然案子得到解决，文登知县经部议革职；两个秀才褫去青衿，取消学籍；石岛妓院的所有妓女，准予其家属领回，而不必赎出，妓院不得有任何留难。孙嫚儿也回到叔父孙良家里。

一年，腊月二十七日，孙塾赶完了上庄集，又回到村里来看望街坊。他正站在街头和乡亲们说话，忽然看到西山北头村的曲文兰眼里噙着泪，愁眉不展地向他走来。曲文兰是孙塾已故的老友曲文华的三弟，就连忙问为什么事这样难过。原来曲文兰的两个哥哥曲文华、曲文芝，两人只有一个男孩，是曲文芝所出，自幼多病，家里又很贫穷，无力医治。旧社会的农村有一种迷信的坏风气，认为孩子多病，是命里不宜有子，送到附近的庙里出家，就会好了。这大概也是穷人于无办法中而想出的不得已的办法吧？出家总比眼巴巴地看着孩子病死好些。于是曲文芝的儿子就被送到上庄村西的洪福寺出家作了小和尚。现在曲文兰的两个哥哥都已故去，后继无人。他想：总不能让两个哥哥断绝了后代，应该把侄儿领回来还俗，好接哥哥的香烟。这想法是迷信的，但根源则基于兄弟间敦厚的手足之情。于是他到洪福寺同主持丁起商谈，丁起一口答应了，他高兴地把侄儿领回家中。哪

知过了不久，丁起忽然翻悔起来，不同意让小曲和尚还俗。曲文兰趁赶集的机会又去向丁起央告，丁起是坚决不答应，并说不送回来就要起诉。眼瞅着领回来的侄儿又要送回去，老人难过得不由老泪纵横。孙塾听罢他的话，安慰他先回家去，说等过了年（春节）他给想办法。年节刚过，孙塾写了一封信给上庄的老友王玺，请他帮助转圜。王玺是一位老塾师，在上庄是很有点威望的人。这封信不长，多年来为人们口头所传诵，现在把它全文抄在下面：

勾芒司令，景色和畅，遥忆西河讲坛，坐春风者，四方云集，快何如也。

予以倦于世故，避居海滨，二三戚友，有事仍复相扰，意虽不欲代庖，力亦未能杜门。

昨有山北头曲文兰者，吾故友曲文华之胞弟也，到门求请。因其两兄俱亡，只有胞侄一人，在贵寺为僧，现在领回家中，将使还俗，以续两支。其家贫困，向与主持丁起言明，过日酬恩。近闻丁起忽欲具讼。窃谓此事，乃天理人情之至。彼曲和尚者，反苟哺之有心，师恩神惠，俗家亦可兼报；倘削发而弗悔，父祀伯姚，释氏岂能代承？况沙门衣钵之传，一师尚有三徒；曲氏蒸尝之祀，两支仅此一线！望老弟学政之暇，少分精神，邀村中德望，同劝丁起，勿令雀角。此一大阴鹭事也。使人有子者，天亦使之有子。予拟重九后，登门贺老蚌珠矣。

这封信言简意深，它抓住了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以孝治天下”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准则，是很有份量的理由，而表面则平淡冲和，不露痕迹。王玺接到信后，果然

邀人劝说了丁起。丁起大概也慑于孙塾插手了这件事，再坚持下去，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也就答应了曲和尚还俗。一场眼看即起的纠纷，就此和平了结。笔者于1935年曾短时期执教于山北头村，一次，同当年曲和尚的后代叫曲士选的闲谈起这事，他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孙塾先生，也就没有我们这支人了。我们至今还感念孙塾先生。”

孙塾的事迹，还有许多流传在各地人的口头，有些经过添枝加叶，言过其实，有的甚至带有传奇色彩，有道是，“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所以不少农民信以为真，至今把他当作具有特殊智慧的人物来崇拜。但是也有的渲染走了样，把他形容成一个故弄机智，捉弄别人的人，歪曲了孙塾的形象，我们则应加以鉴别。在古时候那种不合理的社会里，凡是能够为群众做些好事的人，人们对他都会感念不忘的。人民群众向来是对事物最公平的判断者。孙塾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传颂，也确有其原因。他，应该算得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吧。

孙塾诉状掇引

于 健

孙塾，字孟邻，牟平县姜格庄镇林北村人，清代廪生。

乾、嘉之际，孙塾应考得中生员。尔后，赴举应考，屡试不第。事后有人透露，孙塾卷末，曾有主考官的十二个字的批语：“孙塾一卷，笔笔皆刀，刀刀见血。”孙塾以学问文章名闻乡里。诗文犀利针砭时弊，秉性刚直又好打抱不平，难怪其名落孙山终生郁郁不得志，而隐居家园，甘当“桑田居士”了。

孙塾一生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恨之入骨，对蒙冤受屈受人践踏欺凌的贫民百姓却深表同情，并挺身而出为之排忧解难，即使担当杀身灭族之祸，也在所不惜。现举孙塾诉状数则，可见孙塾为人之一斑。

息 事 宁 人

甲乙两个农民平素有纠纷。一年冬天，甲农民的羊吃了乙农民的麦苗，乙农民请孙塾写状上诉于县令。甲农民也请孙塾代写状子驳诉。孙塾认为，为小隙涉词讼，以息事宁人为宜。乃援笔为乙农民写下诉状。状词是：“羊吃麦苗，四蹄乱刨，鼻嘴齐噬拱，连根啃掉。”同时又为甲农民写下驳诉状：“三九天，地赛钢砖，牙齧劈不动，羊嘴怎能钻？”县令凭状纸断案，见二状俱有道理，只好将原告、被告各打四十大板，逐出衙门，不了了之。

严 惩 屠 夫

某屠夫，靠权势膂力，称霸一方，稍触逆，辄持刀相向。有一农民之狗，舔吃屠夫猪床下之残血。屠夫即用钩猪之钩把狗咀钩住，狗主与其理论，反遭屠夫痛打。因请孙塾具状。状曰：“以钩猪之钩钩狗，而狗不胜其钩，又转而钩人，上下皮锤之交流，左右耳刮之交加，不第此也，尚有妈×等话。”县官阅状，严惩了屠夫。

各 无 异 言

王、张二人相隔虽远而友情深笃。王有爱女，自幼与张之独子订婚联姻。后王闻张子并非亲生，系张之螟蛉子而后悔莫及。意欲毁除婚约，又碍于乡里非议，无奈请孙塾相助。孙塾说：“螟蛉子与汝女情意不投，不能强合，然则，彼有螟蛉子，汝无螟蛉女乎？”王某顿悟，即将邻家孤女，认为螟蛉，置备装奁，嫁于张家。婚后，各无争议。

寡 妇 改 嫁

有一寡妇欲改嫁，无奈公公恪守旧礼俗百般梗阻。寡妇求计于孙塾。孙塾援笔写状曰：“两间房，一铺炕，公年轻，婆早丧，儿媳改嫁公不让。大老爷你细思量，媳妇改嫁应当不应当？”县官阅状大怒，立传其公爹到案，大骂“老头混蛋！”即令媳妇改嫁，公爹不得阻挠，否则“严惩不贷”！

抗战时期牟平境内的几个 国民党军司令之兴衰始末

都兴华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山东军阀韩复榘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逃，真是“军阀官僚齐跑掉，丢下人民受灾难……”①当此，国民党统治机构土崩瓦解之际，党政军要员，有的收拾细软准备潜逃或投降，有的乘机打起抗日旗号，招兵买马，扩张实力。在牟平这块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出现过六个国民党司令。即：苏鲁战区六纵司令、暂编26旅旅长秦玉堂；山东第七特派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郑维屏；苏鲁战区第五纵队国民党军委别动队46支队司令丁绶庭；苏鲁战区警察纵队、保安六旅旅长苗占奎；苏鲁战区第五纵队纵队长安廷庚；牟平保安大队长张建勋。

这些国民党军司令，在抗战初期，曾经抗过日，打击过日本侵略军。1939年，汉奸赵保原窜来胶东，火并了鲁东行署，支持这些国民党司令占山为王，各据一方。蒋介石又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以至不顾抗战大局，互相残杀。在蒋敌伪合流形势下，盘踞在牟平境内的国民党杂牌军也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歧路。

秦 玉 堂

秦玉堂，山东东阿人，行伍出身。原是第七专员张骧伍

的营长。“七·七”事变后随军南下，临阵脱逃，带领二百多人，返回胶东，以此为基础组织游击队，自称司令，先依附蔡晋康驻扎于栖霞。蔡忌秦得陇望蜀，迫秦东下昆嵛山区，驻曲家口、红石头等村。秦在曲家口修筑工事，安营扎寨，自任司令，杨树国任副司令，政治主任王芝波。下设八大处机关，辖三个团。一团长王培江，副团长李崇然；二团长梁文斌；三团长赵伯英。秦部拥众三千，装备较好，有炮团、手枪队，轻机枪二十余挺，人多势众，在曲家口建立了兵工厂，可生产子弹、手榴弹、修理枪械。

秦既出身行伍，有军事知识，资格老，牌子硬，受委26旅长。亦博得日伪军的青睐。烟台日酋斋藤曾派翻译官到秦营劝降，被秦拒绝。但探悉秦军实力，伪道尹白书谱亲自出马，串通牟平伪县长周东华，集中800余名日伪军，在日机的掩护下，于1939年8月16日，直攻曲家口秦部据点。曲家口是昆嵛山的腹地，丁綽庭、张建勋俱在昆嵛山外围。因其互相勾心斗角，明明闻到炮声，也不肯出兵支援。幸秦事先闻警他逸，并未损失主力。但民房被烧毁1521间。

秦玉堂复从海阳布防到腾甲庄，号称百里长蛇阵，1940年日军大扫荡，长蛇阵不堪一击，被拦腰斩断，秦率残部东逃荣成。风声平息之后，秦部返回腾甲庄，收集残部，联合王兴仁、丛镜月、丁綽庭、张建勋等残部，麇聚一地，深沟高垒，积极参与反共。1942年9月9日，我军主力围攻腾甲庄，鏖战近月，“抗八联军”全线溃散。秦率残部西逃至海阳邢村，部队为日军收编。秦玉堂只身逃往青岛，奴颜婢膝，投靠日军，日军司令内田视秦如失去姿色的野妓，根本不予理睬。秦不得志，复到济南投靠伪省长唐仰杜，任省参议

员，仍不得重用。

1950年1月，秦被捉归案，被枪决于夏村。

郑 维 屏

郑维屏字右盘，生于1886年。河北永年人。17岁时于永年县立中学毕业后，做了几年生意。1915年考入直系军阀办的北京陆军模范团学习军事。1917年在第五混成旅一团四连任连长。后曾在庐山军训团受训，参加“军统”特务组织。1935年到威海卫任行政区管理公署公安局长。

“七·七”事变以后，专员孙玺凤于日军登陆前弃职出走香港，郑维屏趁机拉出公安局四、五十条人枪，打起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发展势力。1938年10月，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委郑为山东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7区辖文登、荣成、牟平、福山、海阳、威海等县），兼任保安司令，他抢占了文荣威一带富庶地盘，引起各路草头王的垂涎和妒忌。在日军侵占威海初期，郑维屏实力比较薄弱。但他在威海郊区，积极进行一些抗日活动。自1938年3月7日至5月底，郑部先后进攻威海7次，并联络丛镜月，王兴仁、安廷庚等部，对日军进行袭击。特别是郑部进攻北大营和攻打码头两次战斗，深入敌人内部，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郑部实力逐步扩大，由原来的400人发展到2400人，郑部号称4000之众，拉到昆嵛山里的楚赬、黄龙赬、北宋家口一带驻防，设有被服厂、军工厂，保证军需。郑滥发钞票，横征暴敛，鱼肉群众。特别自1939年以后，郑维屏秉承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旨意，与日伪勾结，代敌人征粮。又与王兴仁、丛镜月、丁緯

庭结成联盟，接受赵保原的控制，逐步从“限共、挤共”走向“反共”的道路。

郑维屏的亲日、贩卖活动，给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斗争造成严重的危害。1940年春，组织“抗八联军”，进攻我东海地委指挥部，地委书记于克恭于是役牺牲。1941年春，八路军在昆嵛山区进行反投降斗争。一举击溃郑秦丁丛等部主力，郑率残部西逃即墨边境。翌年7月，郑又潜回文登与日伪勾结，8月，袭击我固头整训的新兵营，我伤亡400余。郑部在距文登城7公里的文登营南村安营扎寨，苟延残喘，以谋东山再起。郑部本是一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的队伍，武器严重不足。1941年10月14日夜，郑部偷袭刘公岛，获轻机枪3挺，步枪300支。郑部敢于抗日，本是正大光明的义举。但他偷袭刘公岛却伪称八路军，无非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抗日武装而已。后来郑部偷枪的消息，终为日军侦获。日军认为郑部“吃里扒外”，对皇军大大的不忠！伺机报复。郑从文登伪县长徐善卿处获日军图谋报复的消息，连夜仓惶逃离营南家村。1942年3月26日，日军掩至，当日焚毁民房千余间，枪杀无辜百姓130人，将村民不分老幼，屠杀净尽，造成骇人听闻的“营南惨案”。

民谣说：“游击队，吃饱睡，吃油饼，盖花被，不打鬼子光收税，害得百姓遭洋罪！”这是百姓对郑维屏等游击队司令罪恶行径的绝妙刻画。1942年5月，郑在崔家口被八路军包围，激战之后，一败涂地，连党章、关防，俱丢失净尽。穷途末路的郑维屏只身逃往重庆，被委为国民党行政院参议员，河北省政府委员。

1949年9月郑维屏在北平被捕，1953年押来文登，翌年

1月在葛家枪决。

郑部主力商团，匪首商立端，原籍河北人，本是威海大庙的和尚。好杀成性，随郑起事后驻昆嵛山后。征兵500名，征粮无算，曾在牟平老四区骚扰。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林前事件”。部下多是强征的农民青年，不堪忍受商匪的虐待和刑罚，多有逃亡者，商匪亲自手刃逃兵，战士越发离心。1942年2月11日，商匪被我14团追歼于序班庄。商匪为其部下击毙。

丁 缙 庭

丁缙庭，原名九龄，乳山（当时属牟平县）上册人，行伍出身，在西北军干过旅长，是牟平南乡的地头蛇。手中掌握一批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此人惯会随风转舵。“七·七”事变后，在育黎组织游击队，控制一个营的兵力。牟平中学校长勇简斋介绍一批青年入伍，力量逐步扩大。被封为苏鲁战区第五纵队，国民党军委别动队46支队司令。

丁任司令，文登县长丛镜月失利后投丁任副司令，政治部主任张心镜，参谋长张亦新，后是吴子正。并设八大处：副官处长于圣吉，主任姜伯平，军械处长勇简三，军需处长于新，主任姜鸿南，军法处长丁书恪；还设有军医处、传达处、秘书处。辖两个支队：13支队长季宪邦；14支队长匡玉洲；教导队长匡乐亭。司令部设于育黎。育黎一带土肥民壮，不缺军饷。部下多为亲朋故旧，虽然不善于作战，但能俯首听命。丁部机构齐全，任命董兆缙为县长，长驻大虎岚，专司征粮收税，为其筹集军饷。丁缙庭以正统自

居，自信为兵多粮足的抗日司令。1938年，三军攻打雷神庙影响很大，苗、张联军阻击日军于辛安河。丁也把队伍开到牟平城附近，在解甲庄的金斗山主动阻击日军。丁部虽遭重创，但予敌以严重打击，首战获胜，在抗战初期有一定影响。

1940年，日军第一次大打荡，丁部损兵折将，损失惨重，遂移防于胡八庄，靠近秦玉堂、安庭庚的防地驻扎，这时，文登县长丛镜月兵败率残部来投，丁、丛合编，丛为副司令，丁部军威复振。丁自接受汉奸赵保原的控制后，便公开走上反共道路，参加“抗八联军”，死心塌地地与人民为敌。

1941年春，我5旅14团东海反投降，丁部被歼450名，丁率残部逃到黄村，深沟高垒，负隅顽抗，我军乘胜攻克黄村，丁部溃不成军，13支队长季宪邦到牟平投敌，当了伪治安大队长，14支队长匡玉洲，率残部到昆嵛山后神童村驻防，借日军的庇护，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残杀我工作人员及无辜的平民百姓，不下120余人。优秀的共产党员杨年润、贺仇、王文轩等同志，都惨死在匡玉洲的屠刀之下。尽管匡与伪军关系微妙，1942年秋，匡匪在神童的巢穴，还是被扫荡的日军用迫击炮击毁，匡匪如丧家之犬，逃到牟平城后活动。

丁纬庭损兵折将，辗转西逃崂山，依附国民党李先良。日本投降后在青岛闲居，解放战争开始，丁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将领。1948年秋随顽八军到烟台，出任烟台市长。

1952年12月17日，丁纬庭在上海被捕归案，在乳山黄村，处以极刑。

苗 占 奎

苗占奎战前原是牟平公安局的巡长。三军攻克牟平城以后，他纠集了五十几个旧职人员（主要是旧警察人员）拉起队伍来。自称警察纵队，留守牟平维持地方治安。

苗部驻城里，怕被张建勋的民团吃掉，就把队伍拉到刘家埠、辛安河一带驻防。1938年2月，莒城盐警王瑁勋到烟台投敌，被委为第二任伪县长，到牟平走马上任时，被苗逐出北门。烟台鬼子前来报复，苗占奎、张建勋联合起来，在辛安河跟鬼子打了一仗。苗部虽说损失惨重，鬼子总是被打退了。苗占奎在抗战初期，给牟平人民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

此后，苗占奎把队伍撤到下雨村休整，为了避开日军的正面攻击，又移防到崖子养精蓄锐，扩张实力。接着，苗又收容了育黎乡校王润之、王志善等小股武装，扩充了部队。

苗虽是个目不识丁的武夫，但较能虚心采纳下属的意见，他的主要谋士是副司令孙海滨，苗拒绝与“反共领袖”郑维屏联合，也不接受国民党鲁东行署的指令，却与相距300里之外的平度国民党张金铭结成联盟互为犄角。他决不到处树敌，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放心地在崖子训练壮丁，扩充实力，队伍扩大到1300余人。辖3个大队，改番号为13纵队。苗任司令，孙海滨任副司令。并有一个骑兵大队，这是其他部队无法比拟的。但是，苗的实力愈雄厚，抗战也愈来愈消极了。这与汉奸赵保原策划的“抗八联军”有关。

苗占奎对共产党的态度，一向比较温和，历来与八路军

和睦相处。三军攻打牟平城，苗部保持中立；苗部打了胜仗，接受我“娃娃剧团”的慰问演出；苗部办了一份《民族之声》小报，我们的干部投稿，它也照登不误；苗部有一部电台，我军派教员教他们发报。偶尔捉到我们的同志，一经交涉，立即释放。总是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1939年秋，牟平县委在地口的掩护机关——织袜厂，突然遭到苗部袭击，并捉去县委秘书刘力生。后经交涉，虽然释放了我们的同志，织袜厂却遭到破坏，这说明苗也逐步走向反共道路。1942年2月，苗部在午极参加了“抗八会战”集团，陷入顽固派的深渊，旋即于3月17日，我山纵5支17团，在崖子与其激战两昼夜，苗占奎全军覆没，活捉苗、孙等头目，我军考虑苗曾做过有益的工作，经教育后，又一一释放了苗、孙等头目。苗在烟台外围，依靠日伪军，苟延残喘，副司令孙海滨，到牟平投敌，当了伪副治安大队长，后在一次增援高陵战斗中，被我击毙。

抗战胜利后，苗在青岛成了国军大员。1948年秋，顽八军进攻烟台市，苗占奎出任烟台市警察局长。后随顽八军逃窜，不知所终。

张 建 勋

张建勋，河北人。1936年随张骧伍来牟平任保安大队长。“七·七”事变后，张骧伍弃职南逃，张建勋留守牟平。日军进城前夕，张从城里拉出保安队班底近200人，到四区龙泉汤村与地主武装吕子正部合编成两个营。张任司令，赵汉卿任副司令，吕子正任营长。张系旧军人，好大喜功，人

员虽然不足，但机构齐全，下设八大处，是一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的杂牌军队。

张建勋的历史功绩是：抗战初期，积极支持三军攻打牟平城，烧过鬼子的汽车，策应三军雷神庙突围，使三军免遭大的损失。后来，张建勋接受了丁綽庭的领导，又受汉奸赵保原的控制，被委为保安第七旅旅长，逐步走上反共道路。雷神庙战斗以后，三军撤到牟平西南乡青山一带休整、宣传抗战。张建勋不顾抗战大局，为了排挤三军，他唆使地方势力，刁难三军，围攻三军，使新生的三军，不能在牟平立足，无法开辟抗日根据地。张部在冯家镇驻防，拒绝我以群众面目出现的宣传队的慰问演出。

1940年，鬼子第一次在牟平大“扫荡”，张部不堪一击，损失过半。残部拉到水道镇南台村，靠近日军水道据点，与驻守水道的日伪军同流合污。张的倒行逆施，引起部下的强烈不满，副司令赵汉卿，不愿与张共处，拉出一部分队伍单干去了，张也无力征讨，只能提出一纸抗议，敷衍视听而已。

抗战后期，1944年8月24日，水道据点被我攻克。张建勋带领残兵败将，如丧家之犬，走投无路。索性逼近牟平城，仰敌人鼻息，苟延残喘。张居牟平多年，了解当地的民情世故，恬不知耻地不惜利用迷信宣传，组织红枪会，为敌人看家护院，牟平城解放前夕，我军在西关曾吃过红枪会一次亏。

抗战胜利后，张建勋下落不明。

安 廷 庚

安廷庚原是军阀毕庶澄的部下，率部接受国民党沈鸿烈的改编，成为海军教导队。战后经过扩充，部属不足500人，编成三个营。在荣成活动担心风险太大，1938年拉至牟平，在午极、中庄、泽上、马家乔等地设防，司令部设在藏金乔。其三营长阎廉珊为我地下党员，始终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

安廷庚投机抗战，对敌态度暧昧。始终未敢正面抗击日军。鬼子第一次在胶东大“扫荡”，安廷庚弃枪逃跑，到文、莱，枪支多为我部拣去武装了抗日部队。安部力量相对削弱。1940年，汉奸赵保原遥控安廷庚，采取“集中主义”，在午极组织“抗八联军”大会战。安部骑虎难下，打又不败，退又不能，只得勉强参战。我军又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丁、安、苗是争取对象，经过一夜激战，顽固派联军作鸟兽散，蓄谋已久的“反共高潮”被粉碎，“午极大会战”以顽军彻底失败告终。我军又适时策动安部阎营反正，大大削弱了安部实力。

安廷庚率残部突出重围，窜到沿海地带活动。1941年9月下旬，安部在沐浴构筑工事，积蓄力量，以求东山再起。他残害我工作人员，对我组织破坏很大。共产党员赵志廉、牟济仁等同志都被安部惨害。安态度暧昧，游离于敌我之间，伪县长周东华曾派人拉安投降，被其拒绝。敌人卧榻之下，岂容别人酣睡。于是从烟台、牟平两路出兵，包围了沐浴据点，意在全歼。我东海主力，为顾全大局，在强敌面

前，捐弃前嫌，出兵增援。战士不惜流血牺牲，勇猛冲锋，终将日伪军击退，为安部解了围，安廷庚残部西逸中溃散。

遗憾的是安廷庚始终未能放弃消极抗战的立场，走上抗战的道路。安廷庚抗战胜利后下落不明。

注①系当时流传东海一带的游击队歌词内容。

甲午海战的两条沉船

李振玉口述 王卓章整理

我叫李振玉，今年52岁，牟平县大窑乡蛤堆后村人。小学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到海上打鱼，现任蛤堆后村渔业队队长。

我村西北近海有两条沉船，这两条船，是满清水师的战船。甲午海战中、后期，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崇洋媚外，致使清朝水师丧失了战斗能力。一些中小舰艇的官兵深感本身的攻击力和迈速（马力）与日本海军相比，相差悬殊。明知不敌，只好借港湾隐蔽。这两条沉船就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计划开到养马岛前海隐蔽的。由于仓促行驶，看错了海图，又忽视了潮汐，导致抢滩搁浅，再也没能开得出去。两条船船体完好。船上共有官兵七、八十人，他们弃船登岸向登州府水师营（今蓬莱县北关外）奔去。

两条沉船，峙头挂钩很多，经常挂扯渔网，给近海捕鱼造成很大麻烦（特别是西边那一条）。必须扎猛子潜水，才能把网扣一个一个摘下来。因为我的水性较好，所以这个任务，十之八九由我去完成，对这两条沉船的距离、位置、船体装置以及吨位、铺位等看得比较清楚。

1. 两条船东西相距约50米。离海岸（涨潮边）约250米。位置在蛤堆后村渔业队驻地正北方向一条，西北方向一条。

2. 船体内壁全用6寸厚的关东柞木板组装，外壳用黄铜

叶子包护,船钉、栏杆全用紫铜做成。从床位看,每船可乘四、五十人。从吨位看,载重量在10吨开外。

3.船体呈梭形,中间圆粗,两头特别尖细,长约5丈左右,腰部宽约6尺。至于原来船高多少,看不清楚。解放后养马岛中原村机船队曾在沉船上炸去了上半部,捞取了一些铜、铝等物卖了。现在剩下的也有6尺多高。

4.两船的大小、类型和内部装置基本相同。船内机器全部丢失,螺旋桨也不知去向,现在只剩下空壳一个了。

牟平出土之部分古铜币

孙 承 渭

牟平县文化馆收藏的铜币很多，有宁海镇、姜格庄镇、水道镇、大窑乡等地出土的，有收集于民间的，大小、重量等等不一，形状特异的共100余种，现摘要介绍如下：

齐刀币，由作为生产工具的刀演变而成。1958年于现水道镇东邓格庄村出土，有即墨之法化（化，音货，下同）、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法化四种，共50枚，均为刀形，形体大同小异，既大且重，有边郭（廓）。在刀身与刀柄处中断。刀柄面、背与刀身背面近前端处分别有两条纵纹和三条横纹，疑系象征纵横周流四方，并有装饰美。面文、长宽与重量则有异。

节（音即）墨之法化，有大小两种形制，牟平出土的为大型制的，长18.6厘米，最宽处2.8厘米，重49.5克，面文为“节墨之法化”五字，并有背文。（见图1）

安易（音阳）之法化，形同即墨之法化。长18.5厘米，最宽处3厘米，重38克，面文为“安易之法化”五字，并有背文“化”字。

上二种铸有铸造地点。

齐之法化，形同即墨之法化。长18.7厘米，最宽处2.9厘米，重42克，面文为“齐之法化”四字，有背文“𡗗𡗗”二字。

齐法化，形同即墨之法化，是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01年）统一的货币，是齐刀币中最多的—

种。长18厘米，宽2.8厘米，重39克，面文为“齐法化”三字。背文模糊不清。

前三种为姜齐时铸币，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后一种为田齐时铸币，流通于战国时期齐国。

齐币之为刀形，盖取义“利于民”，名“法化”为标准铸币的意思。

镒六化，为圆形方孔钱的鼻祖，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战国时期齐襄王时(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5年)的铸币。重5.4克，直径3.5厘米。面有外郭(廓)，光背。面文为“镒化”二字，流通于战国时期齐国。

秦半两钱，中国圆形方孔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了。1975年牟平发动机厂出土。为秦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废除贝币和六国铜币，统一为圆形方孔铜币，重半两(现重4.2克)，面直径2.4厘米，背直径2.6厘米，无郭(廓)，光背。面文为“半两”，重如其文。流通于秦及西汉初。(见图2)

此一圆形方孔形制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朝末年之制钱，历时两千余年。

西汉半两钱，1962年姜格庄镇姜格庄村北出土，有大小数种。汉初榆荚半两，有大孔、小孔两种，大孔的重1.8克，直径2.3厘米；小孔的重2克，直径2.3厘米。面文为“半两”，但重与文不符，均为光背。汉半两钱，重2.4克，直径2.6厘米，无郭(廓)，面文为“半两”，光背。汉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始铸，至汉武帝元狩5年(公元前118年)，其间除武帝铸行三铢钱外，汉半两钱为这一阶段的“法钱”(标准铜铸币)(见图3)。上述数种半两钱流通于西汉前

期。

汉三铢钱和汉、魏五铢钱，1962年姜格庄镇姜格庄村北出土。西汉三铢钱，汉武帝元狩元年至5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8年）铸。重1.7克，直径2.3厘米，圆形，大方孔，面文为“三铢”，字迹已模糊不清，无边郭（廓），光背。流通于西汉中期，因轻，改铸五铢钱。汉武帝时专令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已残，准重，圆形方孔，直径2.6厘米，外郭（廓）整齐，面文为“五铢”，光背。铢字的“金”字旁上头为△形，“朱”字头方折，“五”交笔较直。（见图4）五铢衡法轻重适宜一直延用至隋，历时700余年，为我国使用历史最长的铜币。不过，以后各朝所铸五铢钱字形、与汉武帝时所铸五铢钱字形小异，汉昭帝、汉宣帝时所铸五铢钱，铢字的“金”字旁较“朱”字旁低，重3克，直径长2.5厘米。郡国所铸五铢钱，边郭（廓）厚薄不匀不净，留有毛刺，重3克，直径长2.5厘米。东汉建武16年（公元40年）所铸五铢钱，铢字的“金”字旁的头较大，四个点也较长，“朱”字的头圆折，重2.5克，直径长2.5厘米。魏明帝时所铸五铢钱，“五”字交笔弯曲，外郭（廓）宽，面文字画肥，重3克，直径长2.55厘米。五铢钱由西汉流通至唐。唐高祖武德四年废止，但旧五铢钱仍在民间继续流通。

1963年解甲庄镇冶头村村民掘地得汉“半两”钱范，长23厘米，宽13厘米，为滑石制成。

新莽铜币。王莽居摄（公元前24年—公元前22年），变汉制，废五铢，造“大泉五十”。不被信用，于是改铸“货

泉”。旋又改铸“货布”（见图5）。其自想诸币流布四方，结果事与愿违。”大泉五十”，1977年3月4日快活岭西面（县药材公司院内）出土，重3克，直径2.7厘米，面文为“大泉五十”，有边郭（廓），光背。与“契刀”、“金错刀”、五铢钱并行流通。“货泉”，1958年姜格庄镇上寨村出土，重1.8克，直径2.1厘米，面文为“货泉”，有边郭（廓），光背。一时流通的钱有六品（金、银、龟、贝、钱、布），布有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币制杂乱，难以流通，民间私用五铢钱。王莽患之，下诏严惩，官民均受其苦。地皇元年（公元前20年），改铸“货布”。货布，1958年姜格庄镇上寨村出土。平肩平足，铲形。重11克，长5.6厘米，宽2.2厘米。面文右为“货”字，左为“布”字。圆孔，有边郭（廓），光背，与“货泉”并行流通，值“货泉二十五”。（见图6）

东汉兴，复铸五铢钱，废王莽诸币。

唐铜币。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初，仍沿用隋之五铢钱。至武德4年7月（公元621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通称“开元钱”。“开元”为“开辟新纪元”之意，不是指年号。面文按先上后下，次右后左的次序读之，如果自上及右再下后左读之为“开通元宝”，其义亦通。为后世称铜币为“通宝”或“元宝”的由来。我国衡法自此不再以“铢”计算，改用“两、钱、分、厘”十进法。终唐之世，以铸开元通宝钱为数量最多。据《旧唐书》记载，有开元、乾封（铸有皇帝年号最早的铜币），乾元三种。在本县大窑乡杏林堡村出土的有“开元通宝”、“乾元通宝”两种，“开元通

宝”有大小、重量不等的三样：①重2.4克，直径2.5厘米；②重3克，直径2.4厘米；③重2.4克，直径2.3厘米。（见图7）面文为“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公元758年至760年时铸，重3克，直径2.4厘米，面文为“乾元重宝”。两种均有边郭（廓），光背。前者流通于唐及五代，后者流通于中唐以后及五代。

宋铜币。县内出土的宋铜币，面文达30余种，为各代铜币之冠。这与宋朝皇帝改元频繁有关。如宋真宗建元后，相继改了“咸平”、“景祐”、“祥符”、“天禧”四个年号，每改一次年号，都随之改铸一些新年号铜币。1978年，大窑乡南杏林堡村出土的有如下多种：“淳化元宝”，重4.2克，直径2.4厘米，面文为行书“淳化元宝”，宋太宗御笔，淳化（公元990年—994年）时铸，宽边郭（廓），光背。（见图8）“咸平元宝”，重3克，直径2.4厘米，面文为“咸平元宝”，宽边郭（廓）、光背。宋真宗咸平（公元998年—1003年）时铸。“祥符元宝”，重2.9克，直径2.4厘米，面文为“祥符元宝”，宽边郭（廓），光背。宋真宗大中祥符（公元1006年—1016年）时铸。“天圣元宝”有大小、重量不等的三样：①重3.6克，直径2.55厘米；②重3.6克，直径2.45厘米；③重2.8克，直径2.4厘米。面文均为“天圣元宝”，皆宽边郭（廓），全为光背。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年—1032年）时铸。“熙宁元宝”，面文字体有篆、楷两种，称“对钱”，即成双配对的钱，钱文书体不同，余均同。重3克，直径2.5厘米，面文为“熙宁元宝”，宽边郭（廓）光背。宋神宗熙宁（公元1068年—1077年）时铸。“元丰通宝”，重3.3克，直径2.5厘米，面文为“元丰

通宝”，宽边郭（廓），光背。宋神宗元丰（公元1078—1085年）时铸。“绍圣元宝”，重3克，直径2.4厘米，面文为“绍圣元宝”。宋哲宗绍圣（公元1094年—1098年）时铸。

馆藏还有宋、金、明、清、民国、日本等多种铜币，惜未记出土和收集的时间和地点，有的尚未查清铸造朝代。除民国铜币外，余者面文均与币名同。

“宋通元宝”，重3克，直径2.5厘米，宋太祖时铸。

“太平通宝”，重2.8克，直径2.4厘米，宋太宗初铸。“元符通宝”重6克，直径3.1厘米，宋哲宗时铸。宋徽宗时铸五种：①“崇宁重宝”，重9.5克，直径3.3厘米；②小型“大观通宝”，重3克，直径2.4厘米；③大型“大观通宝”，重14.6克，直径4厘米；④大型“圣宋元宝”，重5克，直径2.8厘米；⑤小型“圣宋元宝”，重3.1克，直径2.4厘米。光背，均有边郭（廓）。“建炎通宝”，重5克，直径2.9厘米，光背，有边郭（廓），南宋高宗建炎（公元1127年—1130年）时铸，流通于南宋。

金铜币。金初，沿用宋、辽旧币，历40余年。海陵王正隆2年（公元1157年）始铸。“正隆元宝”钱，重3克，直径2.5厘米。光背，有边郭（廓），流通于金。（见图9）

明铜币。“大中通宝”重20克，直径4.5厘米，有背文“十”字。明太祖初铸，（见图10）“洪武通宝”（赤铜），重2.7克，直径2.3厘米，光背，明太祖即位后铸。“永乐通宝”，重2.8克，直径2.4厘米，光背，永乐9年（公元1411年）铸。（见图11）“万历通宝”，重3克，直径2.5厘米，光背。万历4年（公元1619年）铸。“天启通宝”，重3

克，直径2.6厘米，背文为“工”字，系工部所铸。“崇禎通宝”，有大小两种，大型的重3.05克，直径2.6厘米；小型的重1.4克，直径2.1厘米，皆光背，有边郭（廓）。明币均随铸造的先后流通于明。

南明铜币（南明，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弘光通宝”，重2.5克，直径2.45厘米，光背。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铸，流通于南明。（见图12）

周铜币（周，周王吴三桂所建政权）。吴三桂之子吴世璠时铸，出土两种：“昭武通宝”，重3克，直径2.3厘米，吴世璠昭武元年（公元1678年）铸；（见图13）“洪化通宝”，重3克，直径2.5厘米，吴世璠洪化元年（公元1679年）铸，光背，有边郭（廓），流通于周（今南方）（见图14）

日本铜币“宽永通宝”，重3克，直径2.4厘米，面文为汉文“宽永通宝”，背文为“文”字。（见图15）“宽永”系明天启时（公元1621年—1627年），日本天皇后水尾年号，所铸宽永钱，随倭寇侵扰时流入我国沿海各地很多。

清铜币。清铜币有制钱和铜元两种。制钱流通到本世纪20年代，铜元流通到本世纪30年代。年代较近，散存于民间的很多。

制钱（因其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有定制，故名），俗叫“小钱儿”。“顺治通宝”，重4.2克，直径2.7厘米，面文为汉文，背文为满文（也有兼铸汉文的，下同）。顺治时（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铸。（见图16）“康熙通宝”重4.5克，直径2.8厘米，背文为汉满两种文字。康熙时（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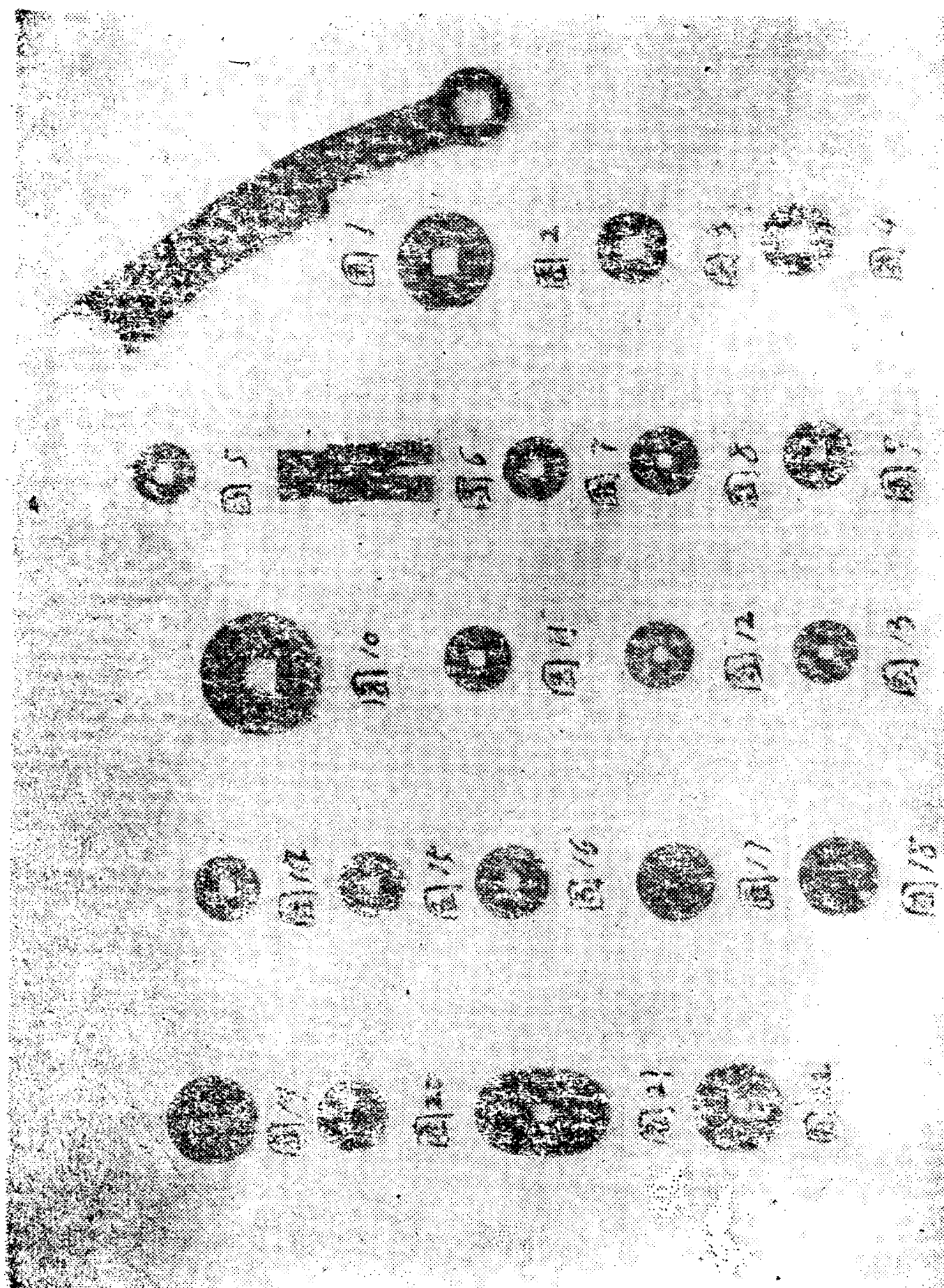
元1662年—公元1722年）铸。“雍正通宝”，重4.8克，直径2.7厘米。雍正时（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铸。“乾隆通宝”，重3克，直径2.6厘米，乾隆时（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铸；“道光通宝”，有大小两种，大型的重5.5克，直径2.7厘米；小型的重2.7克，直径2厘米，道光时（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铸。“咸丰通宝”，重3克，直径2.2厘米；“咸丰重宝”，重10.5克，直径3.4厘米，背文有两个满文和“当十”两个汉文，均为咸丰时（公元1851年—公元1861年）铸；“光绪通宝”，重2.4克，直径2.4厘米。光绪时（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铸；“宣统通宝”，重1.8克，直径1.9厘米，清废帝宣统时（公元1909年—公元1911年）铸。

铜元。俗称“铜子儿”、“铜板”。“光绪元宝”，重6克，直径2.8厘米。面文为汉满两种文字，铸有铸造地和币值；幕（音纓）为蟠龙花纹。（见图17）“大清铜币”，重6克，直径2.8厘米，面文为“大清铜币”、“丙午”（光绪32年，即1906年）铸。户部负责铸造。“幕”也是蟠龙花纹。（见图18）上述两种铜元均无穿（即中间无方眼），系机器制作，整齐精巧。都是光绪时铸，流通至抗日战争前夕。

中华民国铜币。有开国纪念币和一分两种。“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重10克，直径3.2厘米，币值为当制钱20文，俗叫“大铜子儿”。（见图19）；另有重6克，直径2.85厘米，币值当制钱10文的，俗叫“小铜子儿”。（见图20）一分铜币，重3克，直径2.6厘米。均与清铜元并行流通，同时废止。

另外，还有尚未查清铸造朝代的出土铜币多种：“天保

通宝”，椭圆形，重13.8克，长4.8厘米，最宽处3.2厘米，背文“当百”。（见图21）“常平通宝”，有大、中、小三种。大型的重11.4克，直径3.2厘米，背文“均五当五”，宽边郭（廓）、（见图22）中型的重4.8克，直径2.8厘米，背文“营火五”；小型的重4.2克，直径2.4厘米，背文“训文七”，宽边郭（廓）；“文久永宝”，重2.4克，直径2.6厘米，背为浪花纹；“光中通宝”，重1.8克，直径2.3厘米，光背，宽边郭（廓）；“安法元宝”，重1.8克，直径2.2厘米，面有宽边郭（廓），光背无郭（廓）；“明金通宝”重3克，直径2.5厘米，光背无郭（廓）；“绍统通宝”，重1.8克，直径2.2厘米，背文为“正”字；“景盛通宝”重0.7克，直径2.1厘米，光背；“景兴通宝”，重2克，直径2.3厘米，光背，宽边郭（廓）；“景兴巨宝”，重2.4克，直径2.4厘米，光背，宽边郭（廓）。



昆嵛山名胜纪略

曲言训

昆嵛山位于牟平城东50里，南北约百里，东西90余里，绵亘牟平、文登两县，古名根余山，唐代以后，始称昆嵛山。主峰大白顶，海拔923米。登是顶，虽在盛夏，不着棉衣，亦感寒冷。春回大地，群山冰雪消融，唯此顶积雪不化，远望如戴白冠，所以古时称为“大白顶”（《宁海州志》、《文登县志》）。后代诸家，各执一端，“大白顶”名称也屡有更异。佛家讲大慈大悲，管“大白顶”叫“大悲顶”（无染院《永康石刻碑》）；文人学者附庸风雅，把“大白顶”叫着“太白顶”（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太白，有诗云“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远望大白顶，似武士盔甲，当地居民，多有把昆嵛山叫着“盔甲山”者；十年动乱时，形式主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认为凡是“白”字都是反革命的象征，有的人就把大白顶，改为“泰礴顶”了。《齐乘》云：“南岱东沂之外，沂（沂水）之蒙山，密（诸城）之九仙，即墨之大小劳（嶗），宁海之姑余，般阳（淄川）之长白，皆三齐之高大名山也，余不得并列。”金朝散大夫国称曰：“昆嵛麻姑洞天也，诸山绵亘相属，秀异峭拔，为东方冠。”西晋永嘉（307—312）年间，曹嶷占据了青州，后赵石勒派侄儿石虎来攻，曹嶷不敌，欲退兵东海，保根余山。“（崔鸿《十六国春秋》）根余山即今昆嵛山。

昆嵛山群峰峭拔，涧谷纵横，岚光掩靄，林木葱郁。登大白顶，举首天外，俯视寰中，三面碧海浩渺，半岛群峰耸翠，犹如置身瀛洲仙岛之上，顿生吞云吐雾飘飘欲仙之感。清代学者王士禛（1634—1711）云：“昆嵛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遥望之，山化为海，唯余一岛，岛外悉波涛弥漫，舟船往来山下，人但觉在雾气中。”

昆嵛山名胜古迹很多。除昆嵛叠翠、烟霞洞天、龙池喷雪分别列为牟平十景之外，岳姑殿、神清观、无染院等十几处寺院道观，昔日极尽香火之盛，尔今仍有遗迹可寻。月牙石、石楼阁、升仙岩、卧龙坪、天门山、三瓣石等诸多名胜，各具风貌，历来为游人所倾倒。现举昆嵛山名胜之荦荦大者，简作介绍，对远来游客和有志于开发修复昆嵛山旅游区的志士仁人，或可有所裨益。

麻姑仙迹

姑余山，是昆嵛山北部的一个山峰，海拔355米。古名失考。北宋初年，麻姑观观主老尼姑王宁缘，首次把此峰定名为姑余山。山上有麻姑大仙殿、麻姑梳妆阁、麻姑冢等古迹。麻姑的神话传说，最早起于江南，见于东晋葛洪《神仙传》。传中言“麻姑为建昌（今江西省）人，曾在姑余山修道，东汉桓帝时，应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能掷米成珠，自言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此次来时，又见蓬莱之水浅于旧时。”又说：“三月三日为西王母寿辰，麻姑于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王宁缘以“姑余山”为此山定名，既谐昆嵛之音，又附会了麻姑仙迹。但后

人以“姑余山”代替“昆嵛山”则大谬不然。姑余山属昆嵛山之一峰，不能囊括昆嵛山。至于《太平寰宇记》、《夷坚志》、《齐乘》等书的作者，均以山中碑记为依据而持姑余早于昆嵛之说，后人又以以上诸书为据，以讹传讹，沿袭至今。金元两朝，全真教得势，与南方正一教相埒。麻姑家在南方，难逃劫运。全真教七真人之首邱处机，曾有“麻姑不自蔡经传，只是东方后学仙”的诗句，抵毁之余，并将麻姑相毁掉，改塑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即岳姑）神象，“麻姑殿”遂改名为“岳姑殿”，“姑余山”的名称也渐被遗忘，人们习惯于把“姑余山”叫“岳姑顶”了。莱阳人周正，写了一篇《姑余山记》，极言姑余山应祀麻姑，不应祀岳神。朝代迭更，屡经兵燹，岳姑殿也已毁圯无余，但麻姑梳妆阁还远远可见，至今山下居民，还有把岳姑顶，称为“梳妆楼”的。姑余山东南，有村名“涝芥”，山泉至为清冽，水中不生青苔，不孳蚊蝇，用以酿酒最佳，现有村办酿酒厂一处。过去曾有谚语说：“不饮涝芥水，枉进昆嵛山。”确有一定道理。

无染院碑

无染山。在昆嵛山主峰大白顶之南麓（原属牟平，现划归文登。因与本县文献关系至为密切，故作简介）。山上有无染寺。寺中有东汉桓帝永康三年石刻。但永康只有元年（167），并无三年，旧《府志》、《县志》都以此为据，断定石刻是后世伪造。据传闻，本县佛寺多建于唐贞观年间，年代最早又确有文字记载的，当属此院唐昭宗光化四年

(901) 的无染院碑。据碑文载,此院系法主和尚巨弘创建。碑后所载的施主中,竟有吴越王钱镠的名字。钱镠(852—932)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唐末从石镜镇将董昌镇压起义军,任镇海节度使。乾宁三年(896),又击败董昌,后梁开平元年(907)封为吴越王。由此可知,当时和尚募款化缘,行程远达杭州,且入使相府中,神通确实广大。当时无染院香火之盛亦可想见。碑文中还提到一位施主,值得注意。文中说:“鸡林(今朝鲜)金清(姓金名清)押衙(小官名),家别扶桑(离开日本),身来清社(来到山东),货游鄞水(到浙江宁波做买卖),心在金田(心中信奉佛法)。”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本县与朝鲜、日本之间,已有相当贸易关系,朝鲜族的巨商大贾,经常路过本县。无染院内石龕下有一空洞,相传是齐宣王的王后钟离春(即丑女无盐)之墓。但东平县也有一个无盐墓,揆之于理,以在东平县内者为是。此处之无盐墓,恐因“东平”、“东牟”音混字误所致。

烟霞洞天

烟霞山,属昆嵛山之西北岩,不是一个独立的山峰。山际有烟霞洞,旧志书多标名为烟霞山。烟霞洞为一突兀岩石自然造化所成。洞口呈弧状,上刻“烟霞”二字。洞室椭圆形,长径约7米,高2米,洞壁略经雕凿,壁上镌“烟霞洞”三字。洞外峰峦环抱,林谷幽深,危岩耸立,石径迂回。每遇阴霾天气,洞口云海泛涨,烟雾缭绕,并时有霞光映射,景色奇绝,烟霞洞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烟霞洞天”历来为

远近游客的观赏胜地，素称昆嵛山诸名胜之冠。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咸阳道士王重阳（1113—1170，原名王哲，字知明，号重阳子），自终南山云游东下，至昆嵛山，在烟霞洞潜心修道，创立了“全真教”。王重阳收了七个弟子（邱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后称七真人。洞内原有七真人石象，十年动乱时砸毁。烟霞山之前冈，有巨石如门，因名“石门”。旁有小村，叫石门子。自殿后村南行，有公路支线经过此村，机动车辆可直达“老师坟”。老师坟是清初戚兆伯的坟墓，兆伯生于明末，不肯仕清，隐居于烟霞山飞泉之下，死后由弟子安葬于此。

龙池喷雪

苍山，属昆嵛山之西北峰，位于玉林店乡桃园村东南，海拔685米。远望此山苍翠如沐，故名苍山。山麓崩崖对峙，有石壁长100多米。石壁上梯列着9个天然的圆形深池，大的直径三四米，小者直径一米多。传说古时有9条神龙触犯了“天条”，被玉帝镇居于此，“九龙池”名称由此而来。池水清澈无比，春日细流涓涓，池水碧波荡漾，夏则飞瀑奔溅，风激悬流，如撒珠喷雪。”“龙池喷雪”属牟平县的一大奇观，列为牟平十景之一。自山下攀登，只能登至第4池，再上则削壁滑苔无法立足，游者只好“望池兴叹”了。清代诗人赵子辕曾作《龙池放歌》一首。歌曰：“怀襄之世河海决，孽龙九种脱缰维。天帝一怒神符驱，锁向空山万年蜃。嶙峋绝壁不计仞，直立如掌何巉巖。狂性难驯吼且

奔，玉匣擘破飞流泻……鳞张爪厉相搏战，怒流沸涌如鼉穴，飘沫溅珠眩我目，崩云屑雨咋我舌。此时对语不闻声，仰视奔瀑下寥泐。”这是对“龙池喷雪”的生动描绘。

秦皇遗迹

犂道山，是昆嵛山东北峰之一，海拔340米。山岚起伏，中有东西通道。相传秦始皇东巡，修犂道于此，故名犂道山。如今公路、马车路都改经它处，犂道久废，但当日犂道形迹还隐约可辨，山顶有一孤石，巍然矗立，本地人管叫此峰为“孤石顶”。犂道山北有旴里口，从前是文登、牟平两县人民往来的道口。《尚书·光典》云“乃命羲仲，宅嵎夷，曰旴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羲仲是帝尧派往东方观测星相、判定季节、制作历法的官员。嵎夷，即胶东一带之地，包括牟平在内。古人以旴谷为日出之处。今之旴里口子，正是当时观日出的地方。《书经》中的“寅宾”二字，亦指古人欢迎日出的一种仪式。据此推断，今之旴里口，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旴谷”。

系马峰是昆嵛山的东北峰之一，南与犂道山相连，海拔422米。山顶也有一孤石，但比犂道山上的为小。本地人称此峰为“小孤石”。《寰宇记》载：“系马峰在城东四十里，始皇东游，于此系马。”后代达官显贵，每经此县，必登此峰，以览始皇系马古迹。地方官民不胜其扰。清代知州舒孔安想出了个好办法。他在修《宁海州志》引用《寰宇记》时，将其中“城东四十里”的四字，改为“北”字，这样城东四十里，就成了“城东北十里”，同时把城东北十里

的“戏山”，改为“系山”，这样以来，就减轻了不少麻烦。后世的人，代代相因，弄假成真，真个把“戏山”当成秦始皇系马之“系山”了。

月牙石刻

圣经山，原名“月牙石”（属文登县境），位于昆嵛山南部。峰顶有一巨石，长16米，高6米，形如月牙。金元之际，王重阳的徒弟马钰（1123—1203，宁海城内人，七真人之一），仿照摩崖石刻，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在月牙石上，用颜体楷书，镌刻了老子的《道德经》上下两卷，凡五千字。字体古朴苍润，洋洋洒洒，十分壮观。“月牙石”也因此更名为圣经山，文登县的“晒字”村，亦因当时晒字刻经而得名。

昆嵛山山深林密，地势险要，远攻近守，俱为有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宁海人郝义起义，据昆嵛山，点上了一把火，山上的寺庙宫观付之一炬。解放前，文登、牟平一带好多国民党游击队司令如郑维屏、秦毓堂等，曾以昆嵛山为基地，参加过抗日活动。以后又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培植势力，勒索乡民，反对革命，走上了反共道路。1941年5月，我5旅14团及东海部队，打进了昆嵛山，击溃了秦毓堂、郑维屏、张建勋、丁维庭、安延庚等残部，解放了昆嵛山，巩固了一、二、三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此期间，于得水、林一山等同志以昆嵛山为根据地，组建了昆嵛山抗日游击队，并建立了昆嵛山兵工厂。胶东子弟兵大显身手，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使日寇亡魂丧

胆。作家冯德英的著名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都是以昆嵛山抗日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为题材的。

昆嵛山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雨水充足。土壤以沙褐土为主。山上树木葱郁，百草丰茂，每年都为当地居民提供大量烧材。主要树木有松、柞、杉、槐等20余种。山上除产黄芩、苍术、桔梗、天南星等常见药物外，天麻、人参等贵重药物，也有发现。解放前，昆嵛山（牟平境内）除庙岚公产外，大部分为常龙兴等牟平八大家所占有。1942年，我政府接管了昆嵛山。1944年，建立了林场，实行封山造林。修起了流水石到马脰，滩上到马圈两条通山林道，全长4600余米。同时修筑了石门到黄垒口（俗多讹作“黄连口”）庵外到殿后两条公路，共长2638米，改变了“山中有宝进山难”的局面。1980年，在昆嵛山建起了木材加工厂、养鹿场，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昆嵛山也是大有前途的。

旅美中医于碧川博士

于庆喜

1985至1986年度，美国南加州华商年鉴，评选于碧川博士为当代名人，列入《当代名人录》。当时，我省在华商年鉴中，列入当代名人录的，只有于博士一人。

于碧川博士，1928年生人。原籍山东省牟平县莱山镇北陈家疃人。现任美国南加州韩华联谊会会长、联合大学汉医大学院副院长、亚美中医大学教授、中和堂汉医院院长。

于博士父名于善述，1959年病逝。生4子，长子于忠仁，务农乡里；次子于忠义，1948年冬去南朝鲜汉城行医，获中医学博士学位；三子于忠礼，即于碧川博士；四子于忠智，现在美国任天主教大学教授，获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一门三博士，这在美国侨社中是少有的。

于碧川医师，自幼喜爱医学，立志攻读医书，解人病痛，救人困苦。1947年，被生活所迫，与文登师范同学孙守波、郝配霞等到南朝鲜汉城谋生。赴朝后在亲戚陈方文的资助下，入釜山东洋医学专门学校攻读医学，后经南朝鲜汉医师国家考试合格，又经中国考试院中医师考试及格。在汉城悬壶行医，历时28年之久。因于医师医术精湛，疗效卓著，1959年，南朝鲜副总统颁发给于医师以“韩国全国医术功劳奖”，1963年南朝鲜举行国定医学纪念日大会时，保健社会部长官，又颁予“医术服务奖”，以激励于医师在医术方面

的独到造诣和促进中国与南朝鲜两国国民外交方面的贡献。南朝鲜韩医师协会及汉城市汉医师协会又分别于1968年和1971年9月25日（汉医药纪念日）赠于医师以“感谢状”，进一步表扬其在中医药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

于医师在南朝鲜居留期间，鉴于华侨子弟学医者日众，教室不敷使用，学生分为二部、三部制上课，有碍于正常学习。为此联络有志者侨领多人，筹建华侨中高等学校迁校扩建，出钱出力，从不后人。除本人慷慨解囊外，并热心奔走挨门逐户筹谋建校资金。终至学校迁好建成方心安理得。因此获台湾政府颁发“兴学勋章”一枚。1965年，在于医师的热心倡导下，成立了旅南朝鲜汉医师学会，于碧川医师，深孚众望，被选为会长。

1974年7月2日，于医师移居美国，举家在洛杉矶定居。之后，在纽约州、加州考取针灸医师执照，近年又获得亚美中医大学中医学博士及针灸学博士学位。并由加州教育局审查通过，发给中医学、针灸学教授资格证。被南加州联合大学、中医大学聘为副院长，兼任两所中医大学教授。

于博士现在还是南加州华商社会的中坚分子，对促进华商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有一定的贡献。1966年，于博士被选为国际狮子会正式会员。在狮子会活动将近20年，对地域社会的发展也有相当的作用。在洛杉矶市，于博士开设“中和堂”中医院，行医治病，除自身诊疗业务外，还热心公益事业，在美华侨一致推选于博士为“南加州汉华联谊会”会长及南加州针灸中医师公会副会长、洛杉矶齐鲁会馆副理事长等职。为谋求华侨之福利，促进华侨的亲睦团结，任劳任怨，有相当的影响力。

于博士医德高尚，在推动侨胞继承、发扬我国的医学传统上有卓越的贡献，尤擅辩证施治。他统察全般、对症下药而不泥古法，对生理、病理、药理の辩证关系娴熟，对中医学、针灸学都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造诣。现引于博士治肾结石的临床经验，以例其余。

据统计，1981年美国罹患肾结石症的约有82.1万人，尤其近年来由于维他命C的大量使用，有很多人引起草酸盐的尿道结石，我国人又喜喝茶，茶叶内含有高量的草酸盐，又会增加草酸盐结石的危险。美国人口中，约有6%的人患有肾结石，其中8%的患者可自然消除，20%肾患者需动手术取出结石。但即使采取国际上最先进的手术方法（如西德一家太空公司发明的“震波碎石机”能够把结石块震碎，再用吸引器把震碎的砂砾般的小块吸出体外。奥地利维也纳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教授歇尔·玛伯珞创造使用的“皮肾镜摘除肾结石”的新方法），均会给医院和患者造成诸多不便。“震波碎石机”重约4吨，一般医院购置不起，就患者说在经济上、精神上、时间上都会感到很大困难，又不能保证不再重犯。于博士积40余年的临床经验，殚精竭虑，穷本溯源，创造了一套中医治疗肾结石的经验。经于博士治疗之肾结石病人不计其数。除两例因服药中断而结石再发外，其余患者无不手到病除。

于博士治肾结石，首先从我国医学典籍如《皇帝内经》、《金匱要略》、《诸病源候论》中，探求肾结石的症状与病理，同时，结合现代医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肾结石病理，做了精确的表述：

“肾结石是因营养久缺维他命A，以致内脏的上皮部分

变硬脱落成为吸集钙质的核心，将尿中之钙质集结起来而成为结石，亦有因寄生虫的卵或虫尸造成的结石核心，而久久成为结石的。至于在膀胱的结石，则是由肾结石下移而来的。此时常易造成输尿管结石，或在膀胱内造成更大的石粒，或更多的结石，平时嗜食过多的碱性食物，含有引起草酸盐的食物，吃得太多了，便使尿的碱性提高，以致无机物质固结成块，结石症因此形成。”

于博士深明中医学“治病必先求其本”的核心，非常重视辩证施治。常按《内经》所立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施治。循望、闻、问、切四诊之法，对具体的病症，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对疾病的处所及疾病的性质，有全般的了解，然后决定治疗的步骤与措施。不泥执一端，不死守成规。

经他确诊为肾结石之后，主要是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1. 湿热型

症状：腰腹绞痛，突然发作，痛连小腹或向阴部放射，尿痛、尿急、尿涩而余沥不尽，常伴有血尿。有时尿中杂有沙石，致排尿困难或尿线中断。舌色红，舌苔黄而厚腻，脉弦数或滑数者。

治法：以清热利湿、化石通淋之法治之。

处方：泌尿排石汤方：金钱草一两，海金砂八钱包煎，滑石八钱，甘草三钱，木通三钱，车前子三钱包煎，扁蓄三钱，炮川山甲三钱，淮牛膝三钱，川楝子三钱，水煎服。

处方加减法：若小便短赤不利或尿痛者，加黄柏三钱，瞿麦三钱。尿血，酌加大小蓟各五钱、血余炭三钱，生地三钱，丹皮三钱。腰胁小腹痛较甚者，加川断三钱，乌药三

钱。肾绞痛剧烈者，宜加乳香、没药各一钱（乳香要去油制好，不然易引起呕吐，没药要炒用）

处方：导赤散加味：生地五钱，木通三钱，甘草梢二钱，淡竹叶三钱，金钱草一两五钱，海金沙三至五钱，车前子三至五钱，冬葵子三钱。鸡内金二至三钱，水煎服。血尿者，可加仙鹤草、大小蓟各三至五钱。痛甚加乌药五钱，元胡二钱，郁金三钱，广三七粉五分冲服。

处方：八正散加味：滑石三钱，甘草二钱，川军二钱，山栀子、木通、车前子各三钱，扁蓄、瞿麦各五钱，海金沙五分（冲服），淮牛膝三钱，沙牛一钱，金钱草五钱，化石草五钱。若小便尿血，或加蒲黄炭三钱。

2·淤滞型

症状：腰酸痛而胀，小腹胀满隐痛，小便淋漓不尽，血尿或见血块，痛症时重时轻。舌质暗红或有淤点，苔薄，脉弦而涩者。

治法：以理气导滞化淤通络之法治之。

处方：桃红四物汤加减：当归尾三钱，川芎三钱，桃仁三钱，红花二钱，枳实三至五钱，大腹皮三至五钱，金钱草一两，海金沙五钱，连翘三至五钱，鸡内金三至五钱，冬葵子三钱，水煎服。

3. 正气虚弱型

症状：精神疲劳，饮食无味，脘闷腹胀，腰酸背痛，脚软无力，排尿不畅，大便稀溏，舌苔薄白，脉缓弱而沉细无力者。

治法：应以增补脾胃，增长元气为主。

处方：四君子汤加减：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茯苓五

钱，苡仁五钱，巴戟肉三钱，杜仲三钱，兔丝子三钱，海金砂三钱，金钱草一至二两。水煎服。

于博士在临床上还常以下记之方治肾结石，辄能药到病除。其处方为：沙牛五分或一钱冲服，生地黄六钱，木通五钱，车前子八钱，黄柏四钱，知母四钱，牡丹皮四钱，金钱草六钱，化石草五钱，海金砂二钱冲服。若尿血者加蒲黄炭、淮牛膝各三钱。本文所述之肾结石，包括“膀胱结石”及“输尿管结石”之症状和治法。据于博士之经验，结石若由肾脏流注在输尿管内而被塞住时，宜用八正散加减治之。尤其在膀胱内之结石，因“八正散”利尿之力较著，肾结石在肾脏内向外移动时极易发生剧烈疼痛，此时以上记之方治之较效。待结石移动在肾盂与输尿管交接处，或输尿管中间狭窄部位，或由输尿管进入膀胱部位时，这些部位都较狭窄，结石最易被塞住而发作疼痛。膀胱结石若年久症状严重者，还易转变成膀胱癌，就不属本文讨论范围了。

于博士悬壶生涯40余年，临床行医非常重视辨证诊治，于上可见一斑。他诊病时，惯于四诊合参，决不单凭指脉候事。有时舍证从脉，有时舍脉从证，舍弃现象，力攫实质，组方严谨颇具匠心，对症下药丝丝入扣，不知解除了多少人的病痛，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为了继承、发扬我国中医学、针灸学的优秀传统，让中医学这一国宝代代相传，后继有人，于博士在国外除倡导侨社筹资兴办中医学校成批培养中医人才外，还积极组建汉医师学会，自任汉医师学会会长，创办学报杂志、发表论文、举办中医学针灸学讲座，务使中医学、针灸学为各种肤色的人解除病痛，在全世界扩大影响。在南朝鲜举办中医学讲座时，于博士还把自己的讲学提纲，

用近体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以便听讲者速记。现录四首如下：

其 一

各位辘辘来听讲，
我特公开经验方。
心肝五脏有灵药，
胆胃六腑用神汤。
阴阳辨明起枯骨，
寒热分别愈膏肓。
医者临床贵变通，
针灸能治百病疡。

其 二

更有秘诀对君讲，
气血循环要正常。
火病易服凉膈散，
寒症忌饮白虎汤。
男士体亏补肾元，
女科经痛逐瘀方。
汗和吐下在权衡，
虚实表里准八纲。

其 三

学校杂志多披阅，

先贤医案诵莫忘。
伤寒金匱要熟读，
灵枢内经记胸膛。
望闻问切诊仔细，
浮沉迟数脉端详。
观颜察色审周密，
剑胆琴心处药方。

其 四

治疗方内兼补中，
调理气血筋脉畅。
急病先用针灸捻，
痼疾首须丸剂荡。
久患切忌用峻剂，
新瘥宜保胃气壮。

诸君记取经验谈，
日成月就医名扬。

于碧川博士，有个美满的家庭，妻子尹凤芝，也是位中医师，持家教子，颇劬辛劳，膝下二女三男，两个女儿已结婚，长女雪莉，在国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被国际商业电脑公司聘任为电脑程序设计技师。次女雯莉在加州州立大学毕业，是位会计师。长男庆宙，次男庆安，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三子庆宏，1986年入大学。五个子女已经或即将教育成材，可知于医师对子女教育付出了多少心血。

于博士离乡36年后，于1985年10月应山东省中医学院之

邀请，来祖国讲学，对交流中医药学术，不遗余力。趁回国之机，游览了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泰山、孔府、孔林、孔庙等名胜古迹，回家探亲时，又游览了青岛崂山和烟台等地的名胜，同时，回牟平老家，祭扫了祖墓。于博士认为自己虽属美籍华人，仍是炎黄子孙，对中国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寄予莫大的关心。表示将来一有机会，就要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最大的努力。

牟台小考

杨家齐

牟台，又名端午山，本地父老则习惯称之为“东牟郡”。位于牟平县城东北1公里，荣烟公路北侧，沁水河西岸。南北长150米，东西长100米，海拔29.6米。此山虽属蕞尔小阜，但为牟平近郊之最高处，山顶平坦如台，约1亩有余，金秋季节，登临远眺，沁水蜿蜒，长堤如带，碧水浩渺，渔帆隐现，山河城郭，尽收眼底，自古以来，就是本县著名的名胜风景区，明代杨循吉修的《宁海州志》中，就把“牟台秋望”列为牟平十景之一。

牟台上有东牟侯祠，《齐乘》（元代于钦撰）载此祠为纪念西汉时东牟侯刘兴居所建。《一统志》登州府名宦项下也说：“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侯，惠泽及于旁人，至今庙祀不绝”云云。考《史记》与《汉书》记载，刘兴居于高后6年（前182年）4月封东牟侯，仍“入宿卫”（入宫担任警卫工作），文帝2年（前178年）冬10月始令列侯就国。翌年（前177年）春2月，刘兴居为济北王，此年秋天，即谋叛被诛。据此，刘兴居封侯东牟至文帝2年，为时4年，在此4年中，他未奉就国之令，决不敢违禁亲至封地，何况他担任着皇宫的警卫工作，更不能擅离职守。奉就国之令至刘为济北王，前后相距不过5月，在这5月之中，他正积极参与谋划叛乱，更不会前来东牟，一

个从未踏过东牟土地的人，还会有什么“惠泽及于旁人”呢？即使他真有惠泽及人，被诛后，谁人如此大胆，竟敢公开立庙祭祀一个叛国逆臣呢？

明宁海州同知焦希程纂《宁海州志》（通称《焦志》）也以为东牟侯祠中所祀，决不是刘兴居。焦希程的论断是正确的。但他在排除刘兴居为东牟侯祠的祭祀偶像之后，却硬将史书中所载之刘濞，纳入这座祠中。查《汉书》所记，刘濞系齐孝王将闾之子，他的封号是牟平侯，不是东牟侯。汉之牟平，设置在今烟台市福山区，今之牟平县，汉时称为东牟。西汉初年，在东牟封侯的只有刘兴居，兴居败后，其国亦除；到了东汉，东牟之地又并入琅邪国内（《后汉书·光武十王传》），所以终汉之世，除刘兴居外，是没有第二个东牟侯的。兴居固非此祠之主，以之改为刘濞，也是毫无道理。焦志此错，乃混同牟平与东牟所致。于清泮修《牟平县志》时，也将东牟侯祠祭刘濞说，予以驳正，但东牟侯祠究竟祭祀谁人，于志存疑未断。

据《晋书》记载，魏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政权已尽落司马氏之手，司马昭就封其宗族司马骏为东牟侯，当时曾建别墅于牟台之上，司马骏“有孝行，好学能著书”。是晋宗室中政治地位显赫、人品学问著名于世的人物。后改封扶风王，卒后追赠大司马，加侍中，谥为武王，丧仪中许借用皇帝专用的黄钺。后世的人为了纪念他，就在牟台上建立了一座东牟侯祠，世世奉祀。

西晋末年，曾在东牟县置东牟郡（晋怀帝时，有东牟太守庞伉，见《一统志》；南燕时又有东牟太守张幸，见《魏书》）。既有东牟太守，必有东牟郡。所谓晋代

未置东牟郡，是错误的）。当时的东牟县署与东牟郡署都设在今牟平县城之内。后来牟台上的东牟侯别墅，因司马骏改封扶风王而空闲下来，所以东牟郡太守就常借用东牟侯别墅办理公务，接见僚属。人们就把牟台叫做“东牟郡”了。于编《牟平县志》卷二16页云：“牟平土人习称城东之牟台为东牟郡”，19页又云：“牟台……土人称为东牟郡”，可见牟台之有东牟郡的名称，由来已久，而且极为普遍。直至今日，山下附近一些村庄的老人，仍有称端午山为东牟郡的。后世的人，因此地是山而不是郡，就改称为“东牟山”。又因“东、端”二字双声，“牟、午”二字在本地方音中叠韵之故，又将东牟山演变为端午山了。

俗传，端午山因端午节赶山而得名，不足置信。旧历端午节，一般在夏至前后，有时恰好在夏至这一天。夏至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农民忙于割麦种豆，谁有余暇赶山赴会呢？再者，本地风俗，端午节要煮鸡子，包粽子，全家欢聚过节，亲戚邻里之间也忙着互相馈赠，此时远出赶山会，是不合情理的。端午山因端午节赶山会而得名的讹传，产生甚晚，大约在“七·七”事变以后，《牟平县志》中对此并无记载，而且连“端午山”三字也找不到。可证此说牵强附会，并无实据。

端午山西南坡上，原有一座小塔，系元代一僧人的葬塔，塔上字迹清晰可辨，十年动乱前，被毁。附近居民，多称此塔为“狗塔”，并以《聊斋志异》中的“义犬”故事相附会，认为塔下所葬正是该犬，以讹传讹，时间久了，竟至于不辨真伪了。

山上原有“双凤寺”，不知建于何代。此寺虽已久废，

但与它有关的地方旧闻一神碾与王福昌的故事，至今相沿不衰，其梗概如下。

双凤寺中有碾屋一处。凡山下妇女前去碾米的，一斗谷子准可碾出一斗二升净米，屡试不爽，人们都感到奇怪，却总是莫名其妙，只能感谢佛祖的保佑。因为能多出米，山下妇女来碾米的不绝于路。有一年，山上赶会，宁海知州的儿子也带了两个恶仆同来。他看中了一位乡下姑娘，就令二恶仆抢了过来，带进双凤寺中，将庙门紧闭。赶会的人义愤填膺，但又惧怕州官势力，无人敢管。这事惊动了两位义士，一位叫王福昌，城内北门里人；一位姓刘（名字失传），莒城村人。二人身强力壮，武功出群，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他们砸开了庙门，捉住了州官儿子及其恶仆，丢进正在烧纸的大火池中。回头寻找那位乡下姑娘时已不见踪影，于是逼问寺中僧人，僧人起初不肯吐实，二人就掀起一个大铁钟，将僧人扣在里面，四面生起火来，僧人无奈，百般告饶，说了实话。原来他们把抢来、骗来的少妇、少女，都关在地下室里，奸污后，才肯放出。王福昌、刘某救出了被关妇女，放火烧了双凤寺，并把寺中的恶僧全部投于火中，为地方除了一害。后来的人把这段故事编成剧本，登台演唱，剧名为《王福昌大闹端午山》，直到民国初年，此剧仍在本地演唱，颇受观众欢迎。

1929年4月1日，张宗昌、褚玉朴联军，包围了牟平城，困刘珍年于城内，张、褚的人数倍于刘，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刘珍年施离间计，买通了张军的一个营长，4月22日子夜时分，打开了东门，越过了沁水河，按突围计划到达预定地点沙子、老人仓，刘军全部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

番号，挥动青天白日旗，改东上为西进，直扑端午山而来，驻守端午山的一连张军，全部缴械，围城的张褚联军，从睡梦中惊醒，仓慌奔逃，溃不成军。刘军乘胜追击，在福山城活捉褚玉朴。端午山在刘张牟平城区之战中，竟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转折点了。

1931年，本县资本家张颜山自上海返里，在邵家港新建住宅中，修一花园，并将端午山纳入花园之内。在山坡上修起石磴，山顶建一凉亭，中设石桌、石凳。并修汽车路一条，自山之北麓，直至邵家港。但张回家后，仅住数日，花园工程未完，即离乡他去。其所修之花园、亭榭，未几即已荒废。至日伪占领时期，端午山就越发荒凉满目了。

1946年7月，牟平县政府为了纪念革命先烈，组织捐款，在端午山修建烈士陵园。陵园包括烈士祠、烈士塔、纪念亭、烈士墓地等部分。自端午山下，登70余道甬路石阶，直达烈士祠。烈士祠5间，由庙宇改建而成，祠内悬烈士画像并存放花圈，祠前为广场，备集会纪念之用。祠东登五级石阶，为烈士塔。塔呈方锥形，高14米，塔基围长10米余，塔身正下方镌“民族魂”3个斗大行书字。上方凸塑“牟平抗日烈士纪念塔”9个朱红大字。左右两面，刻抗日烈士名录，右面为碑文。出塔北门登30台阶，直上纪念亭。亭建端午山最高处，为五角形朱色建筑，五柱挺立，亭内置荷形圆石桌一个，石桌四围，布五石凳。亭左右两侧各置白矩形石桌一个，备宴息之用。陵园西南侧为烈士墓地，坟冢东西成排，每排四五堵不等。坟前皆立白石碑，镌死者身份、姓名、殉难时间及历史背景。甬路两侧和建筑空隙，遍植松、柏、槐、柳，西北侧辟果园24亩。如今端午山松柏常青，绿

柳成行，硕果累累，陵园装点得更为肃穆庄严，生气盎然。1969年和1974年，先后对陵园进行扩建修葺。石阶路下口新修牌坊式大门一个，门额题“牟平县革命烈士陵园”8个字，门旁左右竖联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原烈士祠改为革命烈士纪念馆。同时于正堂两侧各扩建侧室4间，备建烈士展览馆。新安塔围铁栅门3个，同时在纪念馆内增加寄存骨灰设置。

每逢清明节日，县城党政军民、学校师生，都登临端午山，瞻仰陵园，悼念忠魂，缅怀既往，展望未来，端午山烈士陵园起到了继往开来、激人奋进的作用。

牟平十大景

隋 清 欣

历史悠久的牟平县，环山滨海，山川秀丽，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仅旧志记载，就有十景之多。现将昔日牟平十大景情况简介如下：

范园春晓

现雷神庙战斗遗址处，是金代进士范恽的花园。范恽，牟平县城内人，字明叔。金代殿试得中进士。得中后，就在现雷神庙西侧建一五亩方圆的花园，故名范园。园内建有怡老亭，范恽经常与马丹阳（七真人之一）、高巨才和三教堂和尚竺律禅师在此宴集，饮酒赋诗，鼓琴下棋。后来王重阳（全真道祖师）访此，与马丹阳相识，常来此讲道阐玄。范恽便把花园赠给了马丹阳，并修建了玄都观（清代因与圣祖玄烨名讳，改用元都观）。马丹阳死后，邱处机（七真人之首）继居之。元初，邱处机应诏宣旨改玄都观为玄都宫。明崇祯年间，知州饶登去金龙山求雨，回返路经范园，呼雷打闪，风雨交加，饶登进玄都宫避雨，并许愿给雷神修庙。不久便在范园东侧修起了雷祖殿，这就是雷神庙名称的由来。清初，范园中的玄都宫已倒塌不堪，官府主持将玄都宫由园内迁建在雷祖殿东，中间留有空间作为风道。清乾隆年间，王家庄村有个叫王承彦的，在京开茶馆，有一太监与其亲密，

说娘娘有懿旨：“岳飞要下山东”。王承彦奉旨回乡主持，在原雷祖殿和玄都宫之间风道处，修起武穆殿。实际现雷神庙，由三庙组成，即西为雷祖殿，中为武穆殿，东为玄都宫。

当年的范园，处金龙山与浩岭山之间开阔地，阳光充足，北临州城城墙，挡住北来寒风，四周又有围墙圈套，“向阳花木早逢春”，别处花草刚有绿意，这里已是柳暗花明，鸟语花香，比邻近气候约早半个月的节气。范园里，遍植奇花异草，又有银杏、古柏相掩，“范园春晓”确有迷人之景。有诗为证：“山翠近南深，鸣驄亦屡寻。晴花送远日，香气满幽林。人事空怀古，风流独至今。常称佳丽地，随兴欲抽簪。”

到清末，“范园春晓”已名存实亡，而雷神庙的名字代替了范园。1938年2月13日，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坚定了胶东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1977年雷神庙战斗遗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便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尽管如此，“范园春晓”之景，至今仍在牟平传说不断。

牟台秋望

牟平县城东侧，沁水河西岸的端午山，古称“牟台”。曹魏末年，司马骏被封为东牟侯，建别墅于此，因名牟台。司马骏死后，牟台上修建了东牟侯祠。山上早年还建有双凤寺。西南坡有元代僧人葬塔一座。牟台又名东牟山，后因双声叠韵之故，讹传演变为端午山。这里松柏环绕，寺、亭错落，迤东而南，沁水似长练蜿蜒北流，岸堤绿树葱茏。特别是秋季，登上牟台极目远眺，山川城郭，无限风光一览无余。西

望州城，城墙巍峨，楼阁幢幢；东眺苍山碧水，村落棋布；北观黄海，养马岛横卧东西，海天一色，烟波浩渺，渔帆点点；南览山丘起伏，良田千顷，秋色耀金。古时牟台四围多种高粱，秋天，高粱晒米时节，如同点燃着无数火炬，登高远眺，牟台周围红似火，为秋望更加增美添色。

1946年7月，牟平县人民政府在牟台上（即端午山）建烈士陵园，定名为“端午山革命烈士陵园”。山上建有烈士祠（现为烈士纪念馆）、烈士塔、纪念亭等。多年来，这里一直为牟平人民缅怀先烈，悼念忠魂，进行传统教育的革命纪念地。

昆嵎叠翠

横亘文登、牟平两县的昆嵎山，峰峦连绵百里，山势盘桓曲折，壑谷交错，林木葱茂。历史上曾称之为“海上诸山之祖”。山内名胜不胜枚举，其中“昆嵎叠翠”便为牟平一大景。

昆嵎山的主峰大白顶，海拔922.8米，称得上胶东屋脊。此外在牟平境内尚有余脉姑余山、烟霞山、石门山、苍山等峰。群峰逶迤连绵，山青水碧，自山峰至深谷，树木种类繁多，百草丰茂，近观一片青葱，远望一片黛绿，这种苍山重合，翠绿折叠的景观，名之为“昆嵎叠翠”。

卢峰霁雪

牟平县大窑乡大窑村东南的卢山，山高峰陡，山石嶙峋，自县城东望，历历在目。每逢雪后天晴，卢峰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峰顶天色湛蓝，阳光映照，分外娇娆。《宁海州志》

把“卢峰霁雪”列牟平十景之一。杨维乔集唐五律赞为“异花天上堕，留顾岁华间。野外烟初敛，荒冈树影闲。吾卢幸接近，东望为开颜。何由宿峰顶，琼林寄一攀。”

石洞烟霞

在牟平龙泉乡东殿后村西南三里许昆嵛山西北隅有一烟霞洞。该洞为一突兀岩石自然造化所成，洞口面南，上额刻有“烟霞”二字。洞室呈椭圆形，高2米，长径7米左右。金元之际，马丹阳、邱长春、刘长生、谭处端、王玉阳、郝大通、孙不二号称“七真人”，曾在此潜身修炼，讲道阐玄。洞内石壁刻有“烟霞洞”三字，字迹端方古朴，苍劲有力。早年还雕有七真人“石象”。

“烟霞洞”以其独特的风景闻名于世，古人曾这样描绘：

“青天重迭水潺湲，闻道此中别有天。洞里仙人何处去，烟霞风景自年年。”石洞周围，壑谷幽邃，松柏掩映，石径回绕。每当阴霾天气，遥望洞天，山头云海如浪，洞围雾气缭绕，时有霞光出现，五彩斑斓，绚丽壮观，宛如烟霞缥缈，故“石洞烟霞”列为牟平诸名胜之首。早年曾有美、法等国外宾，来此观光游览。可惜十年浩劫中，烟霞洞内遗迹多遭破坏，唯“石洞烟霞”犹在，仍不失为一处风光迷人的胜地。

龙池喷雪

在牟平县城南20公里，现玉林店乡西柳庄村东南约1.5公里之苍山西麓，在长约100多米的悬崖石壁上，梯列着九

个天然圆形深池，名“九龙池”。池之大者直径五、六米，小者一、二米，池水清洌见底。神话传说，从前天上有九条孽龙挣脱绊绁，闹得河海瀑决，洪水泛滥，震怒了天帝，将其驱锁于苍山。孽龙狂性难驯，吼奔不止，鳞张爪厉扒石成七窍。惹怒了河神，也在此怒跼双阙，与其搏战。这七窍双阙，就是今世的“九龙池”。九龙池泉水甘冽，自上而下长流不息。春时细流涓涓，碧波涟漪；夏日飞瀑奔湍，风激悬流，如撒珠喷雪，“龙池喷雪”由此得名。

九龙池北山下，原有龙王庙和一座戏楼，与九龙池遥相陪衬。戏楼已拆除多年，龙王庙也改建为林场用房，唯“龙池喷雪”之景不减，值得一游。下游修水库一座，拦住了九龙池水，县、乡酒厂酿造名酒，多取用“九龙池”水，实现了前人所向往的“九龙池水汇大泽造福于人”夙愿。

荆岩古寺

牟平县莱山镇驻地东南十里处的荆山西北麓，有座古寺，名荆岩寺。据传，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始建，并有金代古刹。因寺建荆山上，所以古称“荆岩寺”，俗叫“荆山寺”。

“荆岩寺”整个院落占地5300多平方米，有山门、大佛殿、千佛殿、霏芦殿、东西陪房等，共计40余间。其中大佛殿最大，占地约300多平方米，内塑有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等神象，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山门前有两尊石雕狮子，高约2米。寺西有金、元石碑数座；西北山坡上，耸立着五座名僧塔，其中有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建的顺公（古寺

主持僧名)葬塔和泰和三年(1203年)泐公葬塔。

“荆岩古寺”列牟平十景之一，一是因寺古庙大；二是所处自然环境风光秀美。荆山寺所属范围约3平方公里，踏荆山西顶北望，寺脊庙落历历在目。寺东是荆山岭峰，顺势向西伸出两条山腿，将古寺盘围其中，腿合之处，有一条米余宽的通口，寺址成一天然小盆地。荆山上下林岚幽邃，松柏苍翠，郁郁葱葱。周围有近百株柿子树，秋末金黄柿子挂满枝头。古寺院内，有两棵柏树，高20多米，围粗6米左右，象一对卫士挺拔屹立。另有古松一株，蟠屈偃仰，宛如游龙。两棵银杏古树，树粗三抱，矗立巍巍。古寺东南侧约百米处，有一约40平方米三角形荷花池，池水终年不干。几株柳树掩映池岸，水中荷花柳影，鱼游枝头，莺歌水底，引人入胜。山门前一棵古松上，挂着一古钟，下口粗约半米，高约60公分，每当敲击，声响远传数里，悦耳动听。据说荆山寺所以能列十景之一，这寺钟之声，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荆山寺神佛遗迹，早已毁掉，寺庙建筑大都拆除，寺内最末一位和尚，在此娶妻还俗，现仍居原址。

白塔残阳

牟平县宁海镇王家庄北，现工商大街南侧，牟平县服装厂处，早年是个塔丘，塔前有两座元代白石塔，一座九级，一座七级。传说是两女僧（俗称姑子）的葬塔。佛教徒死后实行火葬，死后立塔说明这两个僧尼德高望重，品行超群。两塔相距三、四米，近看成东西走向，但远视南北、东南、

西北都成一线，所以当地群众又称其为“转阳塔”。春末夏初，落日在相距30多华里的桂山低凹处，残留半边还未沉没，这时白塔周围已阴暗多时，可是两塔之巅和中间空隙，仍有阳光余辉，故《宁海州志》把此景定为“白塔残阳”，1936年编的《牟平县志》写为“白塔斜阳”。合作化后，开荒种地，两塔先后被拆除，现故址已建起了工厂，盖上了楼房，但“白塔残阳”之说，还在牟平人民中间传说着。

龙门归帆

数百年前，现牟平解甲庄镇东泊子村北海上滩头，有个大港，是渔船汇集之处，当时叫龙门港。每当风和日暖之日，夕阳西下，海上浪花泛着晚霞光彩，上百只渔船，扬起白帆，从天水一色的远海，载着鱼虾，返航归岸，一簇簇归帆，如蓝天行运的星斗，星星点点，由远而近，由小渐大，加之渔民抬船、卸鱼的号子声，乐趣无穷。“龙门归帆”称得上牟平海上一胜。现今龙门港淤塞消失多年，渔船多安上了机器，归帆之景随之消失。

海市云收

海市蜃楼为世上奇观，在牟平沿海，也有出现。旧志专把“海市云收”列为十景之一。牟平县北侧有60多公里的海岸线，从古到今，多次出现海市。出现海市的时间一般在春夏之交。雨后天晴，东南风轻拂，海上风平浪静，阳光和暖，有时遥望海空某一角度，梦境般出现山川林木、城池楼

阁，以至车水马龙变幻无常。据说有时能见到大连的大楼和马路、蓬莱仙阁。整个景象，浮光掠影，时隐时现，时间最长也不过个把小时。此景至今仍有，但不是年年一定出现，关键在条件是否具备。

老石烧肉和“兔子洞”包子

唐述贤

益香斋烧肉（老石烧肉）

老石，本名石元洪，原籍益都县石家村。幼年在北京一家烧肉铺学徒，深得名师指教，学成一手制作烧肉的绝妙技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元洪随友人来牟定居，以开盒子铺（烧肉铺）为生。那时他每天制作的烧肉，只需放在一个椭圆形的木盒子里出卖即可，故名盒子铺。初来牟时他在北门里（现北翠里）租赁一小屋居住，自家制作烧肉，在集市上摆摊出售，或于乡间沿街叫卖。

老石制作的烧肉口味独特，且讲究卫生，顾客竞相争购，总是供不应求。尤其是当时城北盐滩村收入较高的盐民，皆为老石烧肉的常年食客。如有红白喜事需宴请客人，都必须预先到老石烧肉铺订购烧肉。老石的烧肉生意日见兴隆，经营范围逐渐扩大，遂于旧县衙前路南拐角处（现新华书店处）立门头开一烧肉铺，铺号为“益香斋”。虽有铺号，当时却鲜为人知，因制作的烧肉出自老石之手，他又是店铺掌柜，故人们均称益香斋为老石烧肉铺。

营业扩大后，老石又从原籍招聘杜连泉、杜连汇来店铺作帮手，由他亲授技艺，此时烧肉的售量日趋增加，购者络

绎不绝，烧肉铺门庭若市，至40年代初期，仅此一小小的烧肉铺内竟有店员8人之多，且日夜奔忙，赶作不暇。

老石烧肉素以价廉味美著称，在长达20多年的经营中，誉满县内外，历久不衰。

老石烧肉铺生意所以如此兴隆，除他善于经营管理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作技艺专一过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信誉，从不粗制滥造，更不偷工减料，真可谓信誉第一，用户至上了。

老石烧肉制作的技艺是：在第一次制作烧肉前先备好鸡汤。制作鸡汤必须将八至十只老母鸡加上茴香、大料及优质酱油，再添水用文火燉煮后，将鸡捞出，原汁鸡汤即为卤汤，以备制作烧肉用。

下货未下锅前，先将猪头、猪蹄上残存之猪毛及污垢拔掉刮净，再多次冲洗；肠肚之类先用盐碱水搓洗干净，除去腔内之油脂，再冲洗至无臭味为止。然后再将洗净之下货置入锅内，用开水冲冒一遍。下货入锅后，加砂仁、豆蔻、石落子、肉桂、丁香、花椒、大料等佐料，添加适量的水，并加入事前备好之卤汤，用文火煮至点尽一支元香时间（1小时30分），即将下货捞出去骨，再将猪头、肠肚放入锅内煮30分钟时间（不盖锅）捞出置盆内，用原卤汤煨8小时后，捞出凉透，方能出售。

第一次烺下货的汤水，连续使用，即所谓的老汤。老石的下货老汤，长达20年之久。

经这样精工制作之烧肉，呈淡红色，火候恰好，硬软合适，味道独特，连猪头上的肥肉吃起来亦感香而不腻，脆而不生，真是色味俱佳，男女老幼食之不厌，为当时人们下酒

之佳肴。

1945年8月，牟平城解放，在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感召下，老石烧肉铺的生意更加兴隆，此时他虽年逾古稀，但仍整日操劳不息，不幸于1947年病故，停止营业。

老石故后，原店铺伙计杜连汇（兄弟数人，他排行第四，人称杜老四）另立门头于政府前东角（现牙科诊所）处开业，铺号为杜老四烧肉铺。此时店铺规模较小，店内仅有一名伙计，加之杜老四夫妻共3人，仍沿用老石传授之技艺制作烧肉，故50年代杜老四的烧肉在牟平也颇有名气，但比起当年老石的烧肉就大为逊色了。

杜老四于1947年开业，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合营时停业，遂回原籍。

兔子洞包子

“兔子洞”原铺号为福顺馆，于20年代开业，经理杨子刚，后由李延斌接替；1953年时由王照瑜负责经营，易铺号为裕兴馆。虽经几次更换铺号，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店铺的字号，然而一提起“兔子洞”包子铺却人人皆知，旧址为现宁海镇政府所在地，原址房产为东门里孔家所有，即当时人称之孔宅，因店铺为一南北狭长通屋，故名“兔子洞”。

1945年前后，牟平城约有四、五家包子铺，经营时间最长，最负盛誉的要算“兔子洞”包子铺了，“兔子洞”包子不仅在县内有名，外地客人也倍加赞赏。当时人们曾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流”：“牟平包子，福山面。”牟平包子指的

就是“兔子洞”包子。

“兔子洞”包子所以久负盛名，其主要原因是：配料得当，制作精工。

其配料方法及制作规程是：包子皮所需的面粉用七成开的水烫好，反覆调和均匀，包子皮扞得中间厚四周薄，薄到几乎有透明感。水和面的比数为 1 : 2。

包子馅主要材料为猪肉和蔬菜（按季节选用大白菜或玉瓜），肉和菜的比数亦是 1 : 2，肉、菜均切成不足一立方厘米的小块，所需的猪肉是肥瘦兼有。肉切好后，先用好酱油煨上，再加上葱、姜之类佐料，然后将菜掺入，同时加小磨香油将馅拌匀。

猪肉肥瘦的搭配，随着季节的转变而有所变化。夏日人们怕腻，比数是“肥三瘦七”，冬天需要油水，就要“肥六瘦四”，春秋两季则是肥瘦各半。

包子配料的比数是：按100个包子计算，面粉2斤，水1斤，菜4斤，猪肉2斤，酱油半斤，葱半斤，姜半两，香油1两。

按上述配料方法和制作规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变更，不管是平日顾客少，还是集日顾客多，绝不两样，质量和数量更不能变，所以“兔子洞”包子受到远近食客的欢迎，这就难怪现时牟平一些老年人一提起当年“兔子洞”包子，犹似包子入腹，口水频咽了。

包子包好后放入笼屉内上锅后急火蒸15分钟即熟。

“兔子洞”包子味道鲜美，醇香而不腻口，尤其是刚出屉的包子口味更佳。那时凡知“兔子洞”包子口味的人，都争先购买，尤其是外地人来牟，若不尝尝“兔子洞”包子更

觉遗憾。的确，“兔子洞”包子不仅口味好，也经济、实惠，吃上一顿，连菜带饭都有了，真是人人食之不厌，穷富都吃得好。

“堠子”考

崑 嶺

在本县的地名当中，有不少是以“堠子”命名的，武宁乡的南部就有南北堠子芥两个村子。查“堠”字即“斥堠”之“堠”。所谓斥堠，是指古时军队中对敌进行侦察的活动，有时也指进行侦察的前哨或工事设备。“堠”字不见于《说文》之中，古人多用“斥堠”二字。至唐朝的《广韵》一书方载此字，可见它是一个晚出的字，是人们为了避免与“时候”的“候”互相混淆而新造出来的。《广韵》注云：“堠，土堡也。”也就是设立在高地上用以瞭望敌情的一种工事建筑。所以堠子芥村名的由来，无疑与古时建立过瞭望哨所有关。

但由于地方字音混淆与文字传写之误，“堠子”二字在本县范围内，又讹为“猴子”与“侯至”两种写法。

一、猴子芥，现已改称金沙芥，在龙泉乡西南部。《牟平地名志》谓：该村“有一土岭，形似猴子”，以此得名。这是不对的，因为以“猴子”作为村名，极为不雅，这无异于对自己进行諑笑，该村的人决不会这样做的。“猴子”二字应是“堠子”之讹。该村地处大昆崙山脉庐山支脉之东麓，正是一个高地，古时曾在此设立斥堠，故得此名。

二、侯至山，在大窑乡蛤堆后村西北。相传汉东牟侯刘兴居曾至此山，故名侯至。《旧县志》因刘兴居受封后未曾

亲至此地，而断其说为一种讹传，这种见解是极为正确的。此山在北海之滨，是海防线上的瞭望之处。古时曾设斥堠于此，所以得了“堠子山”的名称，相传既久，就讹转为侯至山了。

元代石墓——鳌子坟

嵒 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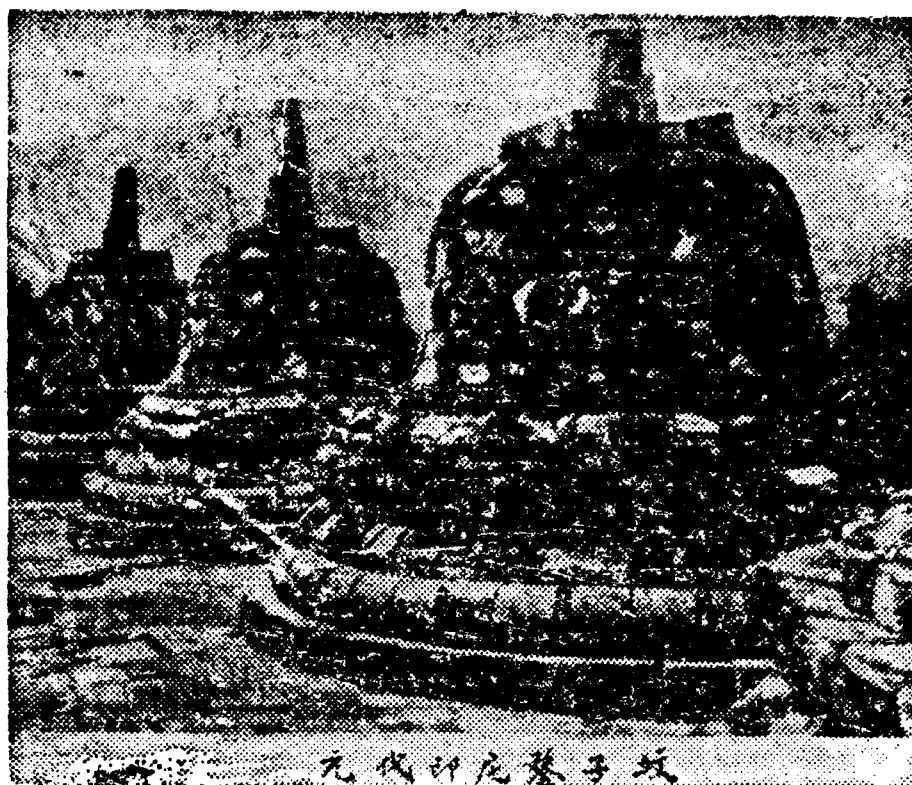
我县有很多元代石坟，呈圆鼓形，高3米多，径约2米。传说古时人过花甲（60岁）不死，后代就按律令将其囚于石坟，由子孙送饭充饥，送至60天即可断饭，最孝者送饭也不超过100天……云。此说流传虽广，但毫无实据，现作简析以证之。

1936年编《牟平县志》卷十《元代石坟》条云：“本县境内多石坟，以块石垒成，高丈许，状若兜鍪（古代武士的头盔），俗称鳌子坟。……以年号考之，均系元时，间亦有明初者。相传海滨各县，遭金、元之乱，人烟稀少，野兽掘墓，故建筑石坟以防之。有谓元太祖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掘取，故为此坚固不拔之势，以防掘银。二说孰是？抑别有原因？俟考。”

上文中所考石墓的建立年代是很正确的，但所说建立此墓的几种原因却都错了。查此种石坟之式样，起源于中亚细亚，古时国王及其大酋的坟墓，多作此式。因为它的形状如钟（或铃），也象王冕，所以西方人称之为钟冕（或铃冕）英语译为“Bell Crown”。后来由于元人的西征，将此种风俗带至中国与印度，又向东传播，远至印度尼西亚。印尼人除用为墓式之外，并用它做为寺庙建筑的一种装饰。此种墓式，在中国人眼中看来，极似武士的兜鍪，所以就称

之为鑿子坟。

上图是从英文刊物上剪下来的一幅照片，那是印尼爪哇岛上三宝垄附近波罗波多庙里的一排钟（或铃）冕式建筑，下图是元代我县云溪村鑿子坟，两相对照，就可明确，元代石墓是一种外来的形式，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特意设计的。



从“十分屠戮赦三分” 到上“浩浩山”

治 平

清初，于七起义失败后，统治阶级杀人很多，但本县当时比之莱阳、栖霞、文登等县，还是一个被杀害最轻的县份（本县明代遗民曲谐《兵火八首》诗之七：“十分屠戮赦三分，不比莱阳、栖与文”，可证。），即使较轻，牟平境内也是尸横满地，惨不忍睹。《兵火八首》之二：“煎熬鬼国铺人肉，惨淡愁城改化工。”屠杀过后，人们惊魂初定，自知未死，举目一望，到处是阴森恐怖、荒凉凄惨的情景。村中的断壁颓垣上，还留有读书人所写的诗句，而其人早就做了“刀下之鬼”。春耕季节，农民连一条牛也找不到，只好以人代畜去耕田了（《八首》之八：“壁上诗歌成鬼调，田间禾黍驾人耕。”）。

尽管清政府的屠杀十分残酷，但本县人民决不因此而屈服，暴动事件，此伏彼起，从未间断。自康熙元年大疫之后，水、旱，地震，接二连三，农民无法生活，只好铤而走险。宁海知州陈一朋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每逢捉到了所谓的“强盗”，就一概指为“于七余党”。不等带到大堂进行审问，就命令捕役送上浩浩山（在城南10里，今名古寨顶）杀掉。当时被杀的人不计其数，全县的人无不闻而股慄。每逢小孩啼哭时，大人就恐吓他说：“再哭，就要上浩浩山

了。”所以上“浩浩山”这句话，以后就在本县传为俗语了。

从“十分屠戮赦三分”到上“浩浩山”，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本县留下的罪行实录，

教育轶事——《老虎歌》

治 平

清朝末年，政府鉴于外交失败，不得不推行新政，在教育方面也采取了废科举、兴学校等种种措施。1907年，即光绪33年，江苏阳湖县人吴延祚来任宁海知州，与幕宾（县官聘请的顾问）蒋绍仪，本县绅士常理基、孙宝怡等积极倡办新式学校，任劳任怨，不遗余力。所以吴、蒋、常、孙四人就成为本县创办新式学校的有功之人了。

但是，宁海州地处偏僻，风气不开，地方上的一些老秀才、村塾师的思想都很顽固，一提起“西学”就嫉之如仇。所以直到民国初年，全县的私塾仍占上风，学生家长也多不愿送孩子上新式学校。1916年（民国5年），湖北武昌人邹允中任牟平县长，他也是一位热心教育的人，委任杨世瑞（字辑五，午台南港人）为师范讲习所所长，下令凡属塾师一律要进讲习所学习，毕业后领取文凭，方可任教，不然就不许其开设学馆。

塾师们对此都极端反对，但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前来应付。第一堂课，一位青年教师来讲数学。白发苍苍的老塾师一见这位和自己儿子年令相仿的教师就很不高兴，又听他讲一、二、三要写作1、2、3，更觉得岂有此理。下课后纷纷议论：“洋鬼子到底不是人，写的字也带鬼气，弯弯钩钩，不像人写。”

隔了两天，一位更年轻的教师来上音乐，教给大家，1、2、3要读DO、re、mi，老塾师们的火气再也压不下去了，当堂质问：“仅仅隔了两天，这几个字就变了念法。再住两天，当然还会变。这种多变的鬼子学问要它做什么呢？”

随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给杨世瑞编了一首歌谣：“杨辑五，外号大老虎，说他是纸糊的他不服。不会做诗写八股，会画地球把人唬。问他还会做什么？他说：‘会唱多、来、米、法、扫，会写带弯的1、2、3、4、5。’”

此事后来被传为本县教育史上的一段笑话，直至现在，一些80多岁的老教师还能记得这首《老虎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康、梁变法维新后将近20年，本县教育界中的守旧思想，还是很难一下子扭转过来的。

牟平县人民政府历任县长（主任）名录

王 本 世

姓 名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郑 省 农	县 长	1941.1——1945.8
余 任	“ ”	1945.8——1945.10
杨 勇 广	“ ”	1945.11——1946.8
曲 上 升	“ ”	1946.8——1948.11
杨 明	“ ”	1948.12——1949.2
王 松	“ ”	1949.2——1952.8
郑 仁 宾	“ ”	1953.1——1954.5
谭 明 玉	“ ”	1954.5——1955.2
侯 立 基	“ ”	1956.2——1958.5
张 华	“ ”	1958.5——1958.11
姜 洪 保	“ ”	1960.12——1967.2
戴 振 田	主 任	1967.3——1968.4
王 庆 震	“ ”	1968.4——1973.7
姜 伯 远	“ ”	1973.7——1976.9
刘 忠 孝	“ ”	1976.9——1980.5
王 子 民	县 长	1980.5——1981.3
王 志 远	“ ”	1983.2——1984.1
孙 德 汉	“ ”	1984.6——1986.11
谢 玉 堂	“ ”	1987.4——

侦察英雄杨子荣征文启事

杨子荣烈士，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岬岬河村人。1917年生。1945年秋天，参加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94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在东北牡丹江地区夹皮沟山一带，奉命只身打入匪巢，里应外合，一举将国民党东北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匪徒全部活捉，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荣立了三大功。同年2月23日，在牡丹江地区海林县北部梨树沟山里闹枝子沟追剿残匪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1岁。

杨子荣同志是举国闻名的侦察英雄，为了纪念他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绩，学习他大公无私、机智果敢、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敌人的革命精神，把英雄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牟平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将刊用侦察英雄杨子荣的有关资料。我们真诚希望杨子荣烈士的生前工友、战友、首长、亲属及熟悉杨子荣情况的其他同志，向本会提供杨子荣烈士的有关资料。

资料不限内容，杨子荣的身世、生活片断、英雄事迹等，均在征集之列；不拘形式，稿件、照片、图片、实物（实物可拍成图片）、剪报均可；不限篇幅，可长可短。但资料必须真实可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尽量核实准确，文字力求简明。

来稿请于1988年底前，惠寄山东省牟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省牟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7.1

牟平县政协文史资料 编审委员会

主 任：曲炳岐

副主任：曲兴澜、曲言训

委 员：田润农、李振端、常毅传、宋子仁、任绍光、
葛培重、殷 枫、王树山、李五宽、宋协礼

封面题字：张连之

责任编辑：曲言训

编辑：牟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山东省牟平县印刷厂